

顾问委员会

总顾问 曾培炎
顾 问 董建华 蒋正华 唐家璇 徐匡迪

资深专家委员会

中国专家（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春正	王伟光	王洛林	厉以宁	宁吉喆	冯国经	卢中原
许宪春	刘遵义	刘世锦	刘克崮	刘 伟	朱 民	李毅中
李德水	李若谷	吴敬琏	张大卫	张国宝	张晓强	张 祥
张卓元	陈 元	林兆木	林毅夫	周文重	高尚全	海 闻
钱颖一	郭树清	辜胜阻	聂振邦	楼继伟	樊 纲	魏建国
戴相龙						

国际专家

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康睿哲/Richard Constant
傅强恩/John Frisbie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
欧伦斯/Stephen A. Orlins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
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	马克·乌赞/Marc Uzan
郑永年	

编委会

主 任 魏礼群
副主任 郑新立

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一鸣	王晓红	吕 政	谷源洋	朱晓明	李晓西	李向阳
张宇燕	张燕生	张蕴岭	杨圣明	冼国明	施子海	隆国强
常修泽	徐洪才	裴长洪	霍建国			

主 编 郑新立
副主编 王晓红
编辑部主任 沈家文

· 本刊专论 ·

“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重大机遇与建议 陈文玲 (005)

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与河北的着力点 肖金成 马燕坤 (017)

· 宏观经济 ·

2015 年宏观经济运行回顾与展望 杨琳 (032)

· 国际经济 ·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研究与政策建议 李罗莎 (046)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 刘翔峰 (059)

· 产业发展 ·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与对策
黄勇 周世锋 王琳 潘毅刚 (071)

· 企业发展 ·

台湾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王素贞 赵景华 (084)

• 调研报告 •

- 农户分化对农机服务使用与需求的影响及启示 姜长云 郑秋芬 (094)
- 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发展
- 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综述 任海平 (107)

• 权威观点 •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0)

• 国际统计数据 •

-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125)



CONTENTS

Great Opportunities to Hong Kong from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Suggestions	<i>Chen Wenling</i> (005)
On the Space Layout Optimiz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the Acting Points for Hebei	<i>Xiao Jincheng, MaYankun</i> (017)
Macro – economic Operation in 2015 and Outlook on the Future	<i>Yang Lin</i> (032)
Study on the Negative List Negotiation of the Sino –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Li Luosa</i> (046)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n	<i>Liu Xiangfeng</i> (059)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rderly Advanc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i>Huang Yong, Zhou Shifeng, Wang Lin, PanYigang</i> (071)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SME Development in Taiwan	<i>WangSuzhen, Zhao Jinghua</i> (084)
Influence of Rural –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on Usage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and Its Enlightments	<i>Jiang Changyun, Zheng Qiufen</i> (094)
Continuously Pushing forward the Sino – US New Relations – Summary of the Seventh Round Dialogue between Sino – US Business Leaders and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i>Ren Haiping</i> (107)

“一带一路”给香港带来的 重大机遇与建议

陈文玲

摘要：习近平主席倡导并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应深刻认识并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其中更多的共同点和交汇点，可以放大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比较优势。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巨大机遇，香港的当务之急是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更好地发挥香港重要作用、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关键词：“一带一路” 香港 机遇

作者简介：陈文玲，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执行局副局长。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合作倡议，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这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推动构建以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的伟大战略构想；是中国站在人类道义制高点上，站在造福于更多国家和地区、重塑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景之上，提出的具有全球视野

的对外和平发展的“中国方案”；是通过形成良好的、互动的周边环境，维护中国海权和陆权的核心战略。推进建设“一带一路”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需要调动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的积极性，更需要形成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两岸四地相向而行的集成优势。

一、“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要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重塑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一带一路”战略为香港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香港在软件和硬件上具有不可取代、难以复制的特殊优势，把握“一带一路”战略的历史机遇，香港主动呼应并占据国家战略制高点，将形成全新的可持续的战略要地，重塑香港的核心竞争力。

（一）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携手迈向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情感共同体的进程中，可以寻找其中更多的共同点和交汇点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使中国与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努力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构建各方融合发展的大格局，共同担当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任，共享发展的权益和利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体现中国一贯遵循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原则，契合沿带沿路国家的共同利益。沿带沿路各国和地区是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合作伙伴，也是共享发挥成果的兄弟。这一战略构想如能变成现实，将共同构建起世界跨度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沿带沿路地区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上升期，无论是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还是从应对金融危机、加快转型升级的角度看，沿线各国的前途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紧密相连、休戚与共。中国不但需要与大国强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而且需要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携手进入新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主题的新时代，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关照他国利益，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和互利共赢。香港首先应把自身作为与祖国息息相关的命运共同体，才能在祖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商、共建、共享中获得新的发展契机。

长期以来，香港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始终联系在一起，香港一直是国家连接国际社会的桥梁与纽带，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桥头堡。香港只有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在国家的地位和作用更重要，同时也才能为自己带来新的发展。国际化因素与内地发展因素交织互动，形成香港经济的独特特征，随着时间推

移，香港与祖国内地的关系将起到决定性作用。2014 年内地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 50.3%，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 53.9%。截至 2014 年底，内地在香港上市企业共有 876 家，占上市公司总数的 50%，占香港股市全部集资额的 74%。香港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全球最大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中心，截至 2014 年底人民币存款达 1.2 万亿，经香港银行处理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再升 63%，达至 6.3 万亿。截至 2014 年底，内地访港旅客占全部访港旅客 77.7%，为香港带来数以千亿港元的经济收益。香港服务业占 GDP（国内生产总值）的 93%，在为内地制造业和广阔市场服务的同时，在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中，保持了约 3% 的增长和约 3.2% 的发达经济体最低失业率。

从未来发展空间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覆盖 46 亿人口，占全球总人口的 63%，GDP 总量约 22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总量的 30%。区域内大多数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在 30% 左右。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建设“一带一路”，这是中国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投资的重点，预计在今后 25 年内国内将大幅提高对该地区的投资，其比重将逐渐占到中国对外总投资的 70%，成为中国对外资本输出的重要区域。“一带一路”战略将为香港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香港金融业的领先优势将有机会转化为实际效益。香港既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性金融中心，也是目前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角色独特，这个一手牵着中国内地金融市场、一手牵着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城市构成的全球金融市场，是国家最宝贵的金融资源。香港有诸多国际金融机构的地区总部和办事处，也有众多基金公司和财富管理公司，这些公司汇聚了具有全球知识和经验的高端人才，可以为内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所需的金融信息、国际联系和专业配套服务。2014 年开通的“沪港通”与正在准备开通的“深港通”，表明香港在内地与世界金融市场对接中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银行的成立和上合组织金融机构的筹建，为香港发挥优势提供了更大空间。香港不仅在投资融资、项目资金管理、资金风险管理等方面的丰富经验可以派上用场，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专业的金融分工、透明标准化的金融产品、齐备的金融基础设施、强大的金融信息聚集、金融研发能力和境外融资能力等综合优势更可以产生集成效应。

（二）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建“一带一路”的进程中，可以放大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的比较优势

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将让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走出去”的中国力量为一个古老文明注入了开拓进取的基因，也为香港创造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新空间。近两年，

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大大加速。中国对外投资区域也不断扩展，从投资的国别地区来看，中国对外投资已经从传统区域逐步拓展，多元化区域投资特征明显。2014 年中国内地对亚洲投资增长了 48.9%，对东盟增长了 27.6%，对非洲增长了将近 22%，对香港投资增长了 50.8%，对俄罗斯增长了 3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走向深入，随着沿带沿路国家和地区对这一战略构想和倡议的响应，围绕这一地域的贸易和投资将有大幅增加，这将为投资者带来巨大的商机。沿线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很多是低收入国家，还有九个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产业和社会事业发展水平低。据亚洲开发银行和有关专家预测，亚洲地区除中、日、韩三国外，未来十年基础设施每年投资需 8200 亿美元，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总投资金额分别为 1600 亿美元和 2800 亿美元，相关国家自身仅能提供约 4000 亿美元，资金缺口巨大。在过去十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年均增长 19%，高出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平均增速四个百分点。过去十年，中国企业仅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就从 1.8 亿美元扩大到 86 亿美元，年均增加 54%，这充分表明共同投资潜力与合作潜力巨大，中国正在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加快紧密合作与深度融合，而香港的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和人力资本流通的综合优势，可以通过为国家与沿线国家和地区更高水平的合作，推动形成更为合理的跨区域、跨市场、跨国境的区域布局和产业布局，在更高水平上整合或运用不同国家、区域的生产要素，加快各国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深度融合。

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可以利用开放的市场、优越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法律法规等先发优势，在配置全球性资源方面抢占鳌头。香港的港口和机场都是现代流通的国际性枢纽。港口条件优越，多年位于世界货物周转速度和中转比重的前列，维多利亚港是深水不冻港，可供远洋轮随时进出；海港外有天然屏障，港口风平浪静，是仅次于美国旧金山市和巴西里约热内卢的世界第三大优良的天然港口。香港机场管理水平国际一流，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24 小时全天候运作，可直飞全球约 180 个地点，2014 年旅客接送量达到 6200 万人次；拥有全世界最大的航空货运站和三家高效率的空运中心，每星期约有 4100 架次定期客运和全货运航班，前往全球 145 个目的地；2001 年以来期间八度被评为全球最佳机场。香港在全球资讯科技的国际排名中位居前列，在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全球各国及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排行榜中，香港位居第 10 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2013 年全球资讯科技报告”，在 144 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排在第 14 位，在亚洲排在新加坡、台湾地区和韩国之后。这些有利条件，用则有，用则多，用则增，用则强；不用则无，不用则消减，不用则不成其为优势。香港优势发挥好的时候，香港经济就繁荣，反之则萧条。“一带一路”为香港

创造了盘活存量、用好增量的最好机遇。

（三）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的进程中，可以继续发挥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前沿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软硬”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程已经开启，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等，将依托国际大通道，以沿线中心城市为支撑，以信息化先导的国际通关、换装、多式联运有机衔接，贯穿亚欧非，连接三大洋，把活跃的东亚经济圈、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和更广阔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结成携手发展的“利益共同体”。毫无疑问，香港在这样的利益共同体的建设中机遇唾手可得。

中国在全球、亚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正在逐步上升，在国际、洲际事务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决定着香港的作用只能增强不能减弱，香港的地位只能提高不能降低，香港与祖国的未来联系在一起。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 2015 年年会上指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跟上时代潮流，共同营造对亚洲、对世界都更为有利的地区秩序，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新时期外交发展理念、思路 and 策略原则的一次重大创新和必要调整。1954 年中国和印度、缅甸共同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奠定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础，已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当代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战略思想，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世界局势的全面把握。今天的中国不同于 60 年前全球冷战时期百废待兴的中国，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迫切需要重新打开国门融入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国。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成为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和调整的重要力量。建设“一带一路”是中国面对全球形势的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与沿线国家合作，体现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应有的胸襟和气魄。古丝绸之路历久弥新，已经成为一种文明交流、交往和交互的文化符号，至今仍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其所展现出的互利共赢合作理念以及和平、友好、开放、包容精神，将再一次唤醒沿线各国对经贸文化交流的认同。香港是世界公认的经贸文化之都，可以率先塑造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新秩序的市场环境，率先塑造有利于全球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价值观，这既是对中华民族也是对人类社会可以做出的新贡献

香港长期处于祖国开放发展前沿，扮演着亚洲贸易航运中心的角色，是东南亚和东

北亚、中国与欧洲和美洲贸易的重要节点。过去十年，香港贸易最大的变化是在转口贸易下降的同时离岸贸易活动快速发展，表现出从较高增值的转口贸易向较低增值的离岸贸易转变的显著特征。中国从 2014 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体，成为 120 多个国家第一大贸易伙伴，70 多个国家第二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上升到 13%。香港只有强化与内地的贸易关系，做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转化桥和合作纽带”，保证转口贸易比重保持在一定水平，保证满足新的机遇产生新的市场服务需求，就可以避免贸易及相关产业进一步虚拟化。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特点是出口依赖度高，平均在 35% 左右，其中很多国家已将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香港在推进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中，一方面可以为这些巨大贸易流量可能产生的服务需求提供优质服务；一方面可以推动与内地《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转型升级，努力恢复其作为区域贸易协定（RTA）的基本属性，进行功能创新，拓展 CEPA 的实际效用；再一方面，推进内地与东盟共同体建设进程，准确把握其发展潜力；另外，配合内地积极推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也可以为香港寻找更大的市场空间。

（四）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应对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在内地经济新常态动力机制转换中发挥共振作用，同时起到对冲国际风险的防火墙作用

“一带一路”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通过强劲的、更有效的、更具亲和力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格局，籍此打破一些国家以霸权主义为主导的所谓战略再平衡，有利于构建与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新平衡，对冲国际战争风险、经济风险和政治风险；有利于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争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大的战略主动和回旋空间；有利于我在大国崛起进程中延长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周期。环顾全球，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不平等现象仍很突出，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不少国家的民众特别是妇女儿童依然生活在战火硝烟之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处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轴心地位，国家间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恐怖主义威胁严重。创造和平环境是大家的共同愿望。经过建国 60 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中国已经成具备技术优势和可输出的产业越来越多，交通运输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将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将从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经济发展方式将从规模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益型集约增长，动力机制将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中国的“市场红利”“改革开放红利”“创新红利”“人力资本红利”“制度红利”将替代曾经发挥重大作用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等，实现动力机制、经济运行方式和

经济管理方式的重大转换，将使中国继续成为充满生机活力和最具发展潜力、发展韧性、发展空间的经济体。香港可以继续与祖国内地共同分享发展的机遇，分享市场、投资、贸易、环境发展中的收益，可以搭“一带一路”这个最大的“顺风车”，也可以与祖国一道共同创造快速车，还可以搭祖国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驱动的“便车”，与祖国共同满足世界特别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一个崛起中大国的新期待。

香港具有丰富的国际化人才，这是香港独特的条件。香港具有“两文三语”优势，香港是英语与粤语通用的城市，港人从小接受英语教育，在国际商业中具有语言优势，回归之后与内地往来密切，普通话也成为港人重要的语言工具。香港企业家和专家学者熟悉国际规则、法律、惯例，有丰富的处理国际业务的经验，可以作为内地企业的转换带和桥梁。香港法律制度与国际相关法律制度接轨，具有法制社会的基础和框架，这使香港有可能在法制化社会得以改进和改善。目前尽管香港创新驱动的动能不足，但全球科技创新的高端资源仍向香港聚集，世界多所一流大学或科研机构选择落户香港。如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 2015 年 2 月决定在香港成立卡罗琳医学院中国/香港中心；美国康奈尔大学也和香港城市大学合作，培育动物医学方面的专才；美国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 2014 年在香港开设分校。香港专业服务发达，聚集了大量专业化服务的机构和高端服务人才，能够提供国际化水平的专业服务。这些专业服务机构熟悉国际管理、西方会计制度、税例商业管理与顾问、会计及审计咨询，这是“一带一路”和“走出去”战略不可或缺的服务。应该强调的是，香港企业经历了从香港向内地转移、从内地向东南亚等国家转移的过程，在国际经营中又积累了新的经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优势产能“走出去”，既需要克服转入国的限制，也需要适应转入国的经济社会环境，更要面对当地企业的竞争，在这方面香港可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香港在祖国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中，抓紧将这些积累的优势转化为新的优势，可以为香港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

（五）香港在祖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形成国际国内互动、互通和互补的跨国界大区域和次区域的新布局中，应该也可以找到自己新的战略定位和战略方向

多年来中国区域布局基本上是在国内规划各区域发展，这种规划思路和方法已经严重滞后于今天中国发展的实际，滞后于世界和区域发展的实际，也难以更好地发挥香港的作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将对不适应这一布局的区域规划作出适度、适当和适时的调整，形成国内布局与对外开放布局互为表里、链接一体、相互支撑的新布局。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由于受地理位置、资源禀赋、发展基础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

出明显的东快西慢、陆强海弱格局。由于香港等主要因素，沿海地区成为支撑国民经济生产布局的战略核心区，目前中国东部地区占全国经济总量的 60%，内陆地区进出口贸易和外资利用额在全国占比不到 15%。西部地区远离出海口，与东部地区平均 167 公里出海距离相比，西部地区平均出海距离长达 2052 公里，是东部地区的 12.3 倍。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很大程度上体现为区域间开放程度的不平衡。“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将打破长期以来区域、产业和开放领域思维、视野和边界的局促，真正做到以外带内、以内促外、内外联动、内外一体化发展，也可以为香港创造新的发展机遇，使香港的区位优势重新得到发挥。通过建设“一带一路”，将逐步形成一批纵横交错、互相连接的沿海、沿江、沿边的战略大通道，以外部通道建设加快内部各主要经济区块联系和整合，缓解西部内陆地区区位和空间劣势，破解中国内陆地区因不靠边、不靠海导致的开放条件制约，加快中国西部地区同长三角、珠三角（含港澳）、环渤海和东南亚地区的连通，弥补传统欧亚大陆桥辐射力的缺失，将西部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东南亚地区横向地连在了一起，以跨境大贸易大合作大通关打造一批重要物流链和关键节点，推动形成具有跨国境要素集成能力、市场辐射能力的中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新布局。

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具有特殊的区域位置，香港不仅是“一带一路”沿线最重要的国际化中心城市，而且香港地理位置居中，是内地通往世界的南大门，是沟通远东各地，联结澳洲、欧洲、美洲各地的枢纽点。近年来香港与广东、澳门与广东分别签署了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其战略定位之一就是建设世界级大城市群，包括香港在内的粤港澳地区，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在“一带一路”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中的区域位置不可替代。香港与深圳在推进港深一体化发展方面也取得积极进展，如进一步打通信息流、人流、物流和资金流的阻障，香港与深圳将共同成为国际重要枢纽，其地位将难以取代。在内地区域布局中，推进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通过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珠海横琴、福建平潭等开放合作区，深化与港澳台合作，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福建海峡蓝色经济试验区、舟山群岛新区、海南国际旅游岛，都将成为“一带一路”新增长点。这也是香港链接内地与国际新的着眼点。粤港澳地区处于亚洲的中心地带，亚洲处于亚太中心地带，亚太处于世界经济中心，因此，对中国“一带一路”而言，粤港澳地区是沟通亚太地区最重要的通道和枢纽。

二、面对“一带一路”战略提供的巨大机遇， 香港的当务之急是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 更好地发挥香港的重要作用、解决好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面对国家未来发展的美好愿景与“一带一路”战略推进，香港社会应增强对祖国的认同感、责任感、自豪感和解决自身问题的紧迫感。把香港放在祖国发展的大棋局下，放在世界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找到打破局限的路径。

（一）香港当前的主要矛盾和问题，表现为发展失衡、贫富失衡、产业失衡、心态失衡和动能不足

一是发展失衡。2014 年香港经济增长 2.5%，低于 2013 年 3.1%。特区政府预测 2015 年香港经济增速是 1%~3%，市场一般预测是 2.5%左右，低于亚洲曾经的其他三小龙的水平。特区政府预计 2016 年—2019 年香港经济增长率为 3.5%，低于过去十年平均增速。《新华·道琼斯国际金融中心发展指数报告》指出，2014 年全球综合竞争力最强的十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已上升一位与香港并列第五。2014 年中国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连续 12 年第一的香港首次被深圳超越。香港在全国经济总量的份额从回归初的 16%下降到目前不足 3%。以同为都会城市的新加坡为例，过去 20 年香港经济年均增幅只有 3.4%，而新加坡却高达 5%以上；两地人均 GDP 在 20 年前相差不大，但 2014 年新加坡人均 GDP 高达 5.5 万美元，香港则不足 4 万美元；在全球旅游竞争力的最新排名也不如新加坡。与此同时，内地中心城市的竞争力也正在迎头赶上，最近中国社科院发布的城市竞争力报告显示，香港综合经济竞争力已被深圳超越。香港经济动力减弱已经成为一个长期性问题，除了有全球经济复苏缓慢的外部环境，香港正面对着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自身后劲乏力的困境。

二是贫富失衡。2013 年香港人均 GDP3.8 万美元，但贫困人口却达 131.2 万历史新高，占总人口的 19.6%，成为世界上少有的贫富最悬殊的发达地区。雇员报酬占 GDP 比重从上世纪末的 55.6%降至 2013 年的 50.8%，基尼系数由 1981 年的 0.451 升至 2011 年的 0.537，低收入人群不断壮大。从 2003 年到 2013 年，香港实际 GDP 增长了 55.6%，而从业者的薪金并没有明显提高。香港每月就业收入中位数 2003 年是一万港元，2013 年是 1.3 万港元，折合年增长率不足 3%，“按行业类别划分的就业人士评价薪金指数”显示，以 1999 年第一季度为 100，2003 年和 2013 年所有行业类别的实质指数分别为 106.8 和 114.3，表明香港普通工薪阶层并未从对内地开放中得到实惠。1985 年—2014 年的 30 年

间，香港私人住宅售价狂涨 13.9 倍，但人均名义 GDP 只上升 5.4 倍，房价升幅比收入快 1.5 倍以上，加上高楼价、高租金影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减少了年轻一代发挥才智和就业选择的机会。这是导致香港社会问题的重要动因，社会大众和大资本越来越对立，香港社会弥漫着仇富的气氛。

三是产业失衡。过去十年间，香港除了金融和旅游的比例略有增长外，贸易物流和专业服务比例几乎没有变化。2009 年，特区政府提出发展文化及创意、医疗、教育、创新科技、检测及认证、环保等六项优势产业，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六项优势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2008 年的 7.4% 增加到 2012 年的 8.7%，五年仅增加了 1.3 个百分点。目前香港第二产业比重不到 10%，其中“纯粹”的制造业比重不到 2%，以金融、地产为代表的高价值低就业产业与以餐饮、旅游等低价值高就业服务业之间的“二元”分化越来越严重。香港经济、产业、社会诸领域关系结构呈现出固化和僵滞状态。香港的优势在于服务业，但服务业发展必须建立在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之上，香港本地服务市场需求不足，外部市场服务需求难以保障，占 GDP 的 90% 以上高比例服务业使香港经济趋于非实体化和虚拟化。尤其在香港服务业中金融和贸易物流比重较大，两大产业对外部需求具有很大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剧了香港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和不确定性。

四是心态失衡。香港社会心态失衡是导致社会畸形和矛盾丛生的重要原因。不论是哪个阶层，皆有不满意之理由：年轻人缺少上升空间和机会，普遍对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得到高薪岗位的机会、具有自己住房的机会、在社会受尊重的机会减少满腹不满，一定程度的阶层固化和代际传承正在瓦解“人人都可以会成为富人”的香港梦。年轻一代对社会不满加重，反应形式趋于对抗性表达和暴力化表达，导致香港社会具有动荡的社会基础。老年人中大部分缺少生活保障，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资料，截至 2015 年年中，香港 60 岁以上人口为 160 万人，占总人口的 22%，已经远超老龄化社会 60 岁以上人口占 10% 的上限，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将在 2041 年达至 30%。而香港是全球发达经济体中唯一没有全民退休保障制度的地区，香港有近 1/3 的长者生活于贫困线下，远远高于经合组织平均 13.3% 的水平。据此估算，到回归 50 年，香港将有近百万长者处于贫困状态。^①中产阶级由于资产波动、收入几乎停滞、实质生活水平下降、“中产下流”的自我感知、社会阶层对立等问题，也对社会产生抵触心理。“占中运动”就是典型的香港社会从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政治较量转向全面、非理性、不合作的政治对抗的表现。

五是动能不足。香港经济高度依赖于单一的服务产业及其产业的二元化形态使得香

^①本段主要数字和自来来自朱文晖博士内部研究报告。

港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空间狭窄，社会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而且，深层次矛盾和结构性问题长期难以突破和解决，难以形成强有力的内生动力，经济虚拟化和发展波动性的隐忧一直难以消除。新增长点培育受到较大制约，回归乃至于回归前至今，香港 R&D（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从来没有超 1%，大体维持在 0.8% 左右，本地产业投资不活跃，科技研发投入无内在推力。创新要素和活动的缺乏，再加上产业结构服务业化，服务业结构的虚拟性和外向性化，导致内生动力严重不足。与此同时，香港人口年龄中位数快速上升，每年增加约 0.4 岁，2013 年已达到 42 岁。年龄中位数的上升，意味着城市活力的下降，也意味着今后对于社会福利相关的软硬基础设施的需求大幅增加。

（二）香港在新形势下，既有难得的机遇，又有巨大的挑战。香港既要正视自己的优势，也要提高现代政府执政能力，特别是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整体进行战略设计的能力。建议香港特区政府顺应“一带一路”推进的大势，当前重点抓五件大事

一是抓紧研究确立香港在祖国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制定香港融入“一带一路”和香港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的方案，与中央政府密切配合，综合国家战略需要、香港自身利益以及资源优势，明确香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和“十三五”期间所承担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功能，相关职责和义务，确定当前和未来五年香港战略行动计划。

二是争取在香港组建“一带一路”投资基金。建议由特区政府牵头成立香港“一带一路”投资基金或香港丝路投资基金，为香港企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提供资金平台支持。专门成立法定机构或委托现有法定机构负责管理和运作，基金由特区政府、民间和社会资本构成，可重点吸引在港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机构参与，包括伊斯兰金融、非洲在港资金等。资金在严格风险管控的基础上实行完全市场化规范运作。

三是充分发挥香港金融中心的作用。争取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AIIB）在香港设立境外运营的融资机构。建议特区政府指定有关部门或专业研究机构，就香港承担亚投行境外运营的融资功能进行深入研究，对这些功能在香港运营的优势和益处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并编制具体的操作方案，以此争取中央政府作出决策。^①

四是切实落实《粤港合作框架》。前几年签订的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对深化粤港澳合作，加强三地经济融合发展、互动发展和互补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广东省是香港产业转移、产业服务、产业链链接的最重要省份，也是中国内地 GDP 总量、税收

^①上述两条建议参考郭万达、张玉阁的内部研究报告。

总量、贸易总量排在第一位的经济大省，广州、深圳等城市与香港比肩而立，这是需要承认并适应的现实。内地发展快了，这对香港是压力更应该是动力，这对粤港合作框架确定的把这个地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是有力支撑，也使这个地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定位更加重要，借力“一带一路”推动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合作，就可以加快形成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

五是抓紧建设“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立体化重要枢纽。香港具有商流、物流、信息流、资本流和高端人才集聚的比较优势，具有空运、海洋运输、公路运输、铁路运输的立体交通能力，与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与伊斯兰国家有紧密的经济联系。把香港建设成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要道和重要枢纽，既是保障中国企业走出去必经之地和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安全的需要，也是突破美国及其盟友对我国进行海上围堵的需要。香港这个地位确立了，其未来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也就找到了，整合国内外两个市场和两个资源的效率和水平也就提高了。

在 5000 多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要使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世界文化新精神弘扬起来，香港也可以起到重要而独特的作用，香港社会只要转变思路，转变过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就一定能够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不可缺少的新文化元素。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京津冀空间布局优化与河北的着力点

肖金成 马燕坤

摘要：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一体化进程加快，但仍存在许多制约因素，如京津两市存在虹吸效应，城镇体系出现断层，京津冀之间的经济差距过大等。本文认为优化空间布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点，据此提出了“一轴两带、三核引领、四圈互动、多点支撑”空间布局设想。培育经济增长极是河北省加快发展的着力点，应将曹妃甸新区、北戴河新区、渤海新区、正定新区、冀南新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进行重点培育，使之成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新亮点和支撑点。

关键词：京津冀 关键点 着力点

作者简介：肖金成，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马燕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区域经济研究所博士生。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发表了关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讲话，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与政府工作报告明确了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国家三大区域战略之一，京津冀尤其是河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点以及河北省的着力点在哪里？这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一、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现状

京津冀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全域。京津冀地区国土面积为 21.6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 2.45%；2014 年常住人口为 11052 万人，占全国的 8.08%；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63475 亿元，占全国的 10.44%。京津冀地区是我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我国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我国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和合作的重要门户，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交通网络，在我国交通运输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经济联系和人员交往非常密切，一体化程度很高。

表 1 2014 年京津冀各省市主要经济指标

地区	土地面积 (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 (亿元)	三次产业结构
北京市	16411	2151.6	21330.8	0.7:21.4:77.9
天津市	11917	1516.8	15722.5	1.3:49.4:49.3
河北省	187693	7383.8	29421.2	11.7:51.1:37.2
合计	216021	11052.2	66474.5	5.7:41.2:53.1
全国	9600000	136782	636463	9.2:42.6:48.2

（一）经济联系密切

河北省与京津两市在经济社会领域的联系逐渐增强。河北农业优势突出，是全国粮棉油集中产区和重要畜禽产品生产基地，以钢铁为标志的资源型基础工业实力雄厚，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居全国前列，在京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京津冀交通基础设施发达，环京津高速公路网建设、客运班线对接等加快推进，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保障体系逐步形成。环京津地区已建成一批服务京津需求、具有产业链延伸性质的工农业产品加工配套供应基地、连锁市场。新首钢将建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的精品板材生产基地、循环经济和自主创新的示范基地；京南地区高新技术、休闲旅游、现代服务、高端食品制造等产业对接步伐加快，成功引进一批国字号、京字头的战略合作者。同时，河北还是京津重要的劳务输出地、建筑装饰材料等工业产品供应地，对京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二）专业化分工程度较高

作为京津冀地区的两个核心城市，京津在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上各有差异，从具体行业来看，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

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分工指数较高，对京津两地区域分工指数的不断提高贡献较大。2005 年—2010 年间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程度有了较为明显的提高，产业同构化问题逐步缓解和改善。

而从京冀两省（市）产业分工程度变化上看，京冀两地的区域产业分工指数继续在较高水平的基础上稳步上升，在京津冀地区中处于最高水平，反映出京冀在产业选择和发展定位上各有侧重，区域产业差异化特征明显。具体行业看来，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行业的区域分工指数比较高，对两地分工指数的贡献很大。

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产业分工更加趋于合理，产业差异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尤其是北京与河北、北京与天津的区域分工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

（三）区域合作机制逐步形成

针对冀北地区（张家口和承德）长期以来作为京津两大直辖市的重要生态屏障和主要水源地，在经济发展上做出重大牺牲的事实，京津冀三地不断探索在生态建设一体化上的体制机制。这一探索最初是采用三地省级政府协商或合作备忘录的模式。2005 年，北京市通过实施京承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项目，为承德市每年提供一定数量的补偿资金；2006 年 10 月和 2008 年 12 月，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两次召开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座谈会，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河北省人民政府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和《关于进一步深化经济社会合作会谈纪要》，并就如何开展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达成了一系列共识。2005 年—2009 年，北京市安排水资源环境治理合作资金一亿元支持密云和官厅水库上游承德和张家口地区治理水污染，发展节水产业；2009 年—2011 年，北京市安排资金一亿元支持河北省丰宁、滦平、赤诚、怀来四县营造生态水源保护林 20 万亩。2006 年，北京市和河北省合作在张家口黑河流域开始实施“稻改旱”工程，并逐步扩大到了承德等地区，北京市对进行“稻改旱”的农民进行补偿，补偿资金逐步由开始的每年 450 元/亩提高到了 550 元/亩；2007 年，北京市启动了以承德、张家口为主要区域的支持周边欠发达地区发展基金；2009 年，北京市政府与河北省政府合作开展了生

态水源保护林建设。同时，北京市通过产业转移和异地发展方式支持上游地区经济发展，北京农产品加工企业进入承德，合作涉及种植、养殖、农业循环经济等。此外，京张两地政府围绕旅游开发、农产品基地建设、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转移和承接等签约多项合作项目。

在津冀生态合作上，2008 年，津冀两省市签署了《关于加强经济与社会发展合作备忘录》，其中包括两省市加强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合作事宜，确定天津市财政在 2009 年到 2012 年每年安排 2000 万元专项资金支持河北省境内对维护引滦水源水质有直接作用的生态治理项目。天津和河北将共同加强水源地保护，共同推动潘家口、大黑汀水库水源地的保护规划实施工作，加大天津市在河北省境内实施的“引滦水源保护工程”的合作力度；2011 年—2014 年，天津市每年安排专项资金 3000 万元，用于河北省境内引滦水源保护工程。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因素

从历史上看，京津冀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有着很高的依存度和关联度。但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受到空间布局不合理、城镇体系出现断层、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增强等种种问题的制约。

（一）京津两市存在虹吸效应

北京市是我国的首都，基础设施比较完善，经济持续繁荣，对投资的吸引力巨大，吸引了众多银行和大企业的总部，区县政府及开发区也吸引了一些国内外企业，工业增加值超过河北许多地级市。由于企业的集聚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导致人口增长过快，常住人口超过 2200 万，城市范围不断向外蔓延，造成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天津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也不断加快，天津滨海新区由于政策优势，吸引了大量企业入驻，近年了发展迅猛。在“虹吸效应”作用下，要素向两大都市集聚的势头很难扭转，而河北各市均缺乏吸引力，与京津的差距越拉越大。

（二）京津冀城镇体系存在断层

整个京津冀地区常住人口 1000 万以上的大都市有两个，人口 300 万~1000 万规模的城市一个也没有；二是 2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只有一个，多数城市常住人口在 100 万左右（见图 1）。

根据城市中心地原理，城市规模是功能的表征，城市规模差距过大，表明城市功能和产业结构差距较大。一方面京津的高端产业很难在京津冀内部形成带动和纵向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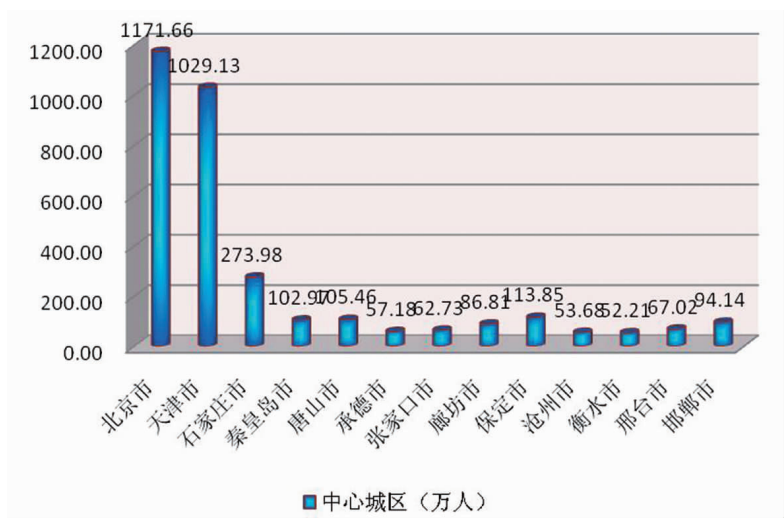


图 1 京津冀各市市区常住人口比较

另一方面周围产业层次过低也难以对北京的高端产业形成市场需求和支撑。城镇体系断层制约了区域产业合作，有限的合作多为浅层次的旅游、楼宇、养老、都市农业等，区域整体比较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三）京津冀之间经济发展落差过大

北京、天津综合实力最强，而河北的经济实力较为薄弱，与两大直辖市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上都存在巨大落差。从工业化进程上看，北京已基本跨入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而河北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第一、第二产业比重很高，第三产业比重很低。北京和天津的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高出河北省一倍多（见图 2）。河北省的城镇化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个百分点（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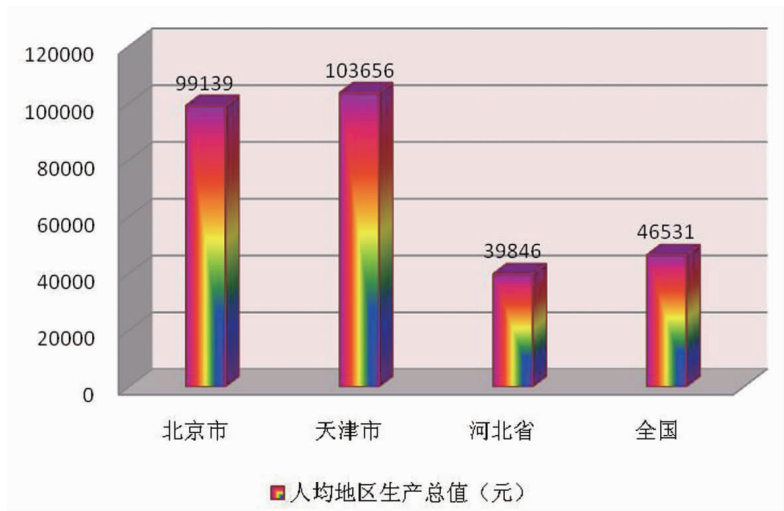


图 2 2014 年京津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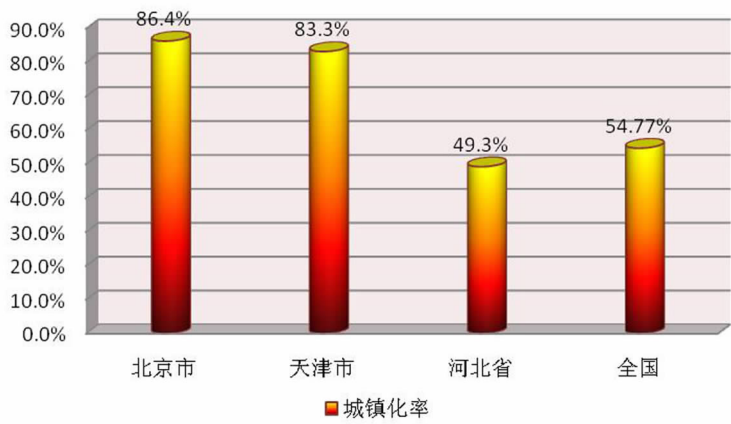


图 3 2014 年河北省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对比

在京津的北部不太远的地方，存在连片的贫困地区，被媒体称为“京津北部贫困带”。2005 年 8 月 17 日，亚洲开发银行的一份调查报告首次提出，在国际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围，环绕着河北的 3798 个贫困村、32 个贫困县，年均收入不足 625 元的 272.6 万贫困人口。

河北省发改委与河北省扶贫办 2011 年 9 月的调研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环首都贫困地区有 25 个国家级和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贫困人口 235.9 万人，占全省贫困人口的 42.1%。

上述问题形成的原因是体制造成的行政分割影响了要素流动、规划缺失及合作机制不健全。应抓住空间布局优化这一有效举措，通过规划控制，弱化京津两市的虹吸效应，增强两市对河北的辐射力，增强河北各市的吸引力，引导要素向河北各市流动，疏解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消除城市体系断层，才能够缩小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实现协同发展。

三、优化空间布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点

根据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按照“缓解京津两市的人口压力，壮大河北省地级市实力，提升新区吸引力，增强城镇承载力”的基本思路，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区域发展合力，通过规划与政策手段，引导人口合理分布和适度集聚，构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形成“一轴两带、三核引领、四圈互动、多点支撑”的开放合作的空间格局。

（一）一轴两带

在京津两市之间，河北廊坊近年来发展迅猛，北京亦庄、天津武清借助开发区的各种优势，集聚了大量产业，城市连绵区的雏形已经显现。随着天津滨海新区的开发开放、

河北产业重心东移、曹妃甸重化工园区的建设，在渤海沿岸一个临海产业发展带正在形成。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已将京广线规划为全国的发展轴^①，如把“京广线”比作中国的“脊椎”的话，从邯郸到北京的北段则是中国的“颈椎”，背依太行山，面向大平原。“一轴两带”共同构成“Z”型空间发展轴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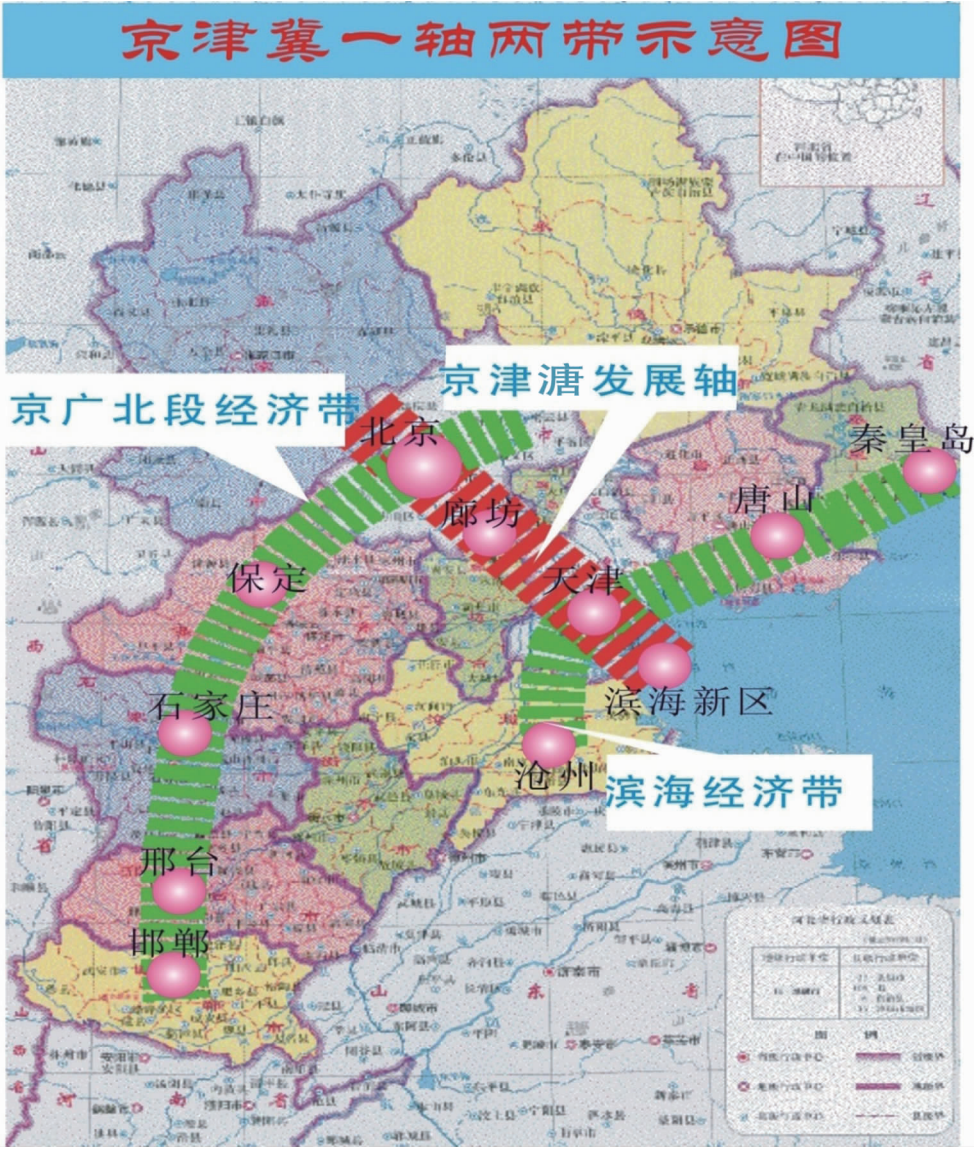


图 4 京津冀“一轴两带”示意图

1. 京津塘发展轴

京津塘发展轴西起北京中关村，东至天津滨海新区，是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轴。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逐步形成以沿海及京广京哈线为纵轴，长江及陇海线为横轴，若干城市群为主体，其他城市和小城镇点状分布，永久耕地和生态功能区相间隔，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城镇化空间格局”。

沿线分布有中关村高科技园区、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通州光机电一体化产业基地、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廊坊高新技术产业园、天津逸仙国际工业园、武清新技术产业园、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宜兴埠新技术产业园区、塘沽海洋高技术园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等，集中了京津冀地区众多的高新技术企业，具有良好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基础和条件。北京、天津和河北相互镶嵌，是京津冀区域的浓缩。该区域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导向，以物流、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为纽带，重点打造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带动京津冀区域整体发展，促进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未来，将逐步成为世界知名的高新技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密集带。但该轴有发展成为都市连绵区的趋势，因此，在规划上应强制保留一定规模的农田、林地和湿地，防止形成一张“大饼”。

2. 滨海经济带

滨海经济带北起秦皇岛，南至沧州，包括秦皇岛、唐山、天津滨海新区与沧州，处于渤海岸线的中间区段，区位条件优越，拥有众多港口，腹地广阔，对外联系便捷，具有发展重化工业得天独厚的条件。未来将依托沿海港口优势，进一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推动产业向沿海地带转移，吸引更多的产业向经济带集聚。利用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石油化工（以天津滨海新区与沧州为重点）、钢铁（以唐山为重点）、造船及装备制造（以天津滨海新区和秦皇岛等为重点）、能源（以沧州与唐山为重点）等临港型工业，发展进出口贸易、出口加工和国际物流业，形成我国北方主要的钢铁、化工、能源和国际物流基地。

3. 京广北段（京—石—邯）经济带

京广北段北起北京，经保定、石家庄、邢台到邯郸。该经济带位于京津冀中南部地区，以京深高速公路与京广铁路为纽带，与北京、天津的联系非常密切，易于接受北京、天津的辐射。该经济带具有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科技人才优势、制造业基础和有利的区位条件。要发挥加工制造业现有基础与地缘优势，积极承接京津制造业转移，大力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加强与京津在资源开发、金融合作、产业协作配套等方面的合作，加速传统产业技术进步和升级，重点发展能源、原材料、医药、纺织服装、农产品加工等产业，积极发展汽车零部件、新能源设备等装备制造业，形成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医药生产基地、装备工业基地、纺织基地与食品饮料生产基地。

（二）三核引领

京津冀有北京、天津两大都市，但京津两市距离很近，又居于区域北部，很难辐射

到中南部地区，在河北省中南部地区，应崛起一座现代化城市，辐射带动河北中南部地区，乃至山西、山东一部分地区。石家庄就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一方面其是河北省的省会，有比较好的城市功能和产业基础，在中南部是城市规模最大的城市。京津冀要变双核引领为三核引领，变“双城记”为“三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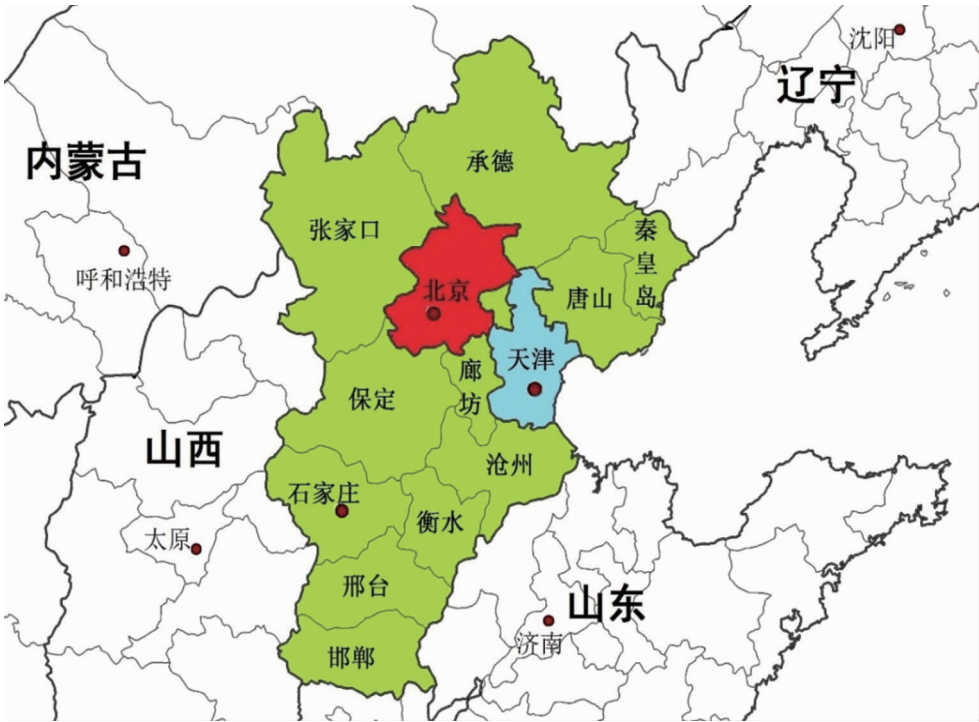


图 5 京津冀“三核”示意图

1. 北京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其主要功能是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应把非首都功能逐步疏解出去。应充分发挥首都文化、科技、教育等优势，坚持继承与发展并重，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着力提升城市魅力，增强文化服务功能，加快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扩大文化传播交流，不断增强文化的民族性、开放性与时代性，进一步提升国家和民族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努力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文化中心。全力以赴抓好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切实发挥其引领带动和支撑作用，着力聚集整合创新要素，着力加强创新制度安排，着力推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建设成为全球创新中心。

当前北京市功能过于集中，人口增加过快，带来了交通拥堵、环境恶化、土地资源紧张等诸多问题。应将与首都功能定位不一致的功能和产业逐步疏解出去，腾退出空间专注于创新、文化等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

2. 天津

天津是我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我国近代工业发祥地，毗邻渤海，交通发达。应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滨海天然优势、特殊的水陆交通枢纽地位、雄厚的工业基础和科研力量，把天津建设成以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构筑海陆空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使天津成为连通国际和区域（华北、东北、西北、华东）的客货运综合交通枢纽。优化物流基地布局，培育仓储、加工、运输、信息、服务相互融合的现代物流业，使天津成为面向区域物流供应链的中心节点，承担我国北方国际物流中心的职能。加强金融、商贸、会展、科技、信息、文化教育等服务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信息汇集、各类传媒业发达、商贸兴旺、科研文化医疗机构和人才集中的区域性服务中心。天津市应实现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把中低端产业疏解出去，不能兼收并蓄，应把产业链条向河北延伸，着力提升辐射功能。

应充分利用天津市山、河、湖、海共生，湿地众多等丰富的自然资源，建立生态型城市，增强城市自然环境的优美度、人工环境的舒适度，提供良好的人居环境，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打造生态环境良好的宜居城市。

3. 石家庄

石家庄市介于京津两市辐射区的边缘，既能接受京津两市的辐射，又有自身广阔的腹地，具有要素集聚和规模扩大的潜力，应发展成为仅次于京津的大城市，成为京津两大都市的二传手，向冀中南地区辐射，带动冀中南地区的发展。

石家庄是河北省的省会，居京津冀的中心地带，素有“南北通衢、燕晋咽喉”之称，是以医药、纺织、商贸物流等产业为主的综合型城市。石家庄具有发达的公路、铁路、航空基础条件，是我国北方地区重要的客、货中转站，是全国重要铁路枢纽和环京津地区最大的货运空港；石家庄火车站是全国三大货物编组站之一，民航机场是国家批准的国际口岸机场。石家庄和郑州一样是连接京沪、京广、京九、同柳（大同一柳州）四条南北铁路大动脉的交通枢纽。依托优越的区位交通优势、各具特色的专业市场和发达的商贸流通业、现代物流业，石家庄表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未来，石家庄要依托优越的地理条件和交通优势，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全面振兴服务业，改造提升医药、纺织服装等传统优势产业，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提升城市经济能级，迅速发展成为河北最大的综合性现代化中心城市，成为名符其实的京津冀区域“第三极”。

（三）四圈互动

京津冀作为规模较大的城市群，包含了北京都市圈（或称首都经济圈）和天津都市

圈，随着石家庄和秦皇岛城市规模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也会形成都市圈或城市圈。未来，四大都市圈将形成互动关系。

1. 北京都市圈（首都经济圈）

尽管北京市城市规模很大，根据测算，辐射半径不超过 200 公里，其辐射力由内向外不断减弱。在辐射圈内的地级市有保定、廊坊、张家口、承德。北京的产业将向都市圈内延伸，北京的服务业也会覆盖到整个都市圈。河北省的小城镇通过承接北京市的产业转移而获得较快发展，周边农村地区的农业为满足北京市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将获得发展机会。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应提出都市圈同城化的目标。

2. 天津都市圈

天津市是京津冀第二大城市，作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国际航运中心，产业应向高端化发展，对周边的区域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其都市圈的范围向南可达沧州，向北可达唐山，向西可与北京共同辐射廊坊地区。该都市圈内三市毗邻渤海，有三大港口，应加强分工与协作。天津市借助自贸区，服务业可望快速发展，其服务应向两翼延伸。

3. 石家庄城市圈

石家庄与北京、天津两市相比，无论是城市人口还是经济总量均不可同日而语，如称都市圈将备受质疑。但石家庄地处冀中南，腹地面积很大，南有邢台、邯郸，东有衡水、北有定州，西可辐射山西东部。城市靠腹地支撑，腹地靠城市带动。从需要与可能来看，石家庄具有非常大的发展潜力，有希望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城市。石家庄市也面临很多制约因素，产业结构调整压力巨大，空间布局也很不合理。未来，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机遇，石家庄将加速崛起，石家庄都市圈的称谓将不再受到质疑。

4. 秦皇岛城市圈

和京津冀其他城市相比，秦皇岛城市规模较小，也比较分散。以秦皇岛为核心形成城市圈或都市圈，肯定心存疑虑。但秦皇岛距离北京和石家庄距离北京一样，都是 290 公里，距离天津 220 公里，难以接受北京市和天津市的辐射与带动，可以说，秦皇岛处于京津冀城市群的边缘地区。但秦皇岛有比较大的腹地，辽宁西部、内蒙古东南部均是其腹地，生态环境良好，旅游资源丰富，可以承接北京市的功能疏解。现有四大组团均有较大的发展空间。通过产业聚集尤其是国际名片的打造，秦皇岛的城市价值将得到凸显。

（四）多点支撑

此处所谓多点，包括各地级市的中心城区、新区和开发区、县城、建制镇等。众多县城与数以百计的建制镇，都是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点。尤其是既不在轴上，也不在

带上的张家口、承德与衡水三市，应以集聚为主，发挥京津冀北部地区中心作用和支撑点作用。要打造产业集聚平台，改善投资环境，提高产业吸引力，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提高所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

1. 地级市的中心城区

唐山、邯郸、保定、廊坊、沧州、秦皇岛、邢台、张家口、承德、衡水 10 个地级市的中心城区，有些超过 100 万人，有些尚未超过 100 万人，均与京津两市存在较大的落差。应切实加强与北京、天津在资源配置、职能分工、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衔接协调，全面改善人居环境和投资环境，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增强经济实力，增强吸引力（吸引外部资源的能力）、辐射力（带动本地区的发展）和支撑力（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

2. 战略性功能区

包括中关村、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曹妃甸新区、北戴河新区、渤海新区、正定新区、冀南新区、京东新区、京南新区等以及国家级或省级开发区，是未来京津冀地区的战略性功能区。尤其是新区，是新的产业集聚区，是新的城市规划区，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极。通过增加投入、政策优惠、体制创新，将有效改善投资环境，成为世人瞩目的地方，吸引国内外资本、产业向新区集聚。

3. 县级市的市区、县城和建制镇

在城市群里，中小城市的区位优势将逐步弱化，成本优势将逐步强化。县级市的中心城区和县城，将获得发展的机遇，应重点培育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带动作用强的县级市，壮大实力、扩大规模，提升档次，打造一批 30 万人口左右的宜居、宜业、宜游的中等城市。支持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区位条件优越、产业带动作用强的县城加快发展，围绕做大做强县城，提升区域辐射带动作用。建制镇应按照国家资源型、工业型、农业型、旅游型等不同类型，分类引导发展。打造一批具有战略支撑作用的产业集群。

四、培育经济增长极是河北省未来的着力点

经济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在空间上并非均匀分布，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上，然后通过不同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空间产生影响，辐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珠三角区域的深圳、长三角区域的浦东及京津冀区域的天津滨海新区都是成功运用增长极理论取得明显成效的范例。

上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设立了深圳特区，规划面积 500 多平方公里，国家给予了强

有力地支持，并赋予非常优惠的政策，在管理体制上不断创新，吸引了全国各地许多优秀的人才，也吸引了港澳台大量的投资。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深圳由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不仅自身发展速度快，也带动了整个珠三角区域的发展。深圳的成功印证了增长极理论的正确性和有效性。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发开放浦东成为我国又一个重大战略举措。设立的浦东新区面积也是 500 多平方公里。资金支持、政策优惠、体制创新，使浦东新区吸引了大量国际跨国公司入驻。陆家嘴商务中心区拔地而起，短短几年便成为上海市的标志区。浦东的发展比深圳更快，不仅有效地疏解了浦西的城市功能，减轻了浦西的人口压力，也带动了长三角区域的发展，使长三角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的发动机，成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在深圳、浦东的带动下，东南沿海、东部沿海地区的改革开放步伐很快，经济实力也同步提高。但北部沿海改革开放比较滞后，经济发展速度也比较缓慢。2005 年，促进天津滨海新区发展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意味着天津滨海新区被纳入国家战略，并明确将其培育成为北方地区新的经济增长极。不到十年时间，天津滨海新区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深圳、浦东和天津滨海新区分别被称为第一、第二、第三经济增长极。他们的成功和国家的政策支持、资金支持与体制创新是分不开的，三大增长极无疑是培育起来的。毋庸置疑，当他们快速发展时，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发展。

京津冀未来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新的经济增长极，所谓新的经济增长极就是在空间范围不太大的地方，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实施高效管理，并辅之于优惠政策，使其快速聚集经济要素，起到对一个区域的支撑作用。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示范区、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滨海新区之所以发展迅猛，就在于国家和各级政府的重视，在短时间内集中投入，完善基础设施，改善投资环境，成为“要素流动的洼地，吸引人才的高地，世人瞩目的胜地”，使众多投资者趋之若鹜。对于河北来说，要通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增强对产业和人口的吸引力，成为京津冀区域的新亮点。京津冀区域虽处于东部，但区域内部的差异很大，突出表现在北京与河北的差距上。除了疏解北京市的非首都功能之外，加快河北省的发展应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环节。在河北选择一些具有优势和发展潜力的地区设立新区，通过打造产业发展平台，改善投资环境，吸引产业聚集，是加快河北省发展的重要举措。

现在河北省已设立了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北戴河新区、正定新区、冀南新区。但都是省政府设立的，支持力度不大，效果不十分明显。如能选择一到两家升级为国家级新区，国家给予强有力支持，必将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国务院批复的《关于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国函〔2011〕133 号）中明确指出：“以沿海高速

和滨海公路为纽带，合理规划建设北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沧州渤海新区，促进人口和产业有序向滨海地区集聚，建成滨海产业和城镇集聚带。”国务院批复的《中原经济区规划》明确提出“邯郸依托冀南新区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成为在中原经济区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心城市”。可以说，这四个新区在国家规划中均榜上有名，只是因为规划没有上报国务院审批，而没能置身国家级新区之列。

1. 北戴河新区。位于北戴河区南部，应以打造旅游休闲旅游之都为目标，重点发展高端旅游、科技研发、商务会展、文化创意等产业，承接北京的功能和产业转移，建设中国北方和环渤海地区现代化旅游宜居城市、国家级绿色环保示范区。北戴河新区距离北京市 270 公里，乘坐高铁不到一小时时间，区位好、气候好、空间大，可以承接北京市科研、文化、教育、医疗等诸多功能的疏解。

2. 曹妃甸新区。位于唐山南部沿海，和天津滨海新区毗邻，应依托曹妃甸深水大港及土地资源的优势，全力打造新型工业化基地、商业性能源储备基地和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加快曹妃甸工业区、海港开发区等重点临港产业聚集区建设步伐。加强与北京市合作，加快培育精品钢材、装备制造、石油化工和港口物流等临港优势产业和电力、出口加工等关联配套产业，形成与京津互补、特色鲜明、地位突出的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冀东沿海中心城市、环渤海地区重要国际港口城市。

3. 渤海新区。位于河北省东部，东临渤海，南接山东，北依京津，海岸线 130 公里；港口、区位、交通、腹地、土地和环境容量、产业等综合优势明显。区内的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穹顶处，是河北中南部六市、神黄铁路沿线和晋陕蒙等中西部地区陆路运输距离最短的港口，全国第二大煤炭输出港。307 国道、205 国道、海防公路、石港高速、津汕高速、朔黄铁路、邯黄铁路、邯黄高速、保黄高速、沿海高速形成了便捷的交通网络。新区有广阔的非农用地、盐田、滩涂和浅海资源，土地资源是最大的比较优势和资本优势。发展定位是：依托京津冀，服务冀中南、晋中南、鲁北、豫北，成为朔黄铁路沿线及陕西、内蒙等地区最便捷的出海口，石油化工、装备制造业研发转化基地和以港口物流为基础，城市配送物流为支撑的区域性航运中心，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滨海新城。要建成为中国北方著名的区域性综合大港和能源、原材料集散中心，绿色国际化工城，京津冀重要的新兴港口城市。

4. 冀南新区。位于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地区、邯郸市中心城区南部，2012 年 10 月 19 日，冀南新区成立。新区交通便捷，京广、邯济、邯长、邯黄、京广高铁五条铁路和京港澳、青兰、邯大三条高速纵横交错；京广高铁贯通南北，两个小时可到北京；邯郸机场已开通上海、广州、重庆等八条航线。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传统支柱产业优势明

显，装备制造、煤化工、新材料、现代物流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新区范围内拥有山区、丘陵、平原、森林、湿地、温泉等自然生态资源。冀南新区将致力于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基地、区域现代物流枢纽、中原经济区与京津冀区域的共同支撑点。

5. 正定新区。位于石家庄市滹沱河北岸，正定县城东部，紧邻石家庄机场，是石家庄市的重要支撑点，也是京津冀的重要支撑点，是提高石家庄市吸引力和辐射力的关键所在，国家与河北省应给予重点支持。正定新区应结合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区位条件，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在正定新区迅速成长和集聚，真正培育起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产业体系。发展知识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相结合、高附加值制造业和一般制造业相结合、传统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相结合，宜居关联产业为配套的产业体系。综合分析来看，冀中南地区由于城市规模小，辐射功能有限，至今仍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规划建设石家庄正定新区，将其培育为冀中南地区的经济增长极，不仅对石家庄市起到规模扩大、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而且能够起到辐射带动冀中南地区的作用。

北戴河新区、曹妃甸新区、渤海新区、冀南新区、正定新区对当地发展及京津冀协同发展将起到十分重要的支撑作用，应作为河北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的着力点，同时应得到国家的重视，建议将其上升为国家级新区，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举措。通过国家的支持，将其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 1. 肖金成等著：《京津冀区域合作论》，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 2. 肖金成、李忠等：《京津冀区域发展重大问题研究》，研究报告（国家发改委地区司委托，国家开发银行资助）2013 年。

责任编辑：沈家文、任朝旺

· 宏观经济 ·

2015 年宏观经济运行回顾与展望

杨琳

摘要：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呈现七大特点，即经济增速趋稳、结构调整取得进展，投资降幅收窄、基建投资拉动效应明显，消费稳定、传统消费下降与新兴消费兴盛并存，外贸疲弱、外贸结构优化，部分地区和产业发展分化严重，物价前低后高，宏观调控政策与微观产业政策加力增效；与此同时，在一系列政策调控与市场力量交织作用之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主要体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减、结构调整缓慢、金融对实体经济传导机制不畅、潜在金融风险积聚等四个方面；下阶段需要科学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并切实抓好宏观调控政策落地，确保实现全年经济发展目标任务并为下阶段经济平稳运行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宏观经济 回顾 展望

作者简介：杨琳，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博士。

2015 年既是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经济发展开始步入“新常态”的开局之年，更是“稳增长”与“促转型”的交织之年。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增大，宏观调控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凸显，能否做到稳中求进、全面达成“2015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7% 左右、价格涨幅 3% 左右、就业略有增长”的全年经济工作任务目标，仍需付出诸多努力。

一、2015 年经济运行特点与原因

2015 年中国经济稳步发展，呈现经济增速趋缓、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格局，前三季度运行呈现出以下七大特点：

（一）经济增速降中趋稳，经济结构调整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5 年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降至 6.9%，较上年同期和上年末均下降 0.4 个百分点，处于 2009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第三产业贡献度持续上升，一季度、二季度和三季度分别为 56.8 和 56.7%和 58.9%，不仅创 1978 年以来最好水平，而且分别较上年同期提高五个、七个和九个百分点，均超过同期 GDP 增速 0.4 个百分点的下滑幅度。需要指出的是，第三产业贡献度上升并非简单的由于第二产业增长下滑出现的“衰退型”上升，而是实质性改善，这是由于前三季度第三产业累计同比增速达 8.4%，创 2012 年以来最好水平，超过同期 GDP 增速 1.5 个百分点，而第二产业累计同比增速仅较同期 GDP 增速下降 0.9 个百分点（如图 1 和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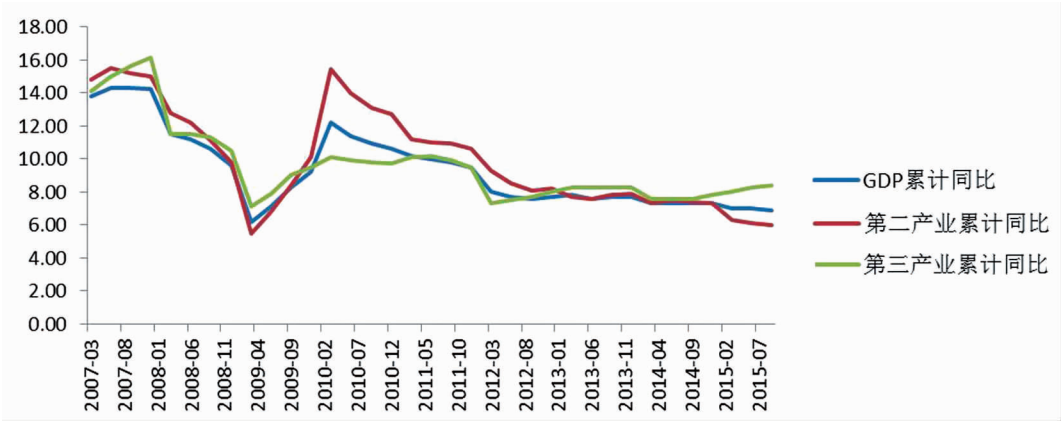


图 1 2007 年—2015 年三季度中国 GDP 及第二和第三产业同比增速对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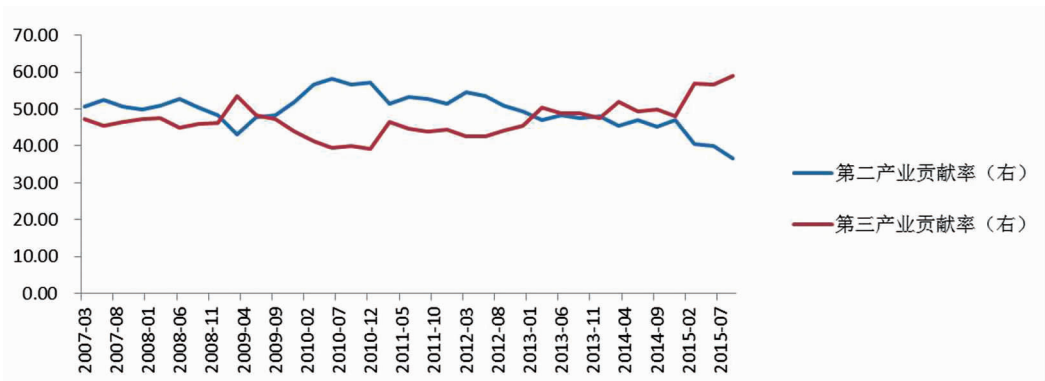


图 2 2007 年—2015 年三季度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贡献率比较 (%)

（二）投资增速降幅收窄，基建投资稳定效应显现

2015 年中国投资增速持续下降，前三季度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名义同比增速为 10.3%，创 2000 年 6 月以来最低；与此同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同比增速逐月走低，从 2 月的 13.9%持续降至 9 月的 10.3%，实际累计同比增速从一季度的 14.5%降至三

季度的 12%。虽然累计投资增速持续下滑，但逐季来看，当季投资增速出现企稳迹象，当季实际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从一季度的 14.5% 降至二季度的 10.67% 后，三季度维持在 10.68% 的水平。分产业看，前三季度占比分别为 41% 和 56% 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累计投资增速均创 2002 年 3 月以来最低，且第二产业增速一改 2002 年—2012 年多数年份带动并拉动固定资产投资的格局，自 2012 年 12 月以来连续 34 个月低于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增速，而第三产业投资增速始终高于总投资增速。分类别看，房地产和制造业累计名义增速过快下降是引致投资下降的主因，二者从 2004 年—2013 年间常年运行在 20% 以上，今年 2 月的 10.6% 和 11.3%，分别快速降至今年前九个月的 3.8% 和 8.3%，各自较上年同期下降 8.8 和 5.5 个百分点，基建投资成为稳定投资的核心要素，前九个月同比增速 18.07%，仅较上年同期水平下降 2.88 个百分点（如图 3 所示）；同时，三季度当季房地产实际投资增速达 5.84%，较大幅度超过二季度当季 2.06% 的增速，对三季度当季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速趋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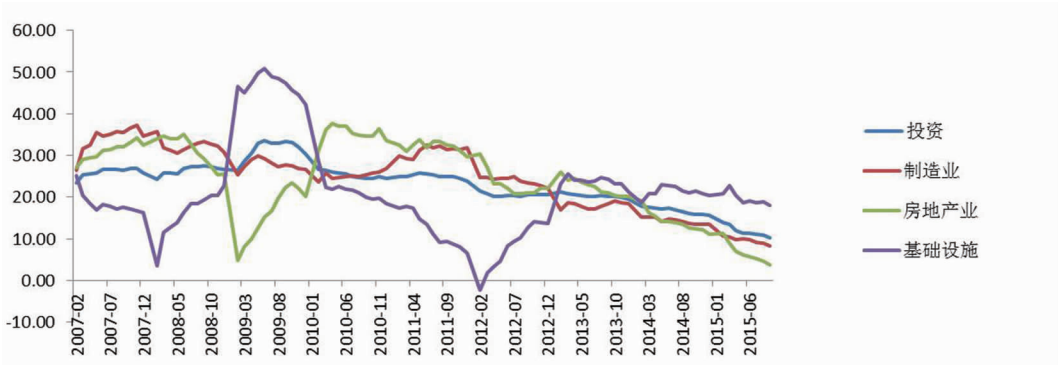


图 3 2007 年—2015 年三季度中国投资及投资主要领域名义累计同比增速比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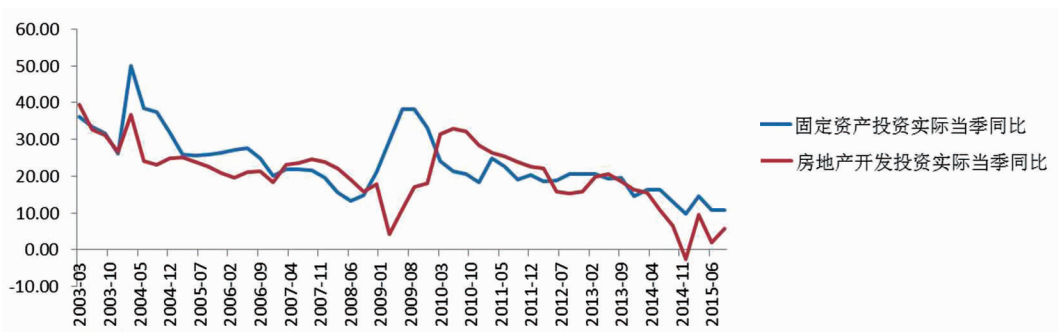


图 4 2003 年—2015 年 9 月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开发投资实际当季同比 (%)

（三）消费增速保持稳定，传统消费下滑与新兴消费和休闲娱乐消费兴盛并存

今年前九个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为 10.5%，超过今年前四个月到前八个月 10.4% 左右的水平；前九个月消费实际增速 10.5%，与今年前四个月到前八个月基本

持平，较为稳定；今年4月以来消费实际增速基本呈逐月走高态势，当月实际同比增速从4月的10%逐步提升至9月的10.9%，对稳定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分城镇和农村看，前九个月农村消费和城镇消费增速分别为11.7%和10.3%，各月农村消费增速始终高于城镇消费增速，尽管农村消费仅占总体消费比重的14%左右，但其稳中有升的较好增长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领域。分销售渠道看，网上商品和服务等新兴消费渠道快速增长，前九个月同比增速高达36.2%，远超过传统消费渠道10%左右的增速。分消费类别看，消费占比高达25%和14%的汽车和石油制品下滑幅度最大，前九个月二者增速分别为4.2%和-6.9%，不仅较大幅度低于上年同期9.1%和8.1%的水平，而且低于10.5%的名义消费增速，对消费增长形成很大制约；与此同时，食品、餐饮、建筑装潢、家具、办公用品等消费保持快速增长，增速普遍快于上年同期2~3个百分点，通讯器材消费更是以35.8%的近十年较高增速超过上年同期12个百分点，电影票房收入同比增速超过50%，商务部重点监测零售企业体育娱乐用品销售同比增长8.3%，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4.4个百分点（如图5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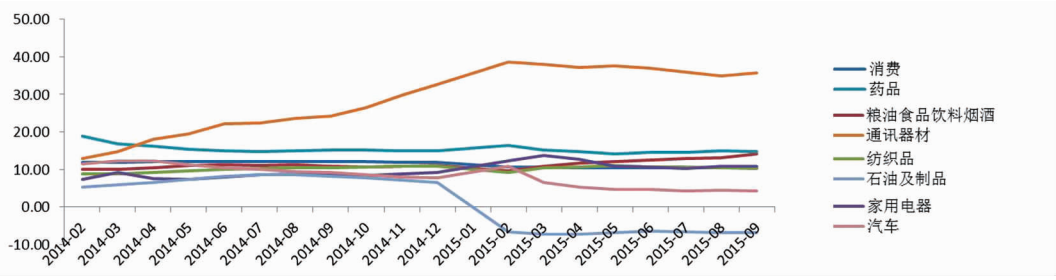


图5 2014年—2015年三季度中国消费及主要类别消费同比增速对比（%）

（四）外贸持续疲弱，外贸结构继续优化

受国际需求放缓、大宗商品价格低迷以及2014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2015年中国外贸步入了美国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时期，不仅进出口总额连九个月下滑，而且下滑幅度普遍在7%~8%左右的历史较高水平，这都是美国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值得高度重视和反思。随着外贸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措施效果的逐步显现，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速下降8.1%，处于今年2月以来的较低水平；逐月看，出口增速降幅收窄，从7月的-8.9%降至9月的-3.7%，但进口增速降幅继续扩大，从6月的-6.8%快速升至9月的-20.4%。价值分析表明，进出口总额的持续快速下滑，主要是由于占比43%的进口总额大幅下降所致，今年前九个月，进出口总额下降了8.1%，其中进口总额下降15.3%，而出口总额仅下降1.9%。量价分析表明，进口总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全球通缩、商品价格大幅走低引致的进口商品价格大幅走低所致，今年前八个月进口数量同比

增长 0.7% 而价格下降 15%，促使进口下降 14.4%；出口总额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出口数量和出口价格下降共同引致，今年前八个月出口数量下降 2.8%，而出口价格下降 3.5%，带动出口价值下降 6.1%。结构分析表明，今年前九个月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 2.5% 和 -5.8%，与出口 -1.9% 的增速相比，出口结构进一步优化。与此同时，尽管进出口总额不尽人意，但进出口结构继续优化，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和出口占比分别从 2012 年的 24% 和 26%，提升至今年 9 月末的 31.9% 和 27.7%；今年前九个月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和出口同比增速虽然下降，分别为 -1.5% 和 -0.3%，但其降幅较大幅度低于同期进口和出口 -15.3% 和 -1.9% 的降幅；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同比增速与同期进出口总额增速差额扩大，分别从去年全年的 -5.9% 和 -1.7%，升至今年前九个月的 13.8% 和 1.6%（如图 6 和图 7 所示）。此外，中国对美欧及东盟的出口继续保持稳定，对俄罗斯、巴西、日本、韩国和香港的出口有不同程度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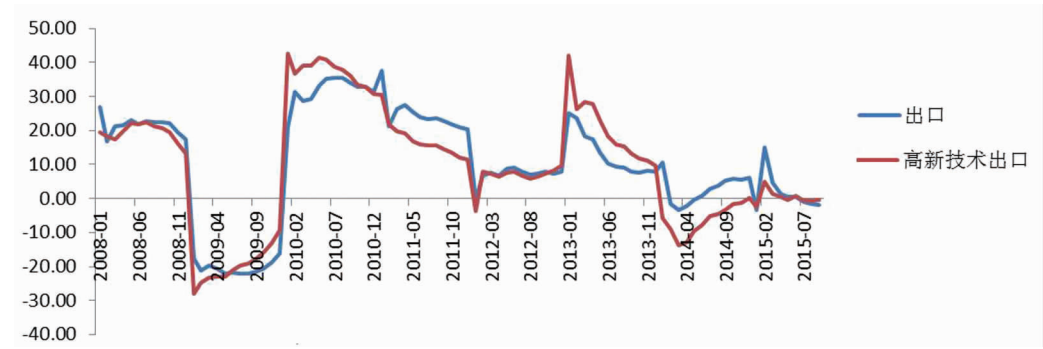


图 6 2008 年—2015 年 9 月中国出口和高新技术出口同比增速对比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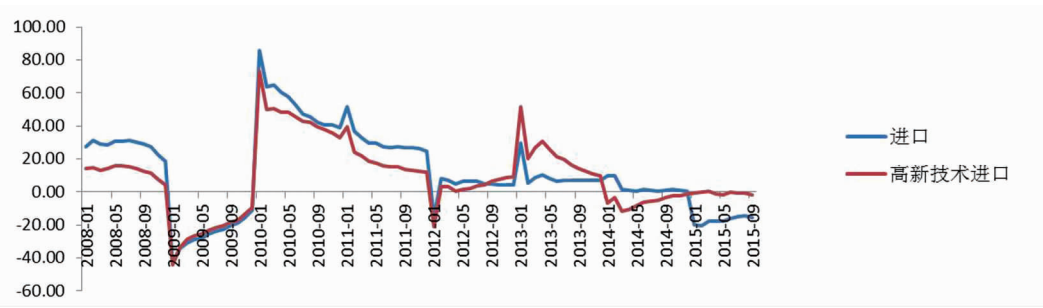


图 7 2008 年—2015 年 9 月中国进口和高新技术进口同比增速对比 (%)

（五）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和部分工业行业收入利润出现深度回调

今年以来中国各省市经济发展出现严重分化，部分经济规模较大的省市经济出现深度回调，对全国经济稳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产业结构单一、过度依赖重化工业的省市经济增速下滑较快，今年上半年辽宁、山西、黑龙江、吉林和河北的 GDP 实际

增速分别仅有 2.6%、2.7%、5.1%、6.1%和 6.6%，不仅创 2005 年有数据以来最低水平，而且与去年同期相比跌幅过大，其中辽宁和山西跌幅高达 6.7 个百分点，黑龙江、吉林与河北跌幅为 2~3 个百分点，而这五个省都是过去排名前 20 名的经济大省，GDP 占比合计超过 15%，其经济增速下滑对全国影响较大；另一方面除浙江和重庆外，其他 24 个省市 GDP 增速均较上年出现不同程度下滑，个别持平，使全国经济增速回落。

美国金融危机后，中国工业形势日益严峻，工业增加值从 2010 年—2011 年的 15%左右持续降至今年前九个月的 6.2%；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从 2010 年—2011 年的 30%左右、2012 年—2013 年的 10%~15%、2014 年的 7%~8%快速降至今年前八个月的 1.3%；前八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速 -1.9%，处于 2009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与此同时，随着去产能和去库存的企业经营行为自主调节深入推进，中国工业企业经营效益小幅好转，今年前八个月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率 5.38%，不仅超过今年前二个月 4.9%的年内最低水平，且与今年前五个月 5.38%的次低水平持平，而且已达到 2012 年以来的平均水平。尽管如此，中国工业领域中部分行业出现深度回调，成为带动第二产业回调的最主要因素。受产能过剩加剧和集中在产能过剩行业产品价格大幅回调影响，今年前八个月以钢铁、煤炭、水泥、石油等为代表的采矿业、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利润总额出现深幅回调，其中，包括铁矿石、煤炭等在内的采矿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降幅最大达 -57%，其次为黑色金属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专用设备制造业，各自同比增速分别达 -52%、-8%、-4.5%和 -3%，均较大幅度超过整个工业利润总额 -1.7%的同比降幅，而这五个行业利润占工业利润总额比重超过 25%，其对工业利润总额贡献度高达 -8.6 个百分点，其中贡献最大的就是采矿业，高达 -6.6 个百分点；因此产能过剩是拉动工业乃至整个经济增速下滑的主因（如图 8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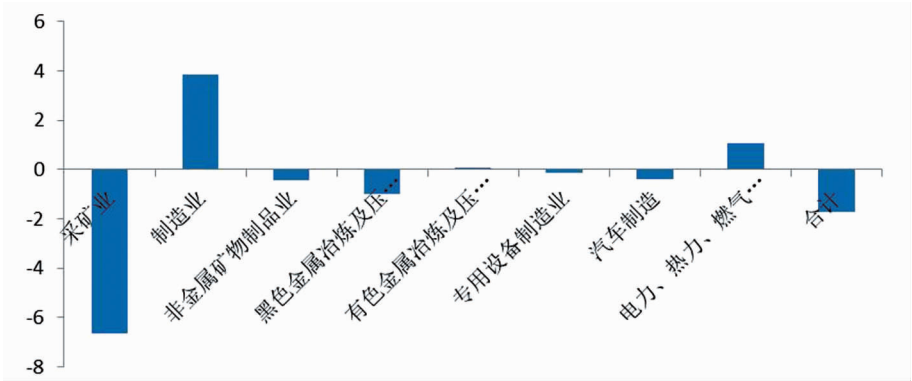


图 8 2015 年前八个月中国主要行业对工业企业利润拉动情况对比 (%)

（六）居民消费物价探底回升，工业品价格继续寻底

今年物价总水平呈现前低后高的特点，上半年当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基本在 1%~1.5% 的区间波动，三季度则跳升至 1.6%~2% 的区间波动，前九个月居民消费价格累计涨幅 1.4%，分别较上年同期和上年末下降 0.8 和 0.6 个百分点。今年物价当月同比从 1 月的 0.76% 震荡走高至 8 月的 2% 后 9 月再度降至 1.6%，这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特别是猪肉和蔬菜价格变化拉动的，食品和非食品价格当月同比分别从 1 月的 1.11% 和 0.59% 震荡上升至 8 月的 3.7% 和 1.1%，其后小幅降至的 9 月 2.7% 和 1%，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6 月—8 月连续三个月稳定在 1.7% 左右的水平，9 月再度小幅降至 1.6% 的水平，充分表明今年下半年物价走高的主要动力源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如图 9 所示）。今年前九个月工业品价格指数同比下降 5%，创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当月同比自 2012 年 3 月开始已连续 43 个月负增长，且今年以来负增长幅度加速扩大，从 2012 年—2014 年大多稳定在 -1%~-2% 的水平扩大至今年以来的 -4%~-5%，这与全球大宗商品持续走低、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大幅下滑密切相关，全球大宗商品指数（PPRIM）同样连续 42 个月负增长，且负增长幅度从 2012 年—2014 年基本保持在 -2%~-4% 的水平扩大至今年的 -5%~-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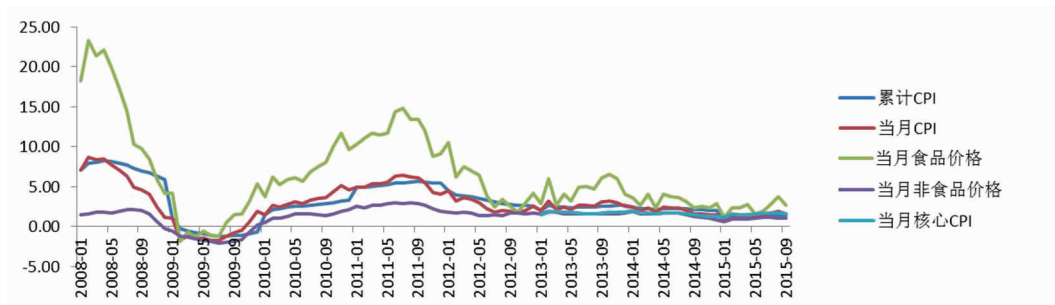


图 9 2008 年—2015 年 9 月中国物价指数及其分项指数同比变化（%）

（七）宏观政策宽松，产业政策增效

自 2014 年 11 月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和产业政策出现重大转折，结束了 2012 年 7 月—2014 年 11 月保持近两年半的中性稳健宏观调控，转化为力度持续加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以及积极的产业政策，对平抑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起到一定作用。货币政策方面，2014 年 11 月 22 日以来中国连续六次降息、四次降准^①，一年期基准利率从 2012 年 7 月的 3% 降至今年 10 月 24 日的 1.5%，且降息节奏有所加快，这六次降息中间隔时间

^①若按一次降准 0.5 个百分点计算，相当于降准四次；若按实际降准次数计算只降准三次，今年第二次降准一个百分点，但定向降准次数更多，幅度更大。

分别为三个月、二个月、一个月、二个月和二个月左右；大型和中小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分别从2012年5月的20%和18%降至今年10月24日的17.5%和15.5%；除此之外，央行还大量采用定向宽松措施，多次通过抵押补充贷款（PSL）、中期借贷便利（MLF）、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以及向国开行、农发行等政策性银行注资方式向市场提供流动性，通过滚动投放的方式保证定向注入流动性过万亿，在降低社会融资成本的同时，加快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如图10所示）。财政政策方面，2013年以来中央政府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取消、停征和减免了42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每年可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920亿元左右；加大小微企业扶持力度，通过降低税基等方式一年减免其税收近1000亿元，同时中央出资150亿元建立总规模600亿元中小企业发展基金；加大稳投资力度，一方面积极推进地方债务置换，今年地方债务分三次合计置换总额3.2万亿元，较好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及融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降低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比例要求5~10个百分点不等，分三年发行可用于补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的一万亿专项金融债，设立1000亿元公私合作模式（PPP）项目引导资金，重新允许符合条件的城投“债借新还旧”且要求银行不得抽贷，将各级财政回收的2500多亿元沉淀资金统筹用于急需领域，放开企业债发行条件（1327号文），切实解决政府投资资金瓶颈问题。产业政策方面，主要体现在外贸和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上，国务院除了通过下发简政放权等多项文件力推改革外，还下发了《关于促进进出口稳定增长的若干意见》《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的稳出口政策，以及《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推进网络提速降费的指导意见》等新兴产业促进意见，此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还在2014年10月推出了包含信息、绿色、住房、旅游、教育文化和老龄化消费六大消费工程包、2014年12月推出了清洁能源、油气、粮食水利、交通、生态环保、健康养老七大工程包、2015年7月推出了新兴产业、现代制造业、现代物流和城市轨道交通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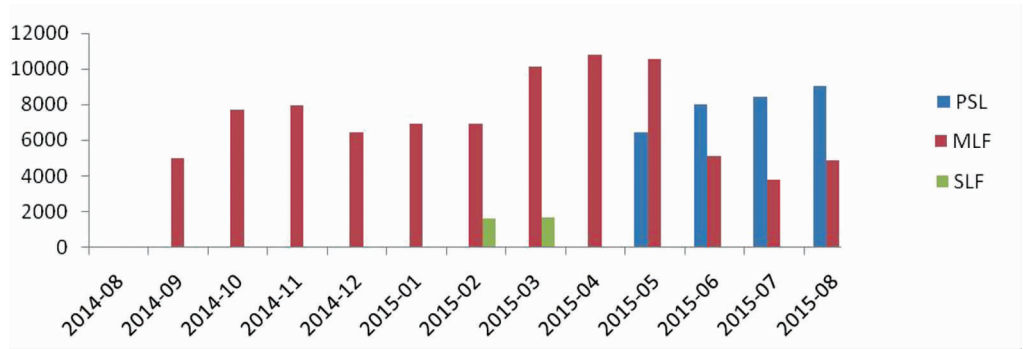


图 10 2014 年以来中国主要定向宽松工具余额变化（亿元）

大工程包，多措并举推动产业创新和加快新兴产业城镇化。

二、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主要矛盾

尽管 2015 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保持在 7% 的合理区间，但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尚不牢固，仍面临一系列亟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一）经济增长面临较大压力

从国际经济形势看，呈现复苏继续、态势趋缓的特点，对中国出口形成压力。美国方面，虽然今年一季度和二季度 GDP 同比增速分别为 2.88% 和 2.66%，8 月失业率降至 5.1% 的危机以来最低水平危机以前合理水平，房地产市场快速回暖，成屋销售价格超过危机前最高水平的 10%，销售数量超过危机前最高水平的近 20%，但其通胀水平仍在 0.1%~0.2%，劳动参与率只有 62%，与危机前 66% 的水平相差较大，房地产贷款不良率和违约率持续走高，房地产高涨格局是否能够持续有待观察，出口继续较大幅度负增长，经济复苏步伐可能放缓。欧洲方面，今年前二个季度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主要经济体持续复苏，欧元区失业率连续三个月保持在 11.1%，7 月 CPI 仅为 0.2%，是否再度扩大量化宽松（QE）已提到议事日程。日本方面，一季度 GDP 环比 4.2%，二季度 GDP 环比快速降至 -1.2%，与其消费大幅下滑密切相关，同时，剔除消费税影响后的 CPI 及核心 CPI 仍在零左右徘徊，复苏之路并不平坦。加之美国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 46%，特别是 2012 年以来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幅度达 20%，而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贬值幅度高达 20%~30%，也直接削弱了中国出口竞争力。

从国内经济形势看，呈现驱动因素不稳、增长动能不足的特点。驱动因素方面，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速达 7%，其中金融业同比增长 17.5%，直接拉动 GDP 增长 1.4 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的金融业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股票市场的快速上涨，而这种上涨是不可持续的，若剔除今年上半年股票市场火爆对 GDP 的拉动效应，即金融业对 GDP 的拉动恢复到上年同期正常水平，上半年 GDP 增速只有 6.3%；受清查场外配资等多方面因素影响，6 月 12 日以来中国股市持续大幅下跌了近 40%，年内股市难以再次大幅走高，上半年拉动 GDP 上升的这一重要因素缺失所带来的 0.7 个百分点的缺口较大，若出口仍然不振且没有其他新的可替代驱动因素出现，下阶段经济增长压力较大。增长动能方面，关键经济指标二季度均略有改善，但三季度迅即反复，增长动能不足。工业增长上，虽然今年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当月同比出现逐月改善迹象，从 3 月的 5.6% 回升至 6 月的

6.8%，但7月、8月和9月又掉头向下降至6%、6.1%和5.7%；出口增长上，当月同比增速从3月的-15%持续升至6月的2%，但7月、8月和9月再次下行至-8.3%、-5.5%和-3.7%，虽然再度下降，但降幅有所收窄；进口增长上，当月同比增速从2月的-20.7%逐月收窄至6月的-6.8%，但7月、8月和9月再次扩大至-8.4%、-13.8%和-20.4%，进口出现较大反复；投资增长上，固定资产投资当月名义增速从3月的9.58%持续升至6月的11.57%，但7月、8月和9月重新下探至9.88%、9.1%和6.83%（如图1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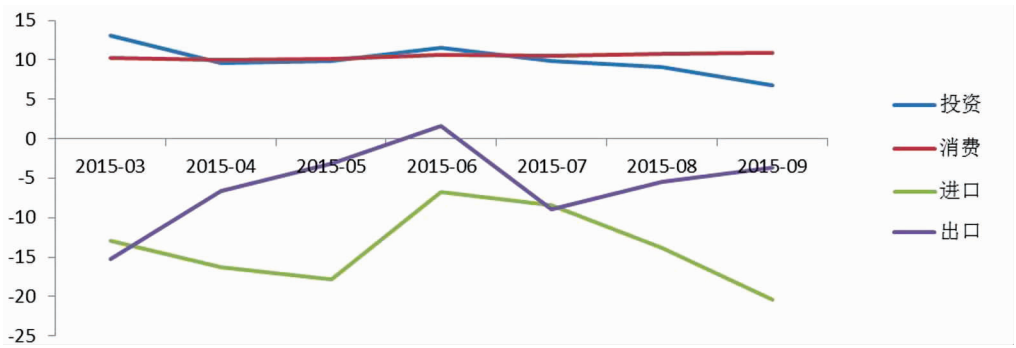


图 11 2015 年 3 月—9 月中国投资、消费、进出口当月同比 (%)

（二）经济结构调整缓慢

受多方因素影响，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进程缓慢，出现旧的经济增长动能减弱、新的经济动力无法替代的格局。一方面去产能缓慢，大量投资深陷其中，无法顺利进入新的领域形成新的增长点。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2008 年 11 月中国出台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促使产能过剩的钢铁、煤炭、水泥和有色等重化工行业出现了新一轮快速增长，2009 年—2011 年间四大行业产量基本保持在 20% 以上的同比增速，高的时期可以超过 40%，2011 年达到顶峰步入缓慢调整期，今年是进入危机以来的最严峻时期。尽管如此，去产能并不顺利，在这四大行业基本亏损或微利的情况下，为了保就业、稳增长，去产能进程十分缓慢，结构调整举步维艰，钢铁行业以产量较大的钢材为例，虽然今年前八个月同比增速降至 1996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 1.5%，但库存水平并未下降，同比增速高达 12%，处于历史中等水平；煤炭行业以消耗量靠前的动力煤为例，今年以来供给过剩依然严重，月均供大于需的缺口超过 1000 万吨，库存水平居高不下；水泥行业虽然今年前八个月产量下降 5%，同比增速处于 1990 年以来的次低水平，但库存规模持续增加，较上年末继续增长 15%（如图 12 所示）。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增长较快，难以弥补传统产业增长放缓缺口。今年前七个月，技术含量较高、与转型升级密切相关的产业增加值增长较快，普遍超过总的工业增加值增速。家具制造业、印刷及媒介复制业、文教工美体育娱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计算

机通信等电子设备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的同比增速分别为 6.5%、7.5%、9.5%、10.1%、8.7%、7.2%、10.6%和 19.6%，均超过同期 6.3%的工业增加值增速，但这七大行业总增加值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仅为 18%，短期内难以弥补占比超过 80%的传统产业增加值的下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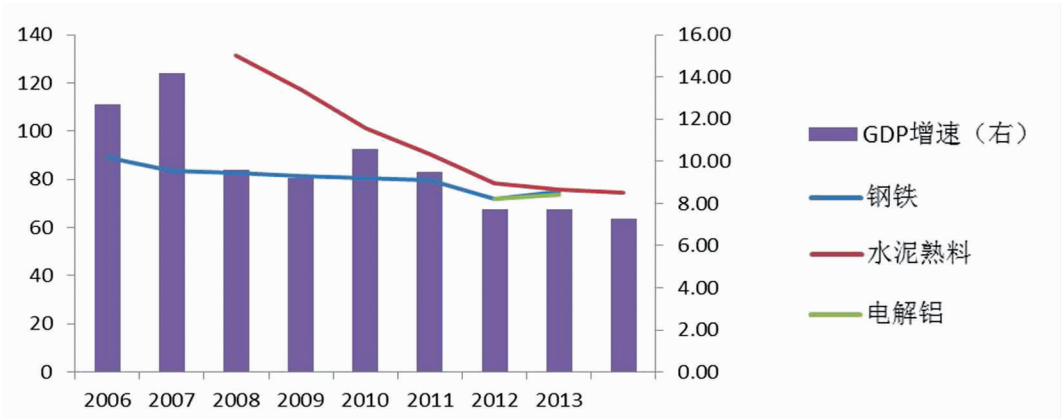


图 12 2006 年—2014 年中国 GDP 增速及钢铁、水泥和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对比 (%)

（三）金融对实体经济传导不畅

为较好应对经济下滑，中国自 2014 年 11 月 22 日启动新一轮降息降准，但企业信贷依然不畅，货币政策效果尚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以下三个方面决定的：一是社会融资成本下降有限。虽然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和 1~3 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分别较本轮降息降准前下降 1.5 个百分点，目前已达 1.5%的历史最低点，不仅低于危机时期 2.25%的最低水平，而且低于 2002 年 1.98%的历史次低水平；但受同步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影响，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从 2014 年 11 月的 7%左右降至今年 6 月的 6%，离美国金融危机时期 2009 年 3 月 4.76%的最低水平仍有较大差距（如图 13 所示）。二是银行“惜贷”。今年以来，伴随中国经济增速走低，银行不良贷款迅速攀升，截至 2015 年 6 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升至 1.5%，不良贷款规模较上年同期扩大近 57%；关注类贷款占比达到 3.64%，较上年同期提高近一个百分点，其规模较上年同期扩大 61%；虽然二者均处于 2000 年以来的较低水平，但不良类和关注类贷款增速较快、潜在风险快速放大以及未来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极大提高了银行的风险偏好，银行放贷日趋谨慎；与此同时，商业银行贷款日趋谨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有所上升。2015 年 6 月末达 2.5%的危机以来较高水平，银行放贷意愿不足（如图 14 所示）。三是企业“惜借”。从信贷结构看，虽然今年前八个月金融机构信贷余额同比增长 15.4%，创 2013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但新增贷款中企业中长期贷款迅速下降，前八个月企业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速仅为 1.8%，较大幅度低于 2014 年和 2013 年同期 37%和 45%的增速；从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来源看，今年前八个月

国内贷款累计同比下降 5.3%，创 1997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表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扩张需求收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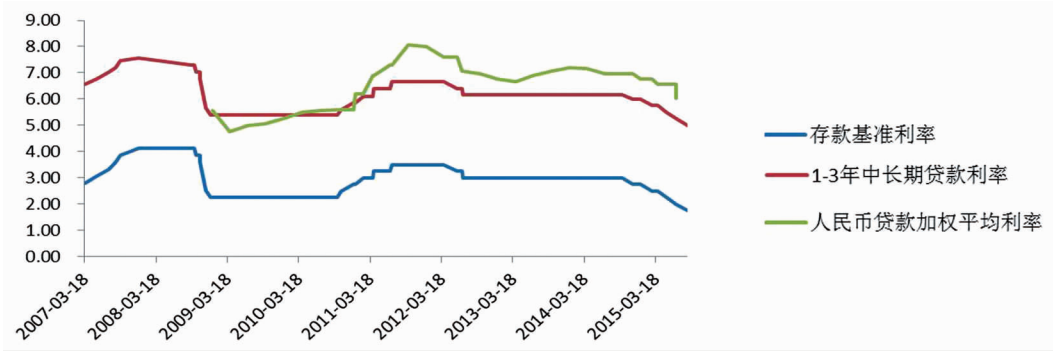


图 13 2007 年—2015 年 9 月基准利率与贷款加权利率比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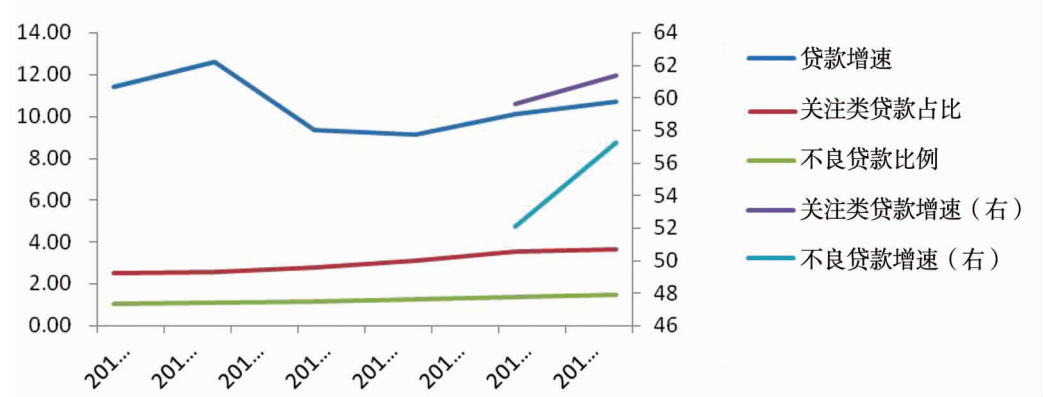


图 14 2014 年—2015 年 6 月末中国贷款增速不良贷款增速及不良贷款率比较 (%)

（四）潜在债务风险和汇率风险不容忽视

截至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包括银行信贷、委托贷款、信托贷款和债券融资等在内的非金融企业负债规模高达近 120 万亿元，相当于 2014 年 GDP 总规模的两倍，与美欧等发达国家基本持平，高于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结构分析表明，虽然中国政府债务总量占 GDP 比重不到 40%，风险总体可控，但风险日益扩大的趋势不容忽视，伴随中国经济增速下降，特别是房地产市场需求日趋饱和，中国财政收入特别是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大幅下降，今年前三季度九个月中国公共财政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同比增速分别为 7.6% 和 -31%，创 2013 年下半年以来较低水平，而伴随稳增长需要，财政支出扩张需求急剧加大，今年前三季度公共财政支出高达 16.4%，政府性基金支出降幅为 -20.3%，较大幅度高于政府性基金收入，收入与支出差距创 2013 年下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加之地方融资平台重新可以“自由借贷”，直接推高了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风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8 月 11 日央行主动一次性调整美元兑人民币中间价，三天内中间价贬值

4.65%，引发全球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市场动荡和股票市场动荡，8月11日—8月末，除了哈萨克斯坦出现超过20%的快速“对冲性贬值”外，全球18个新兴市场国家2%~7%的跟随性贬值，以对冲人民币贬值对其经济的不利影响（如图15所示）；8月21日受中国公布财新采购经理指数（PMI）跌至47.3%，达2009年4月以来最低，引发全球对中国汇率贬值原因的担忧，即贬值在于经济恶化而非调整汇率机制，包括中国在内的股市迅速大幅下挫，8月21日—26日期间中国股市大幅回调20%，欧美股市下滑10%。受此影响，中国迎来多年未现的资金大幅流出，为平抑外汇市场波动等8月单月外汇储备下降939亿美元，创历史最大单月跌幅。今年9月为了防止在国内外形成人民币汇率贬值的预期，一方面，中国政府、央行及学者通过媒体和研讨会等渠道公开表示人民币汇率趋于均衡合理水平，中国不会采取汇率大幅贬值方式刺激经济，中国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另一方面，中国央行通过市场化手段和多方努力促使人民币中间价和即期价价差趋于零以及离岸在岸市场汇率价差趋于零，从而较好稳定市场预期。受此影响，中国9月外汇储备净流出额环比下降54%，而8月为环比放大1.2倍；中国金融机构全口径外汇占款下降7600亿元人民币，环比仅放大5%，而8月环比为放大1.9倍，人民币汇率市场趋于稳定。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强有力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出口政策和产业政策持续发力，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渠道在财政部43号文出台后摸索到更为可行的融资模式，房地产投资趋于稳定，中国人民币汇率有望在顺利加入特别提款权（SDR）后保持稳定，不排除伴随经济增长出现波动出现的波动性贬值，但中长期看人民币汇率有望呈现“短稳长升”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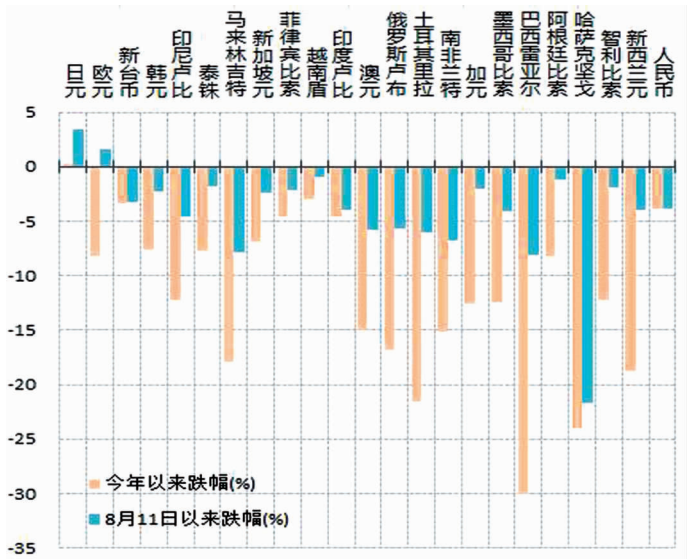


图 15 2015 年 8 月与中国出口高度相关国家汇率贬值对比 (%)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虽然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来自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外部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加大、国内经济周期性运行规律作用以及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特殊发展阶段等多重压力，但从长期看，2014 年末中国人均 GDP 只有 7500 美元，仍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与高收入国家人均 GDP12000 美元的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2014 年末中国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仅为 50%左右，与发达国家普遍超过 70%、高的接近 80%的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2010 年中国人均基础设施拥有量仅相当于西欧的近 40%、北美地区的 23%以及日本和韩国的 18%^①；加之中国贫富差距依然较大，社会保障仍有较大改进余地，这些均有助于促进国内消费持续稳步提升；因此，中长期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在中高速增长，且会不断向中高端水平迈进。尽管如此，短期内中国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压力，需要更具前瞻性、更具科学性、更具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才能达到预期经济发展目标。一是做好宏观经济调控，在准确把握国际经济运行趋势、世界主要经济体调控政策及其影响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保持经济平稳增长、就业前景稳定的前提下，处理好改革开放与发展稳定的关系，有序推进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避免出现“硬着陆”。二是做好宏观金融调控，特别注重做好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的国内经济金融条件及其潜在风险分析评估，厘清人民币国际化长期方向与短期相机抉择之间的关系，确保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三是做好宏观调控政策落地，去年 11 月以来中国出台多项“稳增长”政策，且政府采取审计、下派督导组和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予以督促，但受项目立项和审批时间较长、项目资金落实不力、项目环保要求提高、项目社会资金参与度有限等多方面因素影响，部分政策落地缓慢，宏观调控效力尚未完全显现，需要采取切实有力措施推进政策落地，确保财政政策精准发力，有效对冲传统产业和出口增速下滑以及上半年金融超高速增长而未来将回归常态等带来的增长“缺口”。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货币政策更紧稳定房价政策继续实行》，《财经界》2015 年第 5 期。
2. 张来明、李建伟：《经济新常态思想具有丰富内涵》，《人民日报》2015 年 3 月 13 日。
3. 国家信息中心课题组：《中国经济发展环境稳定》，《中国金融》2015 年第 1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①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 国际经济 ·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 谈判研究与政策建议

李罗莎

摘要：本文介绍了负面清单历史沿革与概念实质，各国负面清单比较与重要国际经验。通过分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负面清单谈判动因、进展及重要意义，重点提出了中方谈判指导原则，以及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90%国内谈判”策略、避免僵局、放开竞争性产业和分层次拟定服务业条款等谈判策略，并对“国家安全法”立法、关于产业（行业）对外开放立法工作、允许外资参与标准制定、以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双边投资协定 负面清单 谈判

作者简介：李罗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

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是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战略举措。负面清单在投资管理、外资管理方面落实“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一经济体制改革核心要求上，兼具改革和开放两方面的核心作用。

第一，对深化改革的重要意义：一是对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作用。负面清单是实行统一市场准入制度的基础。李克强总理在 2015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和“法定责任必须为”；明确企业不该干什么，做到“法无禁止皆可为”；这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二是对产业转型升级有重大作用。负面清单应明确哪些领域要进一步开放、哪些行业有序、有条件开放，从而发挥开放引导作用，以开放促国内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对扩大开放的重要意义：一是对“走出去”开放新格局有重要作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实施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14 年中国非金融对外直接投资达 1160 亿美元，增长 14.1%；利用外资 1196 亿美元，增长 1.7%；中国正在从贸易大国进入投资大国，如何使“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这是中国发展新阶段的重大课题。负面清单可以发挥“引进来”与“走出去”两个方面重要作用。一方面可以为提高“引进来”利用外资质量和优化结构创造更好环境；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加大对“走出去”投资者权益保护力度创造更好环境。如，中国外储中有一万亿美元以上购买了美国债券，如能达成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对中国购买美国债券安全保障度会有所提高。2012 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首次超过美国企业对华投资。2014 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投资同比增长 14.1%，对美投资增长 23.9%。签订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对中国企业今后在美更好投资开拓将有重要作用。二是对“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作用。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和引擎。而负面清单则可发挥推动新常态下区域协调发展与“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更好结合的重要作用。

第三，对外资、境外投资管理改革的重要意义：目前为止，中国外资管理主要采用《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方式，列出中国允许、鼓励、限制和禁止外商进入行业，这是正面清单管理方式。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是对中国长期以来以项目审批为核心的外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负面清单，企业投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企业投资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以及重大公共利益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负面清单同时要求制定更完善监管措施，实施有效事中事后监管。而负面清单谈判中有关放松市场准入限制、规范国有企业经营行为，加强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条款也将促进国内改革。

第四，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的重要意义：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2013 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指导思想来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多年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压舱石、推进器的重要作用。中美签订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有助于消除双方经济合作中许多重要障碍，使两国企业界、政府机构提升投资合作水平，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健康发展，形成更紧密互利合作关系发挥重要作用，从而为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奠定更坚实基础。

一、负面清单历史沿革与概念实质

（一）历史沿革

负面清单起源美国，始于二战后美国与外国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给予外国投资者国民待遇，对某些行业有限制。这些例外（限制）被视为国民待遇义务的负面清单。

1994 年北美自贸协定（NAFTA）中，例外以“不符措施”出现，并没出现“负面清单”这个词。其后这个模式被一些协定复制，将不符措施汇总，习惯上称为负面清单。

迄今为止，美国与 46 个国家缔结双边投资条约（BIT）、与 20 个国家签订自贸协定（FTA），基本都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条约或协定中出现过两类负面清单，一类措施列表，列举不符措施；另一类行业列表，列举采取不符措施行业。2012 年美国与卢旺达签订 BIT，其负面清单第一次出现三个列表附件，除了措施列表、行业列表，还增加了金融服务不符措施列表。

1. 不符措施

不符措施是一系列对双边或多边协定义义务的例外措施，按规定格式列表作为协定附件。不符措施列表包括：（1）部门或事项，指具体实施不符措施部门或特定事项。（2）国内或国际产业分类编码，指采用不符措施产业分类编码。（3）保留类型，指不符措施保留的协定义务，一般指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高管国籍要求、禁止业绩要求等，其中，针对国民待遇保留不符措施最多。（4）政府级别，指维持不符措施政府部门级别。（5）法律依据，指采用不符措施依据法律、法规。（6）措施简要描述，指对现有不符措施保留内容的说明。（7）逐步自由化承诺，指协议生效后，缔约国对不符措施逐步取消的义务。

2. 现有不符措施和未来不符措施

不符措施以其适用时间段又分为现有不符措施和未来不符措施两种。（1）现有不符措施清单，是负面清单主体，有“停止”和“回转”两种约束机制。“停止”机制是将现有不符措施锁定，禁止制定新的或限制性更强不符措施；“回转”机制是以锁定不符措施为起点，逐步减少或消除这些措施的过程。相比“停止”机制，“回转”机制限制更严。

(2) 未来不符措施清单，一般是对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企业高管国籍要求、禁止业绩要求提出保留，其中最多是对国民待遇提出保留。

(二) 概念与实质

1. 概念

(1) 负面清单。依据美国 2012 年 BIT 范本，以列表方式列出“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高管和董事会要求”四项协定义务“不符措施”，作为协定文本附件，即“负面清单”。

(2) 清单结构。清单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列明现行法律法规中不再加严的外资限制性措施；第二部分列明保留进一步加严权利的限制性措施；第三部分列明金融业外资限制性措施，包括不加严限制和保留未来进一步加严限制两方面。

(3) 清单依据。清单所列限制性措施均源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

(4) 清单要素。清单要素包括：(a) 领域，结合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具体行业部门；(b) 义务，即“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高管和董事会要求”四项义务；(c) 政府层级，即出台和维持清单所列限制性措施政府层级，包括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d) 法律依据，即制定限制性措施条目所对应法律法规；(e) 限制性措施描述，即对法律依据中相关规定进行说明。

2. 实质

(1) 从管理角度看，负面清单是一个管理模式。一般是针对外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管理措施，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限制管理措施，均以清单方式列明。然而负面清单并不限于外商投资市场准入领域管理模式，可以是所有市场主体同一市场准入领域建立统一市场规则管理模式。因此，本质上，负面清单最直接影响是理清政府和市场关系。政府管理（治理）模式从正面清单（即列明政府行政审批企业可以做什么）向负面清单（即列明政府行政审批企业不可以做什么）转变，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深刻改革。政府通过高效透明的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将会建立一个更开放、更稳定和更可预测统一市场环境。

(2) 从法律角度看，负面清单是在国际投资法领域，对国际投资协定中义务提出保留的一种模式。这种模式不仅对一国监管能力要求高，对一国有良好法律体系也提出高标准要求。因此，本质上，负面清单对政府行政法律体系的影响可能是负面清单最重要的部分，必然要求国内政府行政法律体系全面改革，做到“政府是法有授权才可为，公民和企业则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二、各国负面清单比较与重要国际经验

（一）各国负面清单比较

在全球很多国家，负面清单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一般而言，各国清单长度不超过 100 个条目。

1. 限制最少的负面清单制度

美国：美国针对外商投资没有一般性外资持股限制。主要限制规定是美国总统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协助下，可采取中止、禁止或撤消可能会对国家安全“威胁损害”的外商投资。美国法律列出评估国家安全风险因素，包括国防、国家安全、美国技术领先地位、能源及关键基础设施影响。

英国：与美国类似，英国无针对外国投资者需获批准的一般性规定。但当某项外资交易对公众利益影响产生时，国务大臣有权发出介入通知。对“公众利益”影响仅限于国家安全（包括公众安全）、多元化、报纸和媒体、金融体系稳定，还有少量对国防、航空、水务和制造等行业附加限制。

2. 限制温和的负面清单制度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两国均没有在外商投资监管相关法律中制定限制性一般规定。而是规定凡金额超过某些门槛或涉及国防的投资均需强制申报和审核，相关部门拥有一定裁量权可以拒绝某些交易。

3. 限制较少的负面清单制度

韩国：韩国负面清单仅限于几类行业。列出业务约 91 种，主要涉及国家利益或战略利益（包括农业、国防、能源和媒体），以及性质上自然专营行业，如电信和公共服务。此外也涵盖各国普遍有的教育、金融服务和运输等行业。

4. 限制较多的负面清单制度

越南：越南负面清单涵盖约 68 个行业。包括农业、电信、国防、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与交通。此外还扩展包含与基础设施、进出口及媒体与科学有关的活动。但其显著特点，是对制造业领域外商投资没有广泛限制。

印度尼西亚：印尼负面清单范围非常广泛，涵盖了 230 个行业，包括农业、通信、教育、能源、国防、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公共工程、交通领域及种类繁多产品制造业，此外还具体列明数目众多限制外商投资子类行业。

（二）重要国际经验

1. “安全阀”机制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同意给予外国投资者无条件准入前国民待遇，而以负面清单制度对准入前国民待遇义务做出一般例外规定。为使一般例外规定可操作，均以国内立法形式规范，与国际协定对接，从而建立与负面清单制度配套“安全阀”。这是各国制衡投资自由化、维护本国主权重要法宝。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外国投资持开放态度，但《美国对外国直接投资的监管体系》显示，美国一些国内立法和监管机制，起到对外国投资制衡以维护本国主权“安全阀”作用。如琼斯法案（1936）、联邦能源法（1935）、电信法（1934）等，禁止或限制外商投资沿海及内河航运业、运营或维护公共发电和输电设施、收购广播电视及无线电公司等。通过反托拉斯法和反托拉斯改进法，增加大型跨国并购交易难度。此外，授权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按照《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对任何外国投资交易进行审核。根据 CFIUS 建议，美国总统可以阻止或撤销该交易。针对外商投资涉及国家安全问题，美国的审查制度主要由 1988 年《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1992 年《拜德修正案》和 2007 年《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法案组成。

2. 法律问题

负面清单通常出现于国际投资协定附件中，而非各国国内颁布法律，因此，负面清单是国际法而非国内法概念。负面清单内容一旦确定，就成为一种国际承诺和义务，不能违反。但在负面清单成为国家的国际承诺和义务之前，各国的国内法律、法规将在确定负面清单内容上发挥重要参照作用。以美国为例，美国联邦法律对外国投资有明确限制的产业包括海运业、捕鱼业、核电业、广播通信业和国内航空运输业等。个别州法律限制外国实体对农业用地投资。这些限制主要包括对外资股权限制和信息披露要求，如外国公司投资美国银行超过 25% 股权或控股，则需得到美国政府事先审批。又如，外国公司收购 200 英亩以上美国土地，均须向当地政府汇报。

三、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动因与进展

（一）谈判动因

1. 双方企业投资障碍

中国企业对美国投资主要障碍。中国商务部《国别贸易投资环境报告 2013—美国》指出，中国企业对美投资最主要问题是美国政府对包括国有企业在内中国企业的歧视性待遇。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基于“国家安全”对中国企业进行投资准入限制，投资审批程序繁琐。美国颁布《2007 年外国投资法和国家安全法》，扩大了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审

查范围和自由裁量权，使中国企业投资美国面临审查程序增多。如中国三一重工、华为、中兴等企业赴美投资受到美国以国家安全名义阻挠。

美国企业对中国投资主要障碍。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投资环境的机遇与挑战》（2013 年）报告，以及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3 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显示，美国企业认为在中国投资主要障碍包括审批程序复杂、准入限制、政策透明度不足、中国国有企业因政府支持而取得竞争优势及知识产权保护问题。

2. 双方谈判内在动因

（1）中国方面。首先，中国已进入“新常态”发展阶段，由于国内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等要求，中国政府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更加有效配置资源。中国外汇储备已近四万亿美元，相当部分是在美国，包括买美国国债，这也是广义“对外投资”。中国已兼有吸收外资东道国和对外投资大国双重身份，有通过双向投资谈判扩大中国赴美投资准入和保护赴美投资安全的内在动因。

其次，中国外资和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分别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初和 90 年代中期，以项目、合同章程审批为主要手段，辅以产业指导目录（及国别/地区指南）。长期以来，由于政府部委职能多头管理和中央地方分级管理体制，使得多级多个行政管理部门介入外资和境外投资管理。如在中央政府层面，外商投资和境外投资须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分别审批，有行业管理职能的其他部委也介入审批，如银监会负责外资银行准入审批，保监会负责外资保险公司准入审批，证监会负责外资证券公司准入审批，外管局负责相关外汇的审批管理。在地方政府层面，一些地方管理机构，在国内生产总值（GDP）目标驱动下把利用外资作为拉动地方经济重要工具，出台各自为政的外资优惠政策。

因此，中国承诺了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模式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的实质性谈判，必将使中国相关部门及地方管理机构进行相应深度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步伐加快，上海自贸区连续出台 2013 版和 2014 版负面清单，在形式和内容方面对负面清单准入模式进行了积极尝试；2014 年底，国务院决定除特定国家或地区、特定行业之外，取消企业境外投资核准制，一律实行备案制。2015 年 3 月，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出台了新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大幅缩减限制类外商投资产业条目，股比限制项目削减是历次修订幅度最大的。此次《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重大调整，增加了透明度，对所有外资股比规定均在目录中列明，显示出国家推进改革的决心。而通过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对中国相关制度、法规等深化改革将发挥重要促进作用。

（2）美国方面。当前，中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增长重要引擎和潜力最

大的市场,特别是第三产业持续发展,近年来占 GDP 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并保持较快发展态势。而美国是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在金融、电子信息服务、文化、医疗等方面有很强比较优势,美国企业在继续积极找寻发展空间,希望在中国有更多发展机会。这是美国与中国开展双边投资协定负面清单谈判的内在动因。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 2015 年度《关于美中商贸关系重点工作的声明》提出,涉及投资主要问题包括:一是美中两国应在 2015 年最终达成高标准双边投资协定。一份高标准负面清单只包含少量限制的协定能为两国经贸关系提供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基础框架。二是中国应减少目前保留的对多个行业外商投资所有权限制,包括制造业、服务业、农业和资源类行业。三是中国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取消使用如“外商投资企业”等用语。所有合法成立公司都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受到平等对待。四是行政许可壁垒在过去多年里一直是美国公司成为受到歧视待遇最多领域之一。这些行政许可包括经营许可、分支机构许可、产品许可、进口许可,以及在银行、医疗保健、保险、快递、建筑、法律和增值电信业务(如数据中心)等行业许可和审批。五是确保外资企业平等获得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等政府资助的创新项目。

(二) 谈判进展

2008 年 4 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见美国总统特别代表、财政部长鲍尔森,双方就开展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达成一致,随后启动了中美 BIT 谈判,至今双方进行了 18 轮谈判,谈判分为文本谈判和负面清单谈判两部分。

2009 年底,美方暂停谈判,转向全面修订投资协定范本。经过对 BIT 规则两年多全面修订,2012 年 4 月美方公布了修订后 2012 年版的投资协定范本,2012 年 5 月中美重启谈判。美方 2012 年版范本是目前世界上投资协定标准最高范本之一,内容涉及劳工、环境、透明度、竞争规则等较多新议题。中美重启谈判,中国提出新中方文本,内容和架构上均与美方 2012 年版范本相似。

2013 年 7 月,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方同意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进入实质性谈判。2014 年 7 月 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致辞中表示,中美应加快双边投资协定谈判,谈成一个高水平、双向平衡的协定。双方确定 2014 年底就文本主要条款达成一致,2015 年早期以各自出价为基础启动负面清单谈判时间表。

2013 年 7 月,国务院成立中美 BIT 谈判工作领导小组,汪洋副总理任组长,核心谈判小组有 22 个成员。2014 年 4 月至 9 月,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会同有关部门及地方,开

展了中美 BIT 谈判中方负面清单研究制定工作，对前期梳理出的不符条款进行全面评估，形成了初步清单草案。2014 年 10 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清单限制性措施和部门分歧进行了第三方评估。2014 年 12 月 3 日，李克强总理主持会议听取了负面清单制定工作汇报，就把握好负面清单谈判策略、抓紧对内开放和压力测试等做出重要部署。发展改革委和商务部进一步修改完善草案，于 2015 年 1 月形成了中美 BIT 谈判以各自出价为基础的中方负面清单方案上报国务院批准。

2015 年 2 月 4 日至 2 月 7 日，中美第 18 轮 BIT 谈判在美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谈判涉及文本的 22 个具体条款中，有 14 个完全达成一致，六个基本达成一致，余下的两个虽有分歧但不大。其次，22 个税号条款方面，21 个完全达成一致。双方均认为，文本谈判基本完成，即将进入到交换负面清单阶段。

四、中方谈判指导原则与谈判策略

（一）指导原则

通过制定高质量负面清单，着力推进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着力改革外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从注重事前审批更多地转为事中事后监管，着力维护国家重大核心利益，坚决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完善风险防范机制，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核心利益是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实现高水平开放、以开放促改革

一般而言，负面清单长短体现着市场开放程度。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以开放促改革”，对外资与境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都明确了方向，这一思路和改革方向应通过制定相对简短的负面清单真正体现。应强调的是，开放是相互的。制定负面清单、与美国交换负面清单，双方都要尊重对方重要利益诉求，而不应是单方面由美方对中方负面清单出价进行挤压。中方的高水平开放也同样要求美方的高水平开放，我们应要求美方对中国已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自主经营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在美投资享有与其他国家企业同等待遇；又如，美国对外资银行设营业机构在法律上限制很少，但其监管部门以“审慎管理”原则，使中国建行、工商行等在美国设立分支机构的申请 5~8 年得不到批准。而 2008 年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恰恰是因为美国金融机构唯利是图，缺乏内部约束机制，美国监管当局严重缺位。又如，2014 年度，中国安邦保险公司拟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美国政府以该饭店时有美国政要入住为由，启动了国家安全审查，在中国投资者承诺管理人员等不是华人前提下才获批准。

2. 明确并坚守中方谈判底线

底线是维护中国核心利益的重要保障。中方确定底线后，应坚守，拒绝美方试图突破中方底线的谈判条件。一是确定核心产业范围。负面清单核心产业应有明确的界定，且数量不宜过多。在负面清单中仅对与国家产业升级和产业安全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设定限制性措施。这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确需一定时期的市场保护措施，而非加强外部竞争。在制造业领域，主要是先进制造业，例如先进轨道交通运输设备、重要海洋工程装备（含模块）的制造、民用卫星有效载荷制造、核电站等。在服务业领域，核心产业应包括国有商业银行、寿险、证券、国内航空、电信等。二是守住国家安全底线，坚决维护国家核心和重大利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根据全面构建集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为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的基本要求，负面清单谈判中凡涉及国家安全的领域应视为中方的谈判底线，包括国防安全、粮食安全、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重要文化、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关键技术以及重大装备制造等领域。

3. 切实防范风险

对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和对国内尚不存在的未来产业开放投资要切实防范风险。如对新闻出版、教育、广播电视等可要求实际管理者为中国国籍人士、或有明确股比限制、或禁入。各国一般都保留对本国尚未出现产业制定不符措施权利，包括未来可以实行新限制性措施的部门和领域，而不论目前不符措施是否存在于这些部门和领域。对未来产业投资风险防范可采用“控股”方式。包括中方投资者在外商投资未来产业项目中比例之和为 51%及以上，或中方投资者在外商投资未来产业项目中比例之和大于任何一方外国投资者投资比例。以上两种情形实际控制人为中方。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已建立了外商并购国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及相应工作机制，要及时完善。要点包括：一是将安全审查对象由并购投资拓展至新建投资。二是将重要文化、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纳入审查范围。三是为防止外国投资者通过协议控制、代持、再投资、境外交易等方式规避安全审查，对实际控制人进行审查。四是外商投资对国家文化安全与公共道德的影响、对国家网络安全的影响以及公共秩序、金融审慎等也要纳入。

（二）谈判策略

1. 抓住发展战略机遇期

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为基础与美国进行实质性 BIT 谈判，是中央为把握住

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以提高开放水平促改革促发展的战略举措。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加快深化以经济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全面改革、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决心不动摇。开放可能有风险，但开放会加速改革，而加速改革、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收益远大于风险。特别应提出的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做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所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等，使中国更有效地牢牢把握住了开放与发展的主动权。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卢森堡等欧洲国家顶住美国压力、宣布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显示了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并使美国内部对其过去所采取的方针的进行反思。这对我国有效开展与美谈判 BIT 负面清单提供了有益借鉴、创造了有利条件。

2. “90%国内谈判”策略

负面清单谈判涉及国内哪些领域要进一步开放，哪些领域要有序开放，哪些领域要加速开放，哪些领域要完全开放。各部门对于中国负面清单出价及底线形成一致意见十分重要。中美 BIT 负面清单谈判伊始，中方成立了由十几个部委分管副部长组成的谈判协调委员会，其主要职能就是进行部门协调。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对外出价谈判 90%是国内谈判。因承担管理内容和责任不同，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在扩大开放方面有时采取较为谨慎态度，相关管理部门出于行业管理要求而提出一些保留意见是可以理解的，对外谈判关键在于做好国内工作。基本要求是，对涉及开放的领域，牵头部门要充分听取主管部门、行业协会及骨干企业乃至中小企业的意见，对涉及具体难点问题要共同深入分析利弊，研究提出趋利避害的解决方案或方案组合；同时，对相关行业、企业关注的消除美国对我企业投资不合理障碍，共同研究提出有针对性和法理说服力的要价方案，或提出与美方利益交换的解决方案。必要时，可请第三方开展评估。国内的深入研究、达成共识，提出有理有力谈判总体方案及细化分行业、分专门问题诉求或防御方案，练好内功、协调对外。

3. 避免僵局

美方提出的 2012 年负面清单版本使人感到美方调整空间有限。目前中方对美方要价也停留在对美 2012 年版文本认识上。其实，文本背后也存在美方各种力量的角力，要重视对美方要价及决策过程分析。中方在谈判中应坚持避免陷入僵局策略，注意对每一轮谈判拟取得的成果提出有限目标、留有余地，不求“毕其功于一役”。要根据谈判情况具体分析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及不同部门的立场，特别是企业界的深层考虑及其出于“利益交换”而有所调整的灵活性。要以创新思维的方式来确保负面清单谈判在反复商谈、交换中克服困难、减少分歧。每轮谈判后都要抓紧总结，完善下一轮谈判方案，从而保

证谈判顺利进行和最终成功。

4. 守住国家底线，放开竞争性产业

首先是守住国家安全底线的定位，然后是其余放开的大胆决策。要注意世界贸易组织（WTO）对外资准入限制仅在涉及“国家安全”情况下才可“例外”。对于我们内部研究明确的若干特定产业、项目在扩大开放形势下会危及产业安全或经济安全，在表述上一定要使其与国家安全紧密关联。应借鉴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惯用办法，即虽然某项中国企业投资并不实质影响美国国家安全，但美方硬将其列为“国家安全”类。中国保险公司并购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中海油并购加拿大尼克森石油公司在美墨西哥湾海油资产、三一重工在美并购公司进行风电开发，均被美方以涉及国家安全予以否决或满足其十分苛刻条件后方予有条件批准。中方可认真借鉴，“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已有较充分竞争的产业，如一般制造业、一般基础设施、快递、电子商务、商业等可加大开放力度。

5. 分层次拟定服务业条款

服务业是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重点，也是负面清单谈判的核心领域。中国服务业开放应区别不同层面分类纳入负面清单。一是对于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大，市场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应作为重点开放领域尽量减少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旅游、软件、研发设计、工程服务、公路货运等。二是对于基本达到充分竞争，但市场开放程度不高，政策法规限制较多，但对外开放风险比较小的领域，应作为积极扩大开放领域，仅保留部分必要限制性措施。主要包括育幼养老、会计审计、建筑设计等。三是对于远未达到充分竞争，市场开放程度低，政策法规限制多，对外开放风险复杂的领域，应作为慎重开放领域，将现有限制措施尽量纳入负面清单。主要包括金融、电信、国内航空、文化、教育等。

五、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全国人大在 2016 年内完成“国家安全法”立法工作，以便与负面清单模式配套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有法可依。

第二，全国人大根据“立法法”争取在 2016 年内研究制定关于产业（行业）对外开放法律的立法工作，以便负面清单对外开放的产业（行业）领域有法可依。

第三，在谈判过程中根据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和谈判具体情况，研究一些敏感领域有序开放举措，在上海、广东、天津和福建四个自贸试验区进行压力测试，以及对港澳台投资者先行先试。

第四，对于美国提出的公平竞争、提高透明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允许外资参与标准制定等，正是中国需要改革的地方，中国可用对自己的约束换取对美国的约束。如美国安全审查程序不透明、投资保护主义规则层出不穷、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越来越严等问题。给各类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对美国企业有利，但可能获益最大是中国企业。建议允许外资参与国内标准制定，掌握标准制定权的实际还是中国机构。中国可同样要求美国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以非歧视性原则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包括对中国国有企业等适用非歧视性原则。

第五，制订专门外商投资管理法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为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外资三法修改项目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中。国家要对在外国投资准入及进入后运营用统一的专门法规并辅之以必要行政手段加强管理。同时，要根据国民待遇原则，通过依据《公司法》《合同法》《环保法》《劳工权益保护法》《反垄断法》及相关税收法规等，严格公平执法，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监督，确保国内市场有序运行。

参考文献：

1. 韩国大使馆：《韩美自贸协定》（第十一章“投资”和第十三章“金融服务”）。
2. 黄鹏、梅盛军：《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定与中美 BIT 谈判联动性研究》，《国际商务研究》2014 年第 3 期。
3. 陶立峰：《国际投资规则视阈下的负面清单法律定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5 年第 3 期。
4. 郭晓合、陈雯诗：《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与国际 BIT 谈判接轨研究》，《经济体制改革》2015 年第 4 期。
5. 郝洁：《中美 BIT 负面清单谈判的核心问题、美方关注及对策》，《国际贸易》2015 年第 7 期。

责任编辑：沈家文、杜振华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研究

刘翔峰

摘要：中国对非洲国家投资近年增长很快，本文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特点和挑战，并给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与资源和贸易密切相关，未来投资动力将更加注重市场驱动，并通过直接投资加强产能合作，实现对非洲国家的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

关键词：直接投资 投资风险 均衡投资

作者简介：刘翔峰，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室副主任。

一、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特点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开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市场改革深化，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由过去以援助为主，发展成为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多种形式的互利合作。中非巨大互补性，成为双方互利合作的坚实基础，2000 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后，中非经济合作进入新阶段。随着中非贸易快速增长，中非直接投资表现出以资源需求型和与贸易密切相关的特性。随着非洲经济不断发展，其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制造业有巨大需求，迫切希望增加就业机会，增加产品附加值，而中国有大量富余的优质产能，可以向非洲转移，双方能够实现互利共赢。2015 年年度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即将召开，双边的产能合作和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区域航空网等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的合作借此平台将不断加深。中非之间通过国际直接投资来进行制造业产业转移，这种产能合作符合国际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目前，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呈现出以下具体特点。

（一）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比重有待提高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逐年增加。其中，2008 年中国对非投资 54.9 亿美元，增长率高达 248.8%，这主要是因为当年出现中国工商银行支付约 54.6 亿美元收购南非标准银行 20% 的股权的特大项目交割。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的直接投资量下滑，中国对非直接投资也降至 14.4 亿美元。2009 年—2013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逐步回升，由 2009 年的 14.4 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33.7 亿美元，年均增长 23.7%；2014 则为 40 亿美元，同比增长 14%。2015 年上半年中国对非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如果从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上看，规模也在不断放大，由 2004 年的九亿美元增至 2013 年的 261.9 亿美元，规模增加了 28 倍。至 2015 年初，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300 亿美元，同 2004 年相比增长了 32 倍。但是，中国对非投资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较小。除 2004 年、2007 年、2008 年和 2011 年以外，其余年份基本维持在 3% 左右。2014 年，中国企业对非投资占中国当年对外投资的 3.9%。目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在 184 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全球国家和地区总数的 79%，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来源国家中位列第七（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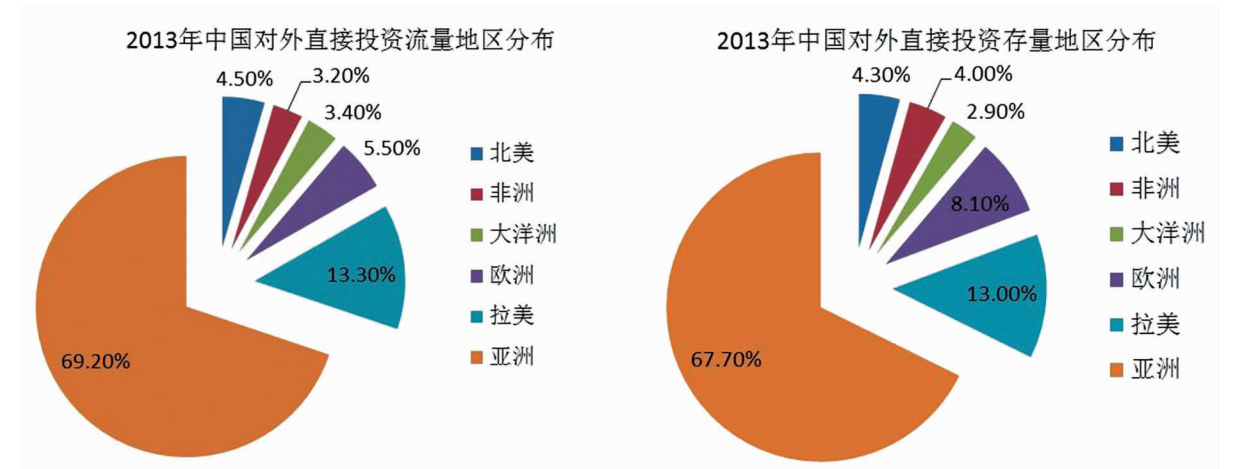


图 1 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域占比 (%)

数据来源：商务部、外汇管理局数据库。

表 1 2007 年—2014 年中国对非洲 FDI 流量及占比 (亿美元)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额	15.7	54.9	14.4	21.1	31.7	25.2	33.7	40.0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占非年 FDI 流入比重	3.1	9.3	2.7	4.8	6.7	5.0	6.5	3.1
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占中国 FDI 流出比重	5.9	9.8	2.6	3.1	4.3	2.9	3.2	3.9

资料来源：商务部、安永律师事务所《非洲吸引力》报告。

（二）投资覆盖率很高，国别分布集中

截至 2013 年末，在非洲共 60 个国家（地区）中，中国企业对非直接投资共覆盖了其中 52 个国家，投资覆盖率为 86.7%，仅次于亚洲（97.9%），略高于欧洲（85.7%），远高于拉丁美洲（60.4%）和大洋洲（50%），居第二位。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共设立了 2955 家境外企业，约占中国境外企业总量的 12%。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家分布较为集中。2013 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的近 90%集中于 17 个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当年吸收中国直接投资均在一亿美元以上（见图 2），合计 29.9 亿美元。而 2013 年中国对非投资前十位的国家（地区）集中了当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 65.6%。中国在南非、赞比亚等投资累计额最大的十个国家或地区，2013 年累计达 176.5 亿美元，占中国对非洲投资累计额的 67.4%。可见，从流量或存量来看，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国别分布都相当集中，如图 3，南非占 16.8%，赞比亚 8.3%，尼日利亚 8.2%，安哥拉为 6.2%，津巴布韦 5.8%，苏丹 5.8%，阿尔及利亚 5.7%，刚果（金）4.2%，毛里求斯 3.2%，加纳 3.2%，其他国家合计 3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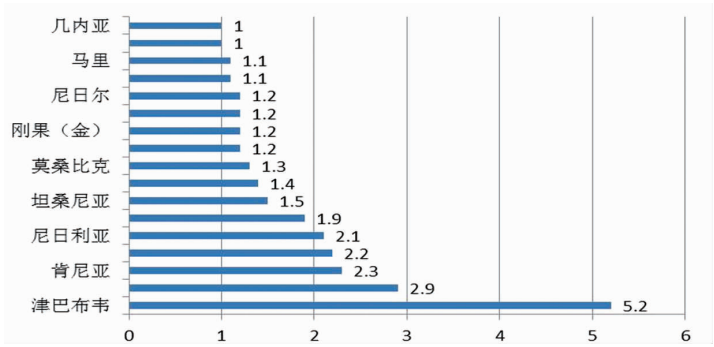


图 2 中国 2013 年对非洲各国直接投资超过一亿美元的国家

资料来源：商务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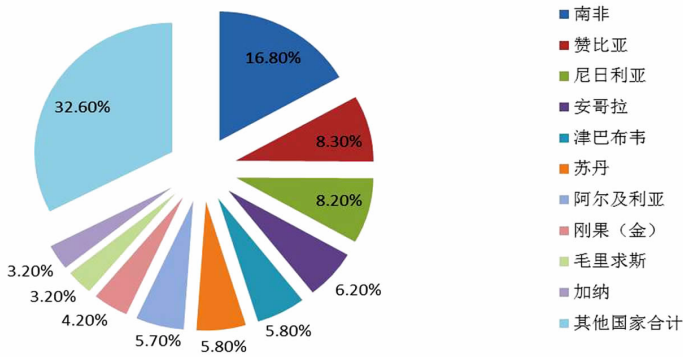


图 3 中国截至 2013 年底对非洲直接投资累计额 (%)

资料来源：商务部。

（三）投资领域很广泛，行业分布较集中

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行业领域近年不断拓展，几乎涵盖所有行业部门，分布较为集中，主要涉及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文化娱乐业等 17 个行业大类。其中，建筑业、采矿业、制造业以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四个行业在 2013 年占当年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比重达 90%。其中，建筑业 12.4 亿美元，占比达 36.8%，居首位；采矿业 8.3 亿美元，占比 24.7%，居第二位；制造业 5.1 亿美元，占比 15.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4.5 亿美元，占比 13.3%。从存量看，中国对非直接投资累计额截至 2013 年末排名前五位的采矿业、建筑业、金融业、制造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占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的 85%。其中，采矿业占比为 26.4%、建筑行业 26.1%（见图 4），两者基本持平。而 2013 年的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流量中，建筑业占比约 40%，远超过采矿业（2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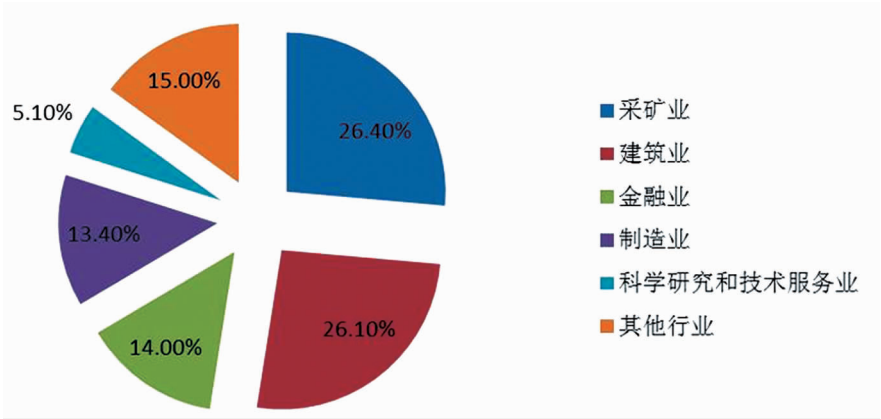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资料来源：商务部

（四）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多样化

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已经成为对非投资生力军。赴非投资中国企业中的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数量上占据 70% 以上。民营企业在对非投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在项目数量、投资金额和地域分布上都呈扩大趋势，出现了如华为、新希望集团、万向集团、力帆、创维等知名民营企业。此外，众多中小企业在非洲从事农副产品加工、零售、小商品生产等，对满足非洲人民生活需要、促进当地就业发挥着积极作用。

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也日趋多样化，包括绿地投资、合作经营、跨国并购、产业园区等多种方式。

绿地投资又称新建投资，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方式。即资产的产权全部或部分归投资方所有，包括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这种方式可以为非洲地区带来较高的就业率和

经济发展契机，很多非洲国家更愿意采用。例如，1992 年，海信集团在南非成立贸易公司经营彩电业务，并于 1996 年建立首个生产基地，成功占领南非家电市场，全面实现不同层次消费理念的有效满足，成为南非家电行业的领军者，该集团在南非建立了多家生产厂家，有力推进了本地化经营。

合作经营方式主要是合作双方就合作形式和分配比例进行协商，通常是非方提供固定资产及劳动力，而我国提供相应资金、设备及高端人力资源，并附加雇佣非洲员工超过六成以上的条件，双方协定最终利益分配的比例。中兴通讯是其中较为成功的案例。2009 年，该公司与利比亚 GPTC 公司达成 CDMA2000 网络合作意向，就业务范围做了协定，并每年获得 10% 的经营利润；第二年又与埃塞俄比亚签订合作协议，合作建立了非洲首家手机厂，非方建厂房，中方提供技术支持，在非洲实现了广泛的技术覆盖，目前，已经发展出超过 50 家的驻非机构，市场用户超过一亿。

跨国并购方式也成为中国企业开始采用的方式。例如，中国核工业集团以接近两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非洲纳米比亚一个铀矿的股份，这是非洲最大铀矿之一。不过，中国黄金集团 2012 年曾希望收购巴里克位于非洲坦桑尼亚的子公司巴里克黄金非洲公司的部分或全部股权，其计划却没有成功。

境外园区成为中国对非洲国家的集群式投资的重要方式。目前，中国企业在全球 13 个国家建设的 16 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六个合作区位于非洲地区，占比接近 40%。这些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中国对非洲集群式投资的重要平台，比如赞比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这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截至 2014 年 5 月底，该经贸合作区已有 29 家企业入驻，吸引投资近 14 亿美元，实际完成投资超过 12 亿美元。

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也是重要方式。2013 年，中国对非洲承包工程业务持续增长，市场布局趋于均衡，部分行业形成较强竞争优势，对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中国最近对非洲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很快，截至 2013 年底，累计为非洲铺设铁路超过 2200 公里，修筑公路超过 3500 公里。非洲成为中国企业在全球开展工程承包的第二大市场。中国企业对非洲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额行业分布中，交通运输建设项目占 31.7%，房屋建筑项目占 24%，电力工程建设项目占 12.7%。

（五）投资效果积极

多数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给当地带来了积极效果，帮助提升了非洲国家的生产技术水平，在增加税收和扩大就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带动了中国与非洲国家的出口和进口效应。

一是带来了出口效应，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采矿业、制造业、纺织业等相关行业，这些行业特点决定了其对于生产设备要求高，由此带动了中国对非洲机械设备出口，也缓解了中国国内资源短缺问题。由于投资发生后还要保持长期维修和服务，因而还可以拉动中国生产型消费资料的市场需求，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长期的促进作用。

二是带动了进口效应。中国对非洲的贸易顺差在 2011 年开始转变为明显逆差，说明随着中国在非洲的直接项目愈益集中在原油、采矿、农牧业等资源产业，投资目的是为了获取资源产品如原油、矿产、农产品等，这些行业直接增加了中国的进口，其中原油进口占中国从非洲进口的 70% 以上，可见在非洲地区能源投资能够更快的得到回报，这些行业对中国进口的影响更加明显。

三是规避了贸易壁垒。中国加强对非洲家电、纺织业等制造业的投资，是以寻求扩大在非洲的市场份额为目的，因此规避了贸易壁垒并提高了在非洲国家的市场占有率。由于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享有美国和欧盟的关税优惠政策，中国制造业企业在非洲投资的本土化程度如果能达到东道国的法律要求，还可以按照非洲国家身份享受相应的关税优惠政策，进入欧美市场，这对于中国的制造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可以迅速提高国际市场份额。

二、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风险增大

中国企业在对非投资虽然充满机遇，但也面临一定的挑战，如存在各类安全风险、日益增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企业自身准备不足和承担社会责任不足等问题。

（一）政治风险和安全风险较大

尽管非洲市场前景总体上乐观，但部分地区仍然存在各种安全风险。一些国家和地区冲突的爆发也给非洲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挑战，如马里问题尚未真正解决，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出现战乱，伊斯兰极端恐怖组织在非洲实施的恐怖活动呈现扩大和蔓延之势。另外，由于贫富差距、高失业率、贫困等因素影响，一些非洲国家社会治安状况不佳，偷盗、抢劫等刑事案件发生概率较高，给中国企业在当地投资造成一定影响，也对企业员工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

“官官联合”模式遭遇挑战。由于投资的行业都是战略性行业，往往采取“官官联合”的模式，即中国的巨型国营企业与国外政府之间合作密切可以获得投资国政府的支持，成为最过硬的通行证。但是一旦政治动荡，反对势力崛起，部分投资就可能付之东流。例如利比亚的政治动荡，中石油、华丰等企业与利比亚政府关系密切，之前合作非

常顺利，但是这种合作的基础非常脆弱，当投资地所在国政治势力发生变化时，这些企业受到仇视。在利比亚，中国的石油投资至少高达数十亿美元，再加上铁路交通等领域的投资，其规模更大。由于利比亚政治动荡，中国企业成为受到最严重冲击的企业，出现了大规模排华潮，大使馆受破坏，多名华侨遇袭，中国华丰公司在利比亚的建筑工地被抢，上千名中国工人被全部赶出营地，以致中国在利比亚的所有侨民全部撤离，等于在利比亚的所有投资阶段性被迫结束。

还有一些电力和交通等项目，往往周期长、资金大，且常常地处偏僻，也深受安全形势的影响，暴力活动时有发生，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和刚果等地，恐怖袭击、暴力活动不断，中资企业特别是从事施工建设的企业员工遭遇绑架（特别是在苏丹、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国）时有发生，还广泛存在偷盗现象，特别是一些关键零配件的被盗往往影响工程的正常进行。

（二）国际竞争压力日益增大

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争相加大对非投资合作，将加大中国在非投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压力。以阿尔及利亚市场为例，近年来，阿尔及利亚多个新城、化工、高速路、电气化铁路的设计标的被欧洲、韩国公司拿走。欧盟表示将继续鼓励欧洲企业在非的投资，希望进一步加大欧非之间的经贸往来。2014年8月首届美非峰会期间，奥巴马宣布了总规模330亿美元的对非洲一揽子投资计划，帮助本国企业扩大在非洲的市场份额。事实上，美国在2014年凭借29.5%的增长率超过英国而成为非洲最大的投资国。韩国、日本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增加在非洲的活动，俄罗斯和巴西也都表现出对参与非洲区域运输网络的兴趣，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增大。随着国际市场格局的变化和欧美、日韩等国加强了非洲业务的开拓，我国企业在投融资的渠道、方案方面几乎没有优势可言，面临的竞争压力不断加大。

（三）企业对非投资准备不充分，出现恶性竞争情况

企业对非投资准备不足。一些企业在赴非洲投资之前对当地行业方面的市场环境、政策法规、办事效率、资金运作、合作伙伴资信等并不了解，也缺乏相关经验及专业的运营资质，需要较多时间磨合，导致在非投资企业易蒙受损失。在非洲的一些大型工程项目监理多为西方公司，由于同中国公司对施工规范、合同条款理解的差异，在同中国公司的合作上总体不够理想。再加上企业对非投资也缺乏从企业自身发展角度做长远规划，决策投资时存在盲目跟风现象，不利于在非洲地区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企业应对非洲市场的国际人才储备明显不足，缺乏具备专业素养、国际化管理经验、了解

当地市场以及熟练运用当地语言的复合型人才。

在非的中资工程类企业还存在恶性竞争现象，有的企业报价过低甚至低于成本价以至于影响到工程质量，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涉足非洲工程项目，如果缺乏协调，行业竞争秩序可能进一步恶化。一些中国建筑企业在地产生了不良影响，为了中标把价格报得很低，中标后则以次充好，导致工程质量低下，给中国建筑企业造成不良影响。

（四）融资与原材料成本过高

交通、电力等大型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中国企业在投融资方面获得的支持还显不足。由于很多地区所需的电力和原料市场都没有成熟起来，一些地方甚至连一颗钉子都要从国内运过来，有的地区只有一家水泥厂，而且水泥价格很高，成本和风险都比较高。当地缺乏熟练的技工，不仅提高了项目组的成本，同时也给当地雇员的管理带来了困难。

（五）企业社会责任有待提升

安哥拉曾经是中国非洲战略的一个符号。由于安哥拉没有抵押品和偿还能力，中安之间的贷款以未来开采的石油偿付，这被称为中国援助非洲的“安哥拉模式”。实际上安哥拉被列入世界上最腐败的国家之列，中国的投资带来了当地政府官员及盟友获得利润的爆炸性增长，虽然通水、通电、通路也普遍改善了当地人民生活，但是一些不规范和腐败，比如拆迁补偿不到位、环境破坏也干扰了项目地原住民的生活。有些企业的社会责任的合规管理不到位，引起社区怨恨，例如，质量把关不严、不重视当地就业率等的要求。安哥拉民众的反华情绪虽然存在被煽动、被利用的情况，但民众情绪也可能逐步上升为政府意志，甚至引发暴力行动，威胁中方外派人员和机构安全以及项目安全。由于对安哥拉等高冲突小国缺乏国别研究，没有评估项目所在地可能遭受的各种风险和管控风险方案，冲突管理缺失可能会带来较严重的后果。

三、深化对非洲直接投资的思路

展望未来，继续加强中非双边合作，促进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能源和消除贫困及扩大援助非洲国家，对于实现中非战略合作和共同发展的意义重大。

（一）加大产能合作，实现均衡投资

积极发挥中非合作论坛的作用，作为中非合作机制的最重要平台，通过论坛平台，非洲经济发展可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有效对接。

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加工业及电力等领域会全面展开合作，中非产能合作也将全面推进。目前来看，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全球产业链的中端，而非洲国家则处于工业化早期，其依赖原材料出口发展经济的模式难以持续，亟需发展装备制造业、机电、日用工业品等行业，以满足国内经济需要，推动其向知识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发展。这种产能合作正好可以承接中国的制造业产能转移，实现中国与非洲各国之间的互利共赢。

当前非洲更多的国家（地区）投资环境趋于改善，如 2013 年非洲以前出现动荡的几个国家选举之后政局变得平稳，更多的国家经济增长态势向好。这些投资环境的积极变化有利于吸引中国企业加大在这些国家的投资，改变中国对非投资国别分布较为集中的局面，使得中国对非投资的国别分布更加均衡。

（二）加强重点领域投资，兼顾多元化

1. 加大对基础设施领域投资。中国“一带一路”主要是帮助沿线国家解决能源、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非洲目前已超过亚洲和拉美而成为全球基础设施领域潜力最强的地区，在能源、水利设施、公路、铁路建设方面，每年基建投资需求近 1000 亿美元，目前投资只覆盖一半，为提高非洲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现已成为非洲各国领导人的共识和政府政策的努力方向，非洲开发银行批准的贷款和担保一半以上在基建领域。未来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为非洲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伴随着非洲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非洲基础设施的需求十分巨大。结合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继续扩大对非洲的基础设施投资。根据实际情况，政府可以考虑建立国企、民企海外投资重大项目信息共享平台，从政府层面协调中国企业间的投资活动，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组成联合体，建立信息共享平台，促进国企、民企组成联合体“抱团出海”，发挥各自优势，共同走向非洲市场，可以避免中国企业在投标非洲项目时出现竞相抬价等无序竞争局面，降低项目成本，提高成功率。

2. 发展境外园区的集群式投资。中国应加强发展在非洲地区利用境外园区开展集群式投资，使其将更加成熟。这种境外园区主要表现为合作区建设的规模扩大和功能多元化。以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为例，该经贸合作区总体规划面积 9.1 平方公里，合作区起步区面积 1.3 平方公里已基本开发完成，2013 年 4 月 27 日正式签署面积六平方公里的扩展区土地合同，将建成集加工制造、物流、商贸和综合配套服务为一体的工业化新城区。另外，尼日利亚莱基自贸区规划将建成一座“综合新城”，不仅有工业制造加工区块，还有商贸物流园、房地产区、创意产业园、油气仓储区和城市配套区，涵盖社会发展的各

个门类。未来，可以更多地利用这种投资模式扩大和继续发展在非洲地区的集群式投资。

3. 促进在非洲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中国在非洲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开拓主要有两种方式：中国生产设备的出口（例如光伏太阳能板、风力涡轮）和可再生能源项目的建设。中国应加强对非洲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可再生能源发展既是非洲国家战略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此举还可以帮助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走出去”创造国际市场空间。中国政府也可以利用多种举措促进在非洲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尽快建立包括国家能源局、财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跨部门协调机制，为寻求在非洲发展和投资的中国可再生能源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中国的银行系统也应当建立起一个更好的风险评估系统，帮助企业评估在非洲投资的风险和项目的合适度。同时，应当鼓励为非洲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比如支持农村电气化的太阳能光伏或风能发电系统，以及可以并入小型电网系统的地热发电系统等。除了针对项目的投资以外，中国也可以联合多边的国际金融机构提供各种形式的支持。还需要注意提高与当地民间团体对话和交流的能力，在评估和中国相关的潜在项目的过程中，采纳他们的意见。财政部和外交部都应当加大力度帮助中国企业应对当地风险，落地项目的社会和环境信息收集及评估，并作为整个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考虑。还需要加强环境政策，提高标准。中资企业不仅要满足所在国的要求，还需要建立一个更确切、更严格符合国际标准的环境政策，以便能够在所有的非洲国家推广，这种符合国际环境普遍规范的高标准也符合中国投资企业长远利益。中国企业在面对挑战时采取积极的应对之策，多管齐下，规范运作，争取当地社会的支持。只有这样，中国对非洲的投资才有可能继续深化推进。

4. 投资行业分布需要更加多元化。随着非洲中产阶级消费群体的扩大和消费能力的增强，中国企业对食品行业、纺织服装业、建筑业、公用事业、信息技术、金融业和零售业等消费导向型混业的投资机会将继续增加，投资行业的分布将会更加多元。

（三）企业要做好风险管理

做好风险管理工作是企业非洲投资获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在项目孕育阶段就要进行充分的风险分析。首先全面了解项目所在国情况，对潜在的政治和经济风险进行评估，同时对业主的经营状况和还款能力进行全面调查和判断，这样在签订合同时就可以考虑到各项风险因素，并加入应对风险的条款。在项目前期的投融资阶段，企业就应该将业主将来还款方式和渠道落实好，同时准备好应对突发事件的预案。有些风险超出企业所能控制的范围，比如政治风险，购买保险是管控此类风险的重要手段，以规避政治不稳定所带来的风险。

要加强公司治理的合规制度建设。中国应借鉴跨国公司合规管理制度的成熟经验，尽早建立合规内控机制，树立负责任的海外经营形象，保证企业在冲突地区经营中守住本地化底线和基本的商业道德，成为当地负责任的企业。企业不仅自身要合规经营和建立合规管理制度，并加强对供应链的合规监督，对合作伙伴的合规性进行尽职调查和监督，特别是在拆迁补偿等涉及民生领域要强化合规尽职调查，拒绝为第三方的腐败背黑锅。增加透明度是企业合规管理的基础，可以让民众通过透明披露的信息来监督企业，让政府能够通过信息来了解企业创造的收益和回报，这种互动也能帮助企业获得管理风险、改善经营等所必须的宝贵信息。

（四）处理好外交和援外的政策平衡

鉴于安哥拉模式依赖高层政治框架，公共关系处理上极不平衡。除需要重视上层路线之外，要大力加强下层路线，减少冲突影响，维护投资安全。目前，中国的对外投资激增，未来五年还计划以年均 17% 的高水平增长，外交路线中经济非理性的问题已经凸显。新时期应将重大经济利益纳入核心利益，凡涉及中国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在政府路径之外，增加“民间直接实施路径”，确保相当部分援外资金能直接普惠于民，特别是企业经营所在的社区。扩大利益共同体的范围，以我为主重新平衡与冲突地区政府的关系。

要借鉴国际上在冲突管理方面的经验借鉴。学习一些国际公司创新社区管理的经验，比如，世界第四大铁矿石巨头英美资源新近在非洲开始实施“社区持股”措施，将待开发的矿业投资项目的至少 1% 股权无偿让与周边居民，该股权红利每年进入一个专门设立的“社区投资基金”账户，项目存续期间，公司派专业理财人员与村民代表一起共同管理该基金，投资于低风险的项目，使基金不断保值增值。项目开发结束后，公司完全退出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基金转而完全由社区支配和管理。这样，社区与公司从根本上被捆在一起，正在收到很好的效果。美国铝业等国际矿业巨头目前则开始将公司每年利润的 30% 左右用于回馈社区，如果低于该比例，则相关业务被视为进入风险警戒区而加以超规格风险管理。

企业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为当地社区发展和福利改善提供资金援助等形式，提高企业的声誉和公共形象，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短期看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中暴露出的负面问题。同时，一些项目涉及到居民的重新安置工作，比如加纳的大坝建设，居民的搬迁安置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合作，采取更加切实、有效的协助措施，以帮助移民们发展新的生存技能，解决在安

置工作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企业社会责任投入与原材料等投入要素一样，是企业必须的成本，因此，要弥补冲突评估盲区和社区管理缺失，要尊重、认可和理解当地文化与宗教，履行社会责任，进行本土化经营。要理解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作为外来者的中国企业需要对他们的文化价值、宗教价值有一定的认可和理解，尊重其文化与宗教，这点至关重要。

中国应当在冲突地区已经开展的既有项目上尽量弥补之前的缺失，加强社区调查和评估，在实施中高度重视管理社区风险。虽然任何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合规管理的投入都必然涉及到更多的成本，但如果慑于成本，就会面临更大风险。

商会、行业协会应充分发挥作用。相对于企业，非洲国家的商会、行业组织拥有更为丰富的信息资源，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可以与当地商会和行业协会加强合作，建立行业知识和项目经验的共享机制，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交流、研讨、培训活动。支持其建立行业协调和调解机制，帮助在非洲投资的中国企业理顺彼此之间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维护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整体利益。积极与东道国政府机构及海外同行业的行会组织建立联系，保持定期沟通，及时将非洲各国的市场环境、产业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最新情况传达给国内企业，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包括民企和民企之间起到牵线搭桥的作用。

总之，非洲由于农业和矿产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已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热点区域。中国积极支持和鼓励企业扩大对非直接投资，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但也要善于处理各种风险和冲突。未来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要做到均衡投资，要加强中非合作论坛的作用，加强对重点领域直接投资，做好企业风险管理，加强中非产能合作，实现中国企业对非洲制造业的顺利转移。

责任编辑：李 蕊、张碧琼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与对策

黄勇 周世锋 王琳 潘毅刚

摘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市化的核心任务。本文以此为出发点，以农民市民化意愿为基础，从现状条件、推进路径、政策设计和成本分担等维度，分析存在问题和主要矛盾，并从人群有序、领域有序、空间有序和时间有序四大视角，创新提出推进市民化的思路安排、体制改革重点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有序推进

作者简介：黄勇，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周世锋，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总规划师、研究员；

王琳，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高级经济师；

潘毅刚，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大规模、大跨度、多元化的人口转移在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浙江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文研究提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思路和建议。

一、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状和意愿

（一）农业转移人口特点：“一大四多”

总体上，农业转移人口呈现出“一大四多”的特征。“一大”是人口规模大。按浙江

省公安厅统计，截至 2013 年 5 月 8 日，居住一个月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有 2424 万人，其中省外流入 2075 万人^①，占 85.6%。统计局根据“六普”分析显示，居住半年以上的农业转移人口有 2399 万人，其中省外流入 1135 万人，占 47.3%。“四多”：一是省外流入人口多。从存量看，省外流入浙江的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已经连续 13 年居全国第二位，仅次于广东。“六普”显示，2000 年—2010 年浙江省外来常住人口年均流入量为 81.35 万，超过广东省（64.3 万人），居全国第一位。二是新生代人口多。据浙江省计生委数据监测，流动人口以青壮年为主体，平均年龄为 32.8 岁，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劳动力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重达到 50.7%。三是举家迁移人口多。省外农业转移人口逐步从原来的独自外出务工模式转向举家外出模式为主，举家外出且在务工地共同工作生活的比重已达到 48.1%。四是低学历人口多。农业转移人口的教育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 81.4%，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 8.7 年。

（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三高两低”

“三高”：一是就业稳定性较高。浙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状况趋向于稳定，职业技能和发展空间趋好。问卷调查显示，2010 年以来，有 91.3% 的农业转移人口没换过务工城市，59.7% 没有换过工作单位，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占 49.6%，与所在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66.8%。二是义务教育享受比例较高。浙江已经基本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并逐步解决外省籍人员子女的高考升学问题。2012 年，浙江义务教育中小学在校生中，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为 130.79 万人，占义务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26%，且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达到 75.6%。三是社会保障覆盖面较高。浙江以养老、医疗为主的社会保险体系已经覆盖城乡，基本实现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制度覆盖。目前，89.6% 的农业转移人口拥有医疗保险，49.7% 拥有养老保险，但享受的社保水平相对较低，跨省籍农业转移人口的参保意愿不强，存在重复参保、转移接续难等问题。

“两低”：一是住房保障程度较低。住房保障是全国新兴的公共服务体系，廉租房、公租房存量相对较小，主要面向城镇低保标准两倍以下住房困难家庭，现已解决浙江全省 95.7 万户城市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目前，公共住房规模尚无法满足农业转移人口的需求，享受到住房保障的比例仅为 1.4%。二是社会融入度较低。农业转移人口的生活习惯带有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特别是省外流入人员的文化习惯与本省居民差异较大，因此社会圈主要集中在老乡群体，群体间社会融合不足。

^①浙江省公安厅的统计为暂住人口，指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县（市、区），在其他地区临时居住三日以上的人口。该统计口径未包括县域内流动的农业转移人口。

（三）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四个较强”

一是省外转移人口回老家定居的意愿较强。调查显示，省外转移人口希望回老家定居的比例达 59.9%，在各类人群中比例最高，其中 32.7% 希望回老家农村定居，27.2% 希望到老家城镇定居，而愿意在务工地定居的比例仅为 13.7%，在各类人群中比例最低。二是省内转移人口定居务工地的意愿较强。市内县（市）际间流动的转移人口希望在务工地定居的比例达 40.3%，省内市际间流动的转移人口希望在务工地定居的比例为 27.2%，均高于外省农业转移人口相应比例。同时，大专及以上学历以及月收入 5000 元以上的人群在务工地定居意愿较强，举家外出且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工作生活的更愿意在务工地定居。三是定居县城和小城镇的意愿相对较强。与一般认为农业转移人口希望定居大城市的观点不同，问卷调查显示 37.7% 的农业转移人口最希望定居的是县（市）城区，其次 30.2% 选择在小城镇定居，只有 14.8% 的人选择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定居。四是农业转移人口保留农村权益的意愿较强。绝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希望保留农村权益，67% 的调查对象希望保留承包地，67.9% 的人希望保留农村宅基地和房产，75% 的人表示即使进城定居也要保留村级集体经济收益权。在现行农村土地政策下，真正有意愿想把户口迁到城市的仅占被调查者的 35.2%。

二、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主要矛盾

（一）市民化成本高与地方财政承受能力低的矛盾

在现行制度约束了大量需求的条件下，大量农业转移人口进入异地，挤占了当地十分有限的公共资源，已使很多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处于紧缺或超负荷运行状态。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将义务教育、就业服务、基本养老、医疗卫生以及保障性住房等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以及为保障城镇健康协调发展所必需的市政设施、社会事业、生态环境等城市功能建设，需要大幅度增加公共财政的投入。据本课题组测算，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人均成本大约在 13 万~20 万元左右^①。浙江有 2000 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如此庞大的规模，仅凭一省的公共财政在短期内是不可能消化的。

（二）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大与建设用地供给少的矛盾

大量外地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入，使浙江等地本来就已十分紧张的资源要素更加难以

^①这里的市民化成本，主要是指需要政府财政投入的公共成本，包括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医疗保险、就业培训和服务、养老保险、社会救助和专项补贴、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经费投入，大、中、小城市的市民化成本分别为 20 万、16 万、13 万左右。

支撑，尤其是土地资源。按照建设部城市规划的一般标准，每个城市居民需要 100 平方米的建设用地空间，如此大规模的外来人口要定居下来，势必会加剧发展空间不足与城市用地紧张的矛盾。更何况，我国实行“两个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①，土地利用都是以各种指标的方式计划配给，并且严格限制土地指标的跨省调配。按照目前的土地政策，农业转移人口如果全部在当地实现市民化，但又不能同时将其名下的土地指标带到当地，只能占用当地极其有限的用地指标，这势必给空间承载问题带来严峻挑战。

（三）产业转型升级要求高与农民工学历、技能低的矛盾

根据问卷调查显示，浙江省经济活动人口中，省外劳动力约占 33.2%，其中二、三产业的省外劳动力分别占 48.1%和 23.4%，已形成对省外劳动力的较强依赖。省外农业转移人口文化程度偏低，又因对未来缺乏一种稳定的预期，企业和个人都不愿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导致人力资本积累十分薄弱，产业工人的素质和技能与“制造大省”极不相配。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这种对省外劳动力低成本、低工资的路径依赖，使企业缺乏引进技术、更新设备的动力，科技创新、自主研发的动力不足，导致浙江省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缓慢。

（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利益诉求多与国家体制政策突破难的矛盾

根据问卷调查，浙江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意愿并不高，明确表示在务工地定居的仅为 18.5%，希望回老家农村或城镇定居的约占一半，还有相当部分仍在观望、举棋不定。深入分析原因，主要是目前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及农村土地、房产等资产的处置等政策不明朗，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事实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户籍、就业、社会保障、计划生育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下的城乡分离、区域分割体制，已渗透到经济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并且盘根错节、繁复庞杂，在很大层面上还涉及国家的法律法规，存在诸多法律障碍，需要全国一盘棋，综合统筹、联动推进，浙江作为一个省难以取得根本性的突破。

三、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总体思路

基于推进城市化的现实基础和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意愿，为满足多元化需求、增强政策举措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应坚持统筹联动、因势利导、分步分类、渐进有序的基本原则，引导有需求、有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在适宜的城市区域就业生活，逐步享受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最终实现市民化。为此，建议按照人群、领域、空间、时间“四个有

^①即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序”的基本思路，建立可预期、可操作的市民化时序安排。

（一）人群有序

所谓人群有序，就是要根据农业转移人口的特点与意愿，优先推进有需求、有能力、条件成熟的人群市民化，进而形成示范作用，逐步推动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转化为市民。

1. 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优先。省内农业转移人口具有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就地就近市民化，可接受度更高、可操作性更强，财政压力也相对较小。从定居地意愿调查看，省内农业转移人口中，希望在务工地定居的比例最高，达 24.7%；省外农业转移人口中，希望回老家农村定居和到老家城镇定居的比例也最高，分别达 32.7%和 27.2%，可见地域文化认同和家乡情结对定居地意愿的主观影响也较大。建议优先引导同一行政区域内、地方认同感更强的群体融入当地城镇，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就地市民化”。

2. 市民化意愿强的人群优先。农业转移人口因自身条件不同，对市民化认可度和自愿程度有较大差异，意愿强的群体一般在城市具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和收入。而从实际调查看，大专及以上学历程度的农业转移人口明确表示愿意定居城镇的占总体意愿的 42.3%，初中及以下学历人群的该项意愿占 34.4%；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群体明确表示愿意定居城镇的占 47.3%，高于其他各收入水平的人群，对在务工地定居、在城镇定居的意愿较强。因此，建议把技术型、资产型农业转移人口优先纳入浙江省城镇居民管理体系，给予其市民化待遇，逐步提升市民化人口的整体素质。

3. 工作年限长的中青年人群优先。在城市务工时间越长，对城市生活的认识度越高，而中青年群体思想相对活跃，接受新事物的愿望也更迫切。调查显示，希望“在务工地定居”比例最高的年龄组是 31~40 岁，其次为 21~30 岁，表明中青年群体对定居城市的意愿更强；而外出打工五年以上的群体占 69.6%，有 59.7%的人近三年没有换过工作单位，对务工地的职业期望值较高，工作稳定性较强。建议把该类群体尤其是新生代群体优先纳入市民化梯队，为缓解城市老龄化压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挥积极作用。

4. 举家外出人群优先。举家外出是指未婚人员与父母在同一城市生活，或者已婚人员与配偶及全部子女（未成年子女和成年子女）在同一城市生活。问卷调查显示，举家外出且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工作生活的群体选择在务工地定居的比例最高，为 24.2%，而且从客观而言，这类人群更容易融入当地生活，返回老家定居的意愿较弱，在同等条件下应当优先推进其市民化进程。

（二）领域有序

所谓领域有序，是按照农业转移人口的基础条件和意愿，考虑地域可操作性和财政

负担能力，分轻重缓急、先易后难，集中解决紧迫问题，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1. 率先完善教育公共服务。为城市常住人口子女提供义务教育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从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愿望看，除了希望提高工资待遇以外，最希望子女能享受与市民同等的教育待遇，比例占总体的 19.7%。在教育服务上，有 82.3%的人最希望与城镇居民子女一样接受义务教育，要求十分迫切。因此，建议加快完善义务教育服务，按照城市常住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调整教育资源布局，重点支持接收农业转移人口子女的公办学校。逐步满足高中段教育需求，在国家“钱随人走”的政策支持下，有计划地进行高中学校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体系。

2. 逐步推进社会保障衔接。城市社会保障的完善程度是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因素，是推进农民向市民职业身份转变的标识之一。目前，城市的社会保障是农业转移人口较为期待但实际参保率不高的领域，主要有参保费用高、重复参保、转移接续难等问题。问卷调查显示，提高社会保障标准、消除城乡社保政策上的差异期盼比重较高，分别达 19.5%和 19.2%，有 15.9%的人希望社保可异地结算。鉴于此，建议逐步推进城乡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衔接、省内跨市保障制度衔接、缴费程度与保障服务衔接，实现各项保险无障碍转移接续，提高参保积极性和保障预期。

3. 审慎推进保障性住房逐步覆盖到农业转移人口。目前住房问题仍是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镇的重要瓶颈。通过对湖州市织里镇、绍兴市柯桥区、杭州市瓜沥镇等地调研后发现，面向农业转移人口的保障性住房量大面广，涉及规模庞大的建设土地指标与资金力量，地方政府难以承受。但考虑住房是农业转移人口定居城镇的基础条件之一，同时问卷调查显示有 17.1%的人最希望政府提供保障房，因此要审慎推进该领域的市民化发展。建议通过保障房、企业宿舍、公共租赁房等多种渠道，改善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条件。在保障房政策上，应设置一定的门槛条件，防止市民化人口“低端锁定”，把条件较成熟的群体逐步纳入城镇公积金和住房保障体系。

（三）空间有序

所谓空间有序，就是按照全省生产力布局和地区承载力，结合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地意愿，分区域、有重点地促进人口在不同地区、不同等级城镇间合理布局、协调发展。

1. 引导向重点开发区域集聚。从主体功能区规划看，重点开发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是承载人口和产业的重点区域。在空间上，主要以沿海平原地区和内陆丘陵盆地地区为重点，依靠产业牵引，通过配套区域性人口引导政策，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

迁移集聚。

2. 把都市区内的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作为突破口。县城和中心镇既具城市功能特点，又有广大农村腹地，能够以较高的区域认同、较低的转化成本推进市民化，是推进就地就近城市化的主体。尤其是都市区内的中小城市，大多处于城市化加速期，在区域通勤能力不断提升的前提下，通过承载中心城市的部分产业转移和功能外溢，可以吸纳相当数量的农业转移人口。从农业转移人口的定居地意愿来看，未来打算定居在县（市）城区和小城镇，分别占 37.7% 和 30.2%，总体占比较大。因此，建议以发展快、人口吸纳能力强的中小城市和中心镇为突破口，加快农业转移人口的集聚和转化。

3. 适当提高大城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门槛条件。由于人口基数较大、发展相对成熟，大城市环境承载力已较为有限，产业转型发展、城市品质提升客观要求遴选优质人力资本。而从农业转移人口的主观定居意愿看，受到生活成本高、生活便利度低等因素影响，仅有 14.8% 的人倾向于在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定居。因此，建议按照“调整存量、控制增量”的思路，优先推进素质较高的存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倒逼低素质农业转移人口随产业向外转移，避免大城市人口要素过度饱和。

（四）时间有序

所谓时间有序，是结合农业转移人口期望落户城镇的时间意愿，以及规划和政策制定实施的主要期限，综合得出大体的市民化时序安排。

1. 到 2015 年，基本完成市民化的公共服务配套设计和区域调控体系，推动有能力、有意愿群体率先市民化即到“十二五”期末，建立具有一定准入条件的市民化评价体系，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领域完成相应的改革设计。按照空间指引要求，各级城市因地制宜地建成市民化评价细则和操作体系。对于基础条件好、社会贡献大、紧缺型人才等群体，可以率先实现市民化。

2. 到 2020 年，形成完善的市民化体制机制，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无障碍市民化。即关键性制度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各项城市公共服务基本实现常住人口全覆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基本消除制度壁垒，城市化率进一步提高、城市化质量显著提升。

四、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点举措

按照“四个有序”的基本思路，考虑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复杂性、渐进性和长期性，建议采取以下四方面重点举措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一）深化完善“居住证+积分制”管理措施

1. 建立市民化的准入导向。受资源环境、城市设施建设、财政能力等条件限制，农业转移人口不能大规模、无限制扩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要求更关注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建议通过行政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建立适当的门槛条件。一是就业需求准入。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降低对普通劳动力的过分依赖，提高对高素质劳动力的定居吸引。二是居住时间准入。通过建立“居住证”制度，并配套基本服务年限，删减不稳定性高、流动性大的群体，吸引地方认同感强的群体落户。三是社会贡献准入。通过建立“积分制”评价体系、配套相应的服务待遇，衡量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和个体价值，建立长期稳定的发展预期，提高绩优型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回报。四是道德诚信准入。设立具有合法住所、合法职业、按时缴纳社保等市民化要求，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打击和抵制，形成自治、自律的市民化氛围。

2. 建立积分评价与保障配套体系。一是建立“重点优先、逐步推广”的积分评价体系。按照“人群有序”和“领域有序”方案，考虑领域可操作程度先易后难、人群素质先高后低的基本要求，加快制定积分制管理政策，将达到相应分值、条件较成熟的农业转移人口率先纳入城镇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更多的常住人口。二是建立“保基本、可升级”的保障服务体系。适度降低基本普适性公共服务的享受门槛，适当延伸服务内容和保障层级，与积分制的具体分值水平相挂钩，实行动态化管理，形成可升级、可预期的梯度福利待遇体系。

3. 建立省级和地方的联动积分制。积分评价体系由省级指标和各市自定指标两部分组成。省级积分评价体系为基础性评价，省内可流通、可接续；在此基础上，各地依据当地就业岗位、公共服务和财政状况等因素，制定差异化的积分细则。对人口高密度区域，要提高同等市民化待遇的积分要求，引导人口适当外迁；对中小城市地区，要适当降低积分要求，促进人口集聚。同时，研究制定不同地区间的积分转换渠道，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在各级城市的可控、可承载范围内有序转移。

（二）积极推进就地就近市民化

1. 实行差别化的落户指导。加快户口迁移制度、城乡统一登记制度、居住证制度“三项改革”，根据地方的发展需求和吸纳实力，结合各地积分评价体系，按照“先本地本省，后外地外省”的导向，因地制宜地指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先着力消化本地存量，重点考虑举家外出、市民化意愿强、具有较高职业技能和稳定工作经历的本地中青年农业转移人口；有条件地帮扶具备一定技能水平但有一定流动性的新生代农业转移

人口，提供培训提升和平等就业机会，改善公共服务，使有意愿、有能力的外地农业转移人口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逐步实现市民化；对中年以上的第一代农业转移人口，鼓励其返乡创业和再就业，就近就地实现市民化。

2. 以产业优化布局引导人口就近转移就业。推进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在产业链上的垂直分工和周边区域以特色产业为主导的横向分工，逐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资金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各级城市间的均衡发展，形成城市间产业分工体系和资源流整合体系。强化中心城市的高端要素集聚功能，吸引优质劳动力资源定居城市，外溢部分就业技能水平较低的农业转移人口；提升中小城市的产业发展水平，增强小城镇的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优化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和就业环境，提高对周边区域农业转移人口的就业吸纳能力，引导不同素质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在不同等级城市间合理流动。

3. 分阶段推进社会福利的公平共享。着力消除同一设区市内城乡间、地区间的教育服务差异，提高公办教育经费对当地农业转移人口子女教育的投入，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民办公助等方式，优先保障本市农业转移人口接受公平义务教育的权利，逐步推进有条件的外地农业转移人口子女享受市民同等教育权利。按照先本地、后外地的思路，优先将本地的农业转移人口纳入城市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探索较为灵活的医疗保险改革办法，统筹设区市内的各种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和基金使用。探索多种途径解决不同水平的农业转移人口的住房保障问题，给予有能力、有意愿的本地农业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同等住房政策待遇，享受首次置业优惠政策，享受住房公积金待遇。对于无力购房且达到一定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给予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租赁房、廉租房等保障房支持政策。

（三）着力构筑都市区交通与人口、产业一体化发展格局

1. 将都市区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打造成集聚人口和产业的主要载体。从当前情况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人口和产业压力过重，而相对偏远区域城镇对人口和产业的吸引力又不足，如果交通条件完善，都市区内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集聚人口和产业的潜力较大，可以成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平台。除了构建便捷高效的交通网络，提高区域通勤水平外，需要着力打破行政区划壁垒，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按照“研发在中心城市、制造在周边区域，孵化在中心城市、转化在周边区域”的产业市场分工规律，深化都市区内中心城市与周边区域的产业垂直分工，以及周边区域各类城镇之间的产业水平分工，逐步建成一批工业强县、工业强镇和工业强区，一批旅游休闲小镇、生活宜

居小镇，引导农业转移人口随产业在都市区范围内就业生活。另外，要加快建立都市区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机制，推动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功能下沉”，切实提高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居吸引力。

2. 加快建设和完善都市区交通网络。加快规划建设便捷的交通网络是实现中心城市人口和产业顺利向周边区域疏散的前提条件，是以“时间”换“空间”的重大举措。从都市区内城际联系看，要将人口、产业、城镇和交通统筹规划，加快构筑交通流量较大区域的城际轨道交通，带动沿线中小城市开发，形成若干以轨道交通站点为核心的集聚区域。从中心城市内部交通组织看，要着重解决多种运输方式的换乘衔接和车辆停放问题，实现大型交通枢纽“零距离换乘”，增强中心疏解和转运能力。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交通建设看，重点要与城市布局的前瞻性研究相结合，规划建设结构合理的城市道路网络，增强与区域性交通线网对接联系，提高城际通勤效率。

（四）研究部署若干配套改革试点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试点，探索共性经验和有益做法，成熟一批，推广一批，逐步破解市民化进程中的难点问题。一是城乡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以户籍制度改革试点为突破口，探索理清城乡户籍制度的附着利益体系，以城乡一体化为导向，在城乡户口迁移制度、城乡统一登记制度、居住证制度改革，以及原城乡户籍福利待遇体系的转换制度设计上作出探索，为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积累经验。二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推进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创新试验试点，探索在宅基地置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建设等领域的改革经验。三是都市区农业转移人口就地就近市民化建设试点。以大都市区为试点，推进都市区在基本公共服务、社会保障体系、城乡土地配置等方面的一体化建设，为区域内的就地、就近市民化提供改革经验。四是农业转移人口城市融入建设试点。以“人口倒挂”地区为重点，结合智能城市建设和信息化管理，探索已经在城市务工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在服务管理、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有益经验和做法。

五、关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体制 政策顶层设计的几点建议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关系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农民和市民、迁出地和迁入地等多方主体利益，涉及土地、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住房、财税体制等诸多重要改革事项，一些重大改革事项迫切需要中央顶层设计，一些关乎各主体切

身利益的政策制度，也需在国家支持下，因地制宜、创新设计、配套实施。建议国家层面重点关注和着力解决“一项根本制度改革、两个关键配套机制、三类统筹推进政策”的顶层制度安排，为有序推进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创造良好的体制政策环境。

（一）稳妥推进一项根本性制度改革

即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对农民具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保障的双重功能，是农民最重要资产、最大的利益。针对农业转移人口顾虑迁出地土地权益“进城不落户”的问题，建议在各地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以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农民财产权利市场化和城乡要素平等交换的进程，推动城镇户籍准入与土地权利分离，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和土地财产处置权。加快土地确权、赋权进程，在优先推进农村宅基地确权认证基础上，建设全国统一、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试点探索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建立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加快建立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产权流转和增值收益分配制度，探索进城落户农民承包地流转和宅基地退出机制，建立农民工享受城镇保障性住房与农村宅基地退出挂钩的机制，让农民在自愿基础上探索财产转让的多种方式，带着“可变现”资产进城。

（二）加快建立两个关键配套机制

即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的机制、城镇建设用地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

1. 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加快完善流入地吸纳人口的激励机制，按照常住人口确定各级财政分成，逐步调整各级政府财政分配关系。探索建立农业转移人口专项资金转移支付制度，提高城镇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中央分担比例；对于吸纳异省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省份承担的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就业培训、基本养老、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扩容和公共服务投入等相关事权，加大转移支付力度予以财力匹配，尽量做到按实有人口数进行分配、转移和保障，实现各项公共服务的“人头”经费“费随人转”，提高流入城市吸引人口定居的动力。

2. 建立城镇建设用地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机制。在严格供给城市建设用地供应、严格保护耕地总量不减少和质量不降低、严格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基础上，加快探索城镇建设用地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机制。对于吸纳异省农业转移人口较多的迁入地城镇，根据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数量，适度增加建设用地供给。对于吸纳本行政区域的农业转移人口，在城乡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的基础上，建立完善农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村落公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权益流转交易市场，引导和

规范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现城镇建设用地与农村建设用地“增减挂钩”。

（三）创新制定三类统筹推进政策

即“全国统筹”的与户籍改革配套同步实施的社保关系跨省续接联动政策、“城乡统筹”的进城落户农民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政策、“社会统筹”的各类资本共同参与市政建设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营政策。

1. 制定与户籍改革配套同步的社保关系跨省续接的联动政策。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关系，尽快修改《户口登记条例》，加快户籍立法进程，进一步明确进城农民和取消户口性质划分后农民在城乡的两地权益，修订与改革方向相悖的政策法规。加快户口迁移制度、城乡统一登记制度、居住证制度“三项改革”，打通本外地居民、城乡居民身份转换通道。在实现省级统筹的基础上，建立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并进一步完善跨省市人员其他保险关系的转移和接续办法，实现全国统筹，使得社保等人口流动背后的福利能够实时实地转移；适度降低费率和单位参保比例，让农民工能在同等条件下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实现同工同酬，提高参保率。鼓励进城务工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允许灵活就业农民工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 制定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相关支持政策。在土地指标、建设规划调整和转移支付等方面给予地方政府支持，鼓励各地政府给予有能力、有意愿的农民工城市居民同等住房政策待遇，享受首次置业优惠政策，享受住房公积金待遇、享受住房补贴待遇。对于无力购房且达到一定条件的进城农民工给予本地居民同等的公共租赁住房、廉租房等保障房支持政策。

3. 制定吸引各类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市政设施、保障房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运营的激励政策。建立社会资本共同参与分担的政策体系。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发行市政债；利用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措施，探索鼓励各类投资主体共同参与市政公用事业建设、基础设施、政策性住房建设的实施办法，对于有稳定收益的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鼓励公共基金参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社会事业领域，参与发展医疗事业、教育和社会培训。

参考文献：

1. 田明：《农业转移人口空间流动与城市融入》，《人口研究》2013 年第 4 期。
2. 陈前虎、杨萍萍：《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为例》，《浙江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 3 期。
3. 张国胜、陈瑛：《社会成本、分摊机制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基于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经济学家》2013年第1期。

4. 朱宇：《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南方人口》2004年第3期。

5. 冯奎：《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践分析与政策选择》，《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6. 李丹、李玉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析：基于生活满意度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2年第7期。

7. 刘晔、刘于琪、李志刚：《“后城中村”时代村民的市民化研究：以广州猎德为例》，《城市规划》2012年第7期。

8. 浙江省统计局：《2013年浙江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浙江省统计局网站，2014年3月6日。

9. 潘家华、魏后凯：《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No. 6：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10.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课题：《浙江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2014年。

11. 任映红、罗科萍：《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多重阻滞和推进路径》，《浙江学刊》2013年第2期。

12.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3. 文军：《“被市民化”及其问题：对城郊农民市民化的再反思》，《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责任编辑：李蕊、方虹

· 企 业 发 展 ·

台湾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王素贞 赵景华

摘要：台湾地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涉及金融政策、财税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金融支持政策体系主要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保证、融资辅导和多元融资管道三个子系统；财政方面主要是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通过预算投入资金用于辅导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税收优惠主要涉及与土地增值税优惠和盈利事业所得税相关的减免；科技创新方面主要是通过设立科技园区、研发资金支持、人才培养等形式；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中小企业辅导体系、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体系、技术服务体系以及多元的服务主体。此外，台湾比较注重设计务实的政策操作模式。借鉴台湾的经验，大陆应持续完善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不断拓宽深化面向中小企业的支持服务范畴，并可以考虑与台湾相关机构合作开展对中小企业的辅导。

关键词：中小企业 主要措施 启示 对策建议

作者简介：王素贞，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赵景华，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的根本，是提供就业岗位的主要管道，是优化改善收入分配结构的有效路径，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为有效应对危机冲击、激发

经济新活力，国务院先后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健康发展的意见》等政策措施，并于 2009 年 12 月 28 日成立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毋庸置疑，国家已经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

台湾地区享有“中小企业王国”之雅誉，在经济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中小企业扮演了重要角色，被视为“台湾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安定的稳固盘石，地方繁荣的中坚力量”。根据台湾“经济部”统计处相关统计数据计算，截至 2013 年底，台湾中小企业的数量为 133.12 万家，占企业总数的 97.64%；吸纳就业人数 858.8 万人，占台湾就业总人数的 78.30%；销售额为 11.32 万亿元新台币，占全部企业销售额的 29.44%；出口额为 1.42 万亿元新台币，占出口总额的 14.48%。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成就的背后，离不开其长期以来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实践中形成的相对完善的政策扶持体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考虑到两岸中小企业发展水平及扶持政策上目前仍存在一定差距的现状，本文选择以台湾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为研究对象，找出其好的经验做法，以资借鉴。

一、台湾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演变概况

台湾自 20 世纪 50 年代起开始扶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迄今相关的扶持政策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为零星支持阶段，从 1950 年到 1965 年。这一时期台湾尚未推出系统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是利用部分美国援助资金，通过第一银行、华南银行和彰化银行三家商业银行，针对小型工业贷款及商业贴现周转，协助中小企业购置进口机器设备，每个项目以六万美元为限。

第二阶段为系统辅导阶段，从 1966 年到 1990 年。20 世纪 60 年代起，随着台湾经济的逐步腾飞，中小企业开始蓬勃兴起，台湾当局也开始推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帮助辅导中小企业的成长。1966 年，当局联合“财政部”“经济部”“中央银行”以及台湾省政府等单位，成立了“中小企业辅导工作小组”；1967 年，于“行政院”经合会下设立中小企业辅导处，并制订《中小企业辅导准则》，标志着台湾对中小企业的扶持进入制度化的系统辅导阶段。此后，无论辅导的组织机构还是具体的政策举措，都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1970 年，经合会中小企业辅导处被撤销，改由“经济部”工业局第六组承接中小企业辅导工作；后又于 1974 年，由“财政部钱币司”等 11 个单位联合成立“中小企业联合服务中心”，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辅导。1981 年 1 月，“经济部”中小企业处正式成立，成立中小企业的主管部门。与此同时，《中小企业辅导准则》在 1992 年被废止前，也经历

了五次修正完善。这一阶段，台湾对中小企业的扶持政策主要制定中小企业辅导法令、建立综合辅导体系和规划中小企业融资贷款体系。

第三阶段为全面促进发展阶段，从 1991 年至今。1991 年 2 月，台湾当局颁布《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以此条例为统领，以《中小企业认定标准》《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收支保管及运用办法》和《中小企业辅导体系建立及辅导办法》三项法规为基本工具，台湾形成了全方位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体系，对中小企业提供法律保障，协助中小企业充份利用外部所提供的资源，健全与改善经营环境和提高竞争力。

二、台湾支持中小企业的主要政策措施

台湾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主要涉及金融、财税政策、科技创新政策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

（一）金融支持政策

台湾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政策体系主要由中小企业融资保证、融资辅导和多元融资管道三个子系统构成。

1. 融资保证。1974 年 1 月，为了配合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台湾相关政府部门、企业界和金融机构共同捐助超过 3.3 亿元新台币，成立“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信保基金设立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一些具有发展潜力但担保品欠缺的中小企业提供信用担保，有利其获得金融机构的融资；二是分担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投融资的风险，促进其为中小企业办理融资的积极性。信保基金主要来自于政府和银行的捐赠，截至 2014 年底，基金规模达到 1217.79 亿元新台币，其中政府历年累计捐助 946.47 亿元新台币，占 77.72%；签约金融机构累计捐助 271.32 亿元新台币，占 22.28%。在协助中小企业方面，截至 2014 年 12 月底，中小企业信用保证基金累计承保件数超过 568.77 万件，保证总金额累计达 93597 亿元新台币，协助保证户自金融机构取得融资总金额 127627 亿元新台币。

2. 融资辅导。1981 年，台湾“经济部”设立中小企业处，负责对中小企业提供辅导工作。为了配合台湾当局发展中小企业的政策，提供综合辅导，协助资金融通，改善财务管理，并培养财务管理人才，提高台湾中小企业的竞争能力。1982 年由台湾银行、土地银行、合作金库、华南银行、彰化银行以及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共七家金融机构捐助基金成立“财团法人台湾中小企业联合辅导基金会”，对具有潜力的但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提供综合辅导，并协助资金融通，使其具有竞争力。联辅基金会的主要服务项目包括：强化企业融资诊断服务、培养企业各类专业人才、执行财务管理诊断及项目辅导等。

目前，台湾已形成相对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辅导体系。融资辅导体系以多元方式和管道，为中小企业提供财务金融顾问现场诊断和咨询；作为中小企业与银行沟通的桥梁，协调金融机构对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协助企业办理财务人才培养，培养中小企业财会人员财务管理专业知识及财务运作技巧；辅导中小企业建立财务管理、内部控制、会计制度等，提升企业的财务管理能力及取得所需的融资。中小企业处积极建立财务融通服务辅导机制，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提供各类咨询、诊断、辅导与协调金融机构对企业提供融资协助，并帮助企业培养财务主管人才，提高财务管理能力。

3. 多元融资管道。一是建立政策性的中小企业专业银行。台湾当局于 1975 年修改了银行法，增补了关于成立台湾中小企业专业银行的条款，规定中小企业专业银行应该以“供给中小企业中、长期信用，协助其改善生产设备及财务结构，健全经营管理”为主要任务，由此确立了中小企业专业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据此，1976 年，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由台湾省合会储蓄股份有限公司改制设立，为台湾首创的以提供中小企业融资与辅导为主的银行。二是积极推动各大银行建立“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窗口”。根据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2015 年 1 月 16 日公布的资料，台湾银行公会和其 39 家会员银行设有中小企业融资窗口，并有专人负责具体业务。三是建立中小企业融资网络平台。银行可以参考中小企业的注册信息进行针对性的扶持。四是提供各类政策性项目贷款。目前共有升级扎根类、购置设备类、创业类、研究发展类、出口海外投资类、观光发展类、返台投资类和其他共八类 23 项项目贷款，用于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经过多年的探索，台湾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多层次融资管道，既包括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管道，也包括以股票和债券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管道。间接融资管道方面，主要是银行，包括一般性的商业银行、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以及民营小区银行等。直接融资管道包括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其中股票市场已经分为台湾证券交易所、柜台买卖中心、兴柜市场等层级，柜台买卖中心在 2014 年初又衍生出“创柜板”；债券市场有岛内公司债、海外公司债以及短期票券等形式。

在最主要的融资管道银行体系中，部分银行将相当比重的贷款资源投入到了中小企业中。表 1 显示，截至 2014 年底，台湾银行业对中小企业放款余额为 51716.15 万亿新台币，占其全部放款的比重为 23.85%，其中有 15 家银行对中小企业放款的比重超出了行业平均水平，其中第一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所占比重及市场占用率都最高，台湾中小企业银行次之。两者对中小企业银行的贷款占整个行业的将近二成，凸显出其在对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服务方面的领头羊地位。

表 1 2013 年—2014 年台湾中小企业银行贷款分布情况

(单位：新台币百万元)

项 目 银 行	2013 年			2014 年		
	对中小企业 放款余额	占全部 放款比重	市场占有 率 (%)	对中小企业 放款余额	占全部 放款比重	市场占有 率 (%)
总 计	4776740	23. 00	100. 00	5171615	23. 85	100. 00
第一商业银行	545859	45. 23	11. 43	585538	47. 11	11. 32
台湾中小企业银行	391603	43. 56	8. 20	431658	46. 12	8. 35
台中商业银行	149172	42. 67	3. 12	161224	43. 53	3. 12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152545	37. 82	3. 19	156315	36. 74	3. 02
阳信商业银行	62692	31. 74	1. 31	76241	36. 39	1. 47
彰化商业银行	310322	30. 92	6. 50	363930	33. 96	7. 04
华泰商业银行	23524	32. 59	0. 49	25698	33. 30	0. 50
板信商业银行	27381	27. 65	0. 57	40634	33. 13	0. 79
华南商业银行	379259	30. 29	7. 94	414658	31. 78	8. 02
兆丰国际商业银行	330945	29. 84	6. 93	359006	31. 21	6. 94
合作金库商业银行	511218	29. 35	10. 70	520200	31. 07	10. 06
京城商业银行	28136	26. 83	0. 59	35488	30. 14	0. 69
玉山商业银行	219041	29. 95	4. 59	239965	29. 79	4. 64
高雄银行	45538	27. 45	0. 95	50611	29. 79	0. 98
台湾新光商业银行	111467	27. 72	2. 33	127283	29. 44	2. 46

资料来源：台湾《金融业务统计辑要》，2014 年 12 月版。

(二) 财税支持政策

财政支持方面，主要是相关业务主管部门通过预算投入资金用于辅导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在台湾，中小企业辅导业务主要涉及“经济部”中小企业处、工业局、国贸局、商业司、技术处等部门以及“劳动部”。从这些部门单位年度决算经费来看（见表 2），2013 年共有 353.61 亿元新台币经费，其中用于中小企业的经费为 258.63 亿元新台币，占 73.14%。

税收优惠也是台湾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种手段，《中小企业发展条例》第四章自第三十三条至三十六条内容即为税捐减免，主要涉及与土地增值税优惠和盈利事业所得税相关的减免条款。

表 2 2012 年和 2013 年台湾“经济部”辅导中小企业经费情况

(单位：新台币千元)

年度经费 主办单位	会计年度决算金额		用于中小企业总额及比例	
	2012	2013	2012	2013
中小企业处	6857301	5385223	6857301 (100.00%)	5385223 (100.00%)
工业局	5943436	5066834	3937526 (66.25%)	3392085 (66.95%)
国贸局	5002088	5747690	4410084 (88.16%)	4528174 (78.78%)
商业局	1167415	1132522	471275 (40.37%)	470620 (41.56%)
技术局	18442370	18028617	11899750 (64.52%)	12087317 (67.05%)
合计	37412610	35360886	27575936 (73.65%)	25836419 (73.14%)

数据来源：台湾《2014 中小企业白皮书》。

(三) 科技创新扶持政策

针对中小企业在技术提升与创新方面的局限性，台湾采取了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相结合、辅导与辅助相结合方式，汇集政府与民间力量共同推动中小企业技术改造和升级。

1. 加大科技政策支持力度。台湾当局不断利用法规及其所包含的优惠政策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自 1991 年起陆续颁布了《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促进产业升级条例》《公平交易条例》和《产业创新条例》等政策，通过法规形式，提供经费补助、租税优惠和鼓励创新等配套服务，鼓励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1999 年初正式公布《台湾科学技术基本法》，对于科学技术经费预算的持续充实、研究资源的充实、基础研究的支持以及科研成果的运用、科技成果转化的监督、政府科技发展计划及其内容、科技人员的保障与运用、促进科学技术教育、推动科学技术合作等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2. 创立科技园区。科技园区的创立引导了台湾高科技的发展。1980 年，受美国硅谷的启示，台湾建立了第一座科学园区——新竹科学园区。园区周边的清华大学、交通大学等知名学府以及工研院等学术研究机构为园区的产品研发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充分支持。之后，先后于 1995 年 5 月核定台南园区一期基地，2000 年 4 月及 9 月再核定高雄园区和台南园区二期基地，共同组成南部科学园；并于 2002 年核定中部科学工业园区，分布在台湾中部的台中、彰化、云林及南投四县市。

3. 支持创新资金。技术资金短缺是制约中小企业技术升级的重要瓶颈，台湾当局主要通过五种方式对中小企业的研究与创新给予了大量的资金支持。一是政府直接投资。《促进产业升级条例》规定，“行政院”应以财政拨款为产业结构升级或者改善产业结构的重要事业和计划融贷资金；为辅导产业健全发展办理融资贷款；配合主管机关执行引

进技术、培训人才、加强研究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改善、防治污染等计划；支持辅导中小企业发展的有关计划等。二是倾向性的融资措施。相关部门推行了很多对高科技产业发展有利的融资服务措施，用以协助专业银行配合技术升级的资金需求。如台湾“中央银行”出台有“中小企业开发性计划及中小企业升级贷款”“策略性科技工业投资计划贷款”“外币资金融通”等。三是设立科技股。台湾证券交易所于 1994 年 7 月增订了“第三类科技事业股票上市标准”，较第一、第二类股票上市标准宽松许多。四是建立创投基金。为支持中小企业的研究创新，台湾地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规划创业投资基金，用以鼓励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发展。五是对中小企业研发活动所需经费给予一系列资助。比如，对参加开发主导性产品的中小企业提供 50%~90% 的开发经费补助款，所开发出的技术供中小企业无偿使用。

（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台湾当局就陆续开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经过 40 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具有特色的成熟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1. 中小企业辅导体系。1991 年 12 月，台湾“经济部”依据《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制定发布了《中小企业辅导体系建立及辅导办法》，明确建立了经营管理、财物融通、信息管理、生产技术、研究发展、工业安全、污染防治、市场营销等八大辅导体系。1994 年 7 月，进一步增加了质量提升和互助合作两个辅导体系，后来又将创业育成辅导体系纳入，形成了目前的 11 大辅导体系的架构，建立了一个颇为完整的中小企业辅导分工体系。

辅导体系建立后，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在不断壮大健全。以育成辅导体系为例，自 1996 年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建立第一个创业育成中心以来，1997 年全台湾共建成七家，以后以大约每年十家的速度增加。到 2012 年初，全台湾已建成 130 家育成中心，其中大专院校型 98 家，占 75.38%；财团法人型和政府机构型各 13 家，民间经营型六家。中心的培育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进驻培育，提供培育空间供企业定期进驻；二是虚拟培育，运用因特网，以会员方式培育中小企业，会员企业的权利义务与进驻企业相同。中心对中小企业起到了明显的孵化作用，截至 2013 年 6 月，全部育成中心累计培育企业接近 6000 家，累计维持及新增就业人数达到 150 万人，累计上市上柜企业达到 56 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进一步提升育成创业效率，台湾“经济部”从 2012 年起又开始在“创业台湾计划”下推动“创业点子工厂”和“育成加速器”等计划，并在 2014 年以“YES Taiwan”为名，持续推动“创业台湾计划”。“YES”的 Y 代表 Young（青年）、E 代表 Energy（活力）、S 代表 Startup（创业），体现出台湾近来对青年创业辅导的重视和强化，

也是未来发展中小企业的一个新方向。

目前台湾还在积极推动中小企业活络升级，主要内容分为五大方面：一是营造优质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包括政策形成信息提供、法制作业法规服务以及归集问题协调解决；二是强化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辅导功能，包括经营质量强化、市场商机拓展、互助合作辅导、地方产业发展和在地产业提供等；三是建构中小企业创业育成平台，主要从事创新育成、创业协助、人才培育以及协助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化事务；四是整合中小企业财务融通机制，包括诊断辅导、融资保证和促进投资；五是提升中小企业科技信息应用能力，包括数字加值应用、质量管理提升以及绿色减排辅导等。

2. 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体系。台湾的人口密度虽然位居世界第二位，可劳动力资源却相对短缺，不过其劳动力素质较高。事实上，台湾成功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因在于其重视教育，台湾有一套从幼儿园到研究院、职业教育等完备的教育体系，使之文盲率达到世界最低标准。此外，台湾中小企业非常重视培养员工的工作积极性，通过对科技人才和科技成果的奖励，提高中小企业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迅速提高科研水平。台湾中小企业还注重培养和招揽高技术人才，增强企业科技实力，对有特殊才能的科研领导人才按照国际标准给予待遇及充足的研究经费，广泛吸引海内外科技人才到台工作。

3. 技术服务体系。在技术体系方面，台湾目前是按照功能别与产业别分开进行，在功能别方面有质量提升、自动化引进、合作推广等主题。该辅导体系的主管机关是“经济部”工业局和中小企业处，而主办及协办单位包括工业技术研究院、生产力中心、中卫发展中心、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资策会、中山科学研究院、制鞋工业技术中心、生物技术开发中心、塑料工业技术中心、纺研中心、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车辆测试发展中心、精密机械发展协会、工会或协会等。在产业别方面有信息工业、民生工业、塑料工业等重点产业。

4. 多元服务主体。在台湾，对中小企业进行服务的主体，除政府相关部门外，还有行业协会和各类社会力量，整合了多元力量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一是政府部门。“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设有“马上办服务中心”，旨在通过中小企业主管机关的联系、协调与服务机制，及时有效地帮助中小企业解决突发问题，尤其是与融资有关的咨询与协助，包括贷款展延、债权协调、增贷等方面。同时，为加强对各地方中小企业的服务，各县市也设有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形成了一个上下连贯、左右交织的相当完整的官方服务体系。

二是行业协会。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台湾中小企业总会和各地协会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小企业总会成立于1972年，并在各县市都设有中小企业协会。总会实行会

员制，会员分为公司会员、个人会员、团体会员和赞助会员四类。为更好地服务于中小企业的个性化需求，总会于理事会下设立了国际、两岸、人力、产学合作、权益促进和财税六个功能委员会，并成立了包括企资中心、创辅中心、推广中心、企发中心、企研中心、职发中心、产创中心、企服中心和创发中心在内的九个营运单位。总会和地方协会的工作职能除强化地方服务网络外，还协助政府推动相关政策，并扮演中小企业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桥梁，起到纽带作用。

三是其他社会力量。高等院校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又一重要力量，台湾设立创新育成中心有 3/4 都属于大学院校型，其目的就在于充分利用学校的资源，协助中小企业的创业与创新，辅导高科技产业，促进中小企业的转型与升级。还有生产力中心、工业技术研究院、对外发展协会、信息工业促进会、行库中小企业联合辅导中心等行业协会和专业机构协助各机关对中小企业进行专业性辅导。此外，台湾还通过推动实施中小企业荣誉指导员计划发挥个人的力量促进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具体而言，从地方遴选企业经营良好、热忱的企业经理担任义工，参与地方中小企业发展咨询。

此外，在政策执行层面，为保证各项政策落实到位，台湾比较注重设计务实的操作模式。比如，为保证辅导体系落到实处，对应都制定有作业要点，内容主要包括明确规划各项辅导体系目的、推动策略、工作重点、作业流程等；为保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问题的效率，实行融资辅导单一窗口服务制度，即通过“马上办服务中心”一个窗口为中小企业办理一揽子的融资方面服务，尽可能为企业省去不必要的麻烦。

三、主要启示及对策建议

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与时俱进的扶持政策和政策的有效落实。虽然两岸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发展程度和具体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两岸共同的文化特征及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共性问题等，台湾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好的做法可以为大陆更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1. 持续完善中小企业的政策法规，为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台湾《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发布以来已修订七次，大陆于 2003 年实施《中小企业促进法》迄今已十余年，需要与时俱进进行修正，并积极完善实施相应配套政策，落实好各项具体措施。同时，中小企业划分标准也需要适时修订和不断完善，以更好地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2. 健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借鉴台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的成功经验，完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体系。首先，成立国家中小企业银行，类似台湾中小企业银行，尝试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同时加大现有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建立和完善适应于中

小企业贷款特点的银行体系；其次，针对中小企业提供政策性项目贷款，鼓励银行发展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等新兴的金融机构，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改进金融服务，增加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以提升中小企业融资规模。

3. 不断拓宽深化面向中小企业的支持服务范畴。台湾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已经涵盖了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方面，并呈现出从一般的政策扶持向提供诊断、咨询等领域延伸的趋势。大陆可以借鉴台湾的经验，从目前突出重点的支持，逐步过渡到与《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适应的全方位支持，尤其注重使服务范畴兼顾营造良好经营环境和提高中小企业竞争力两个方面。同时，拓展和深化中小企业急需但普遍缺乏的知识型服务内容，如企业间信息网络、交易网络和合作网络的生成、人力资源培训、有关市场和行业的研究分析和咨询等。

4. 合作开展对中小企业的辅导。建议设立中小企业暨台资企业转型升级联合服务机构，与台湾电电公会、生产力中心、资策会、中卫发展中心等专业辅导机构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与这些机构的优秀辅导专家建立日常联络机制。联合服务机构负责根据大陆中小企业和台资企业的实际需求，组织相关领域的辅导专家进驻企业，开展针对性的诊断和转型升级辅导，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做”式的解决方案，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难题和发展困境。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应对联合服务机构的日常运作给予每年一定数额的经费支持，对接受初步诊断和深入辅导的企业给予一次性的经费补助。

参考文献：

1. 民建中央中小企业代表团：《台湾中小企业发展的几点启示》，《经济界》2014年第1期。
2. 台湾“经济部”中小企业处：《2014 中小企业白皮书——美国“再工业化”下台湾中小企业之机会》，2014年。
3. 台湾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基金2014年年报》。
4. 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局：《金融业务统计辑要》，2014年12月版。
5. 董丽丽：《海峡两岸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支持体系的比较研究》，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
6. 侍安宇：《台湾中小企业银行的发展与转型历程》，《上海金融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责任编辑：李蕊、方虹

· 调 研 报 告 ·

农户分化对农机服务使用与需求的影响及启示^{*}

姜长云 郑秋芬

摘要：基于对全国 10 个省（自治区）农户的问卷调查，将农户分为农场类户、以农为主和以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分析并比较了不同类型农户的农机使用行为、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基于这些分析，提出要把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顺应农户分化趋势加强分类指导有机结合起来。要在鼓励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健全农户分化的促进机制；加强对农业机械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推进农机服务信息网络建设；要着力推进农机服务标准化建设，积极引导农机服务质量的提高；积极实施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引导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业发展。

关键词：农户分化 农机服务 农业机械化

作者简介：姜长云，国家发改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郑秋芬，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

近年来，我国农业机械化迅速推进，农机服务蓬勃兴起，有效地促进了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我国农业组织创新日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产业链视角下的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研究”（批准号：2&ZD056）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农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模式、机制、需求及不同区域支持重点的选择”（项目批准号：71273070）的成果。

趋活跃，传统农户不断分化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工商资本投资农业，也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提供了新的路径。农户分化和农业组织创新，不仅引发了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变化，也对农机使用、农机服务需求甚至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式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为了调查农户分化及其对农机使用和农机需求的影响，我们于2014年春节前后，按照一户一卷方式，组织部分高校的学生利用春节返乡机会对四川、江苏、安徽、河南、浙江、广东、陕西、辽宁、内蒙古和新疆等10省（自治区）的农户进行了问卷调查，共获总体有效问卷1121份。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我们将农户分为农场类户和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农场类户指实际耕种面积南方50亩以上、北方100亩以上的大户或农场，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表。以农为主、以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均指实际耕种面积南方50亩以下、北方100亩以下的农户。兼业农户是以农为主还是以农为辅，根据其主要收入来源确定。本文将基于该问卷调查数据，就农户农机服务的使用及需求情况进行分析，探讨农户分化对农户农机使用、农机服务需求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在具体分析时，剔除对应选项应填未填的问卷，各问题的有效问卷数略有不同。

一、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学者对农机实体及相关服务需求的研究比较成熟。部分学者采用一般均衡模型、投入产出模型以及基于一定理论的回归模型等，从宏观层面分析了其对农机总量的需求或投资需求，并探讨影响因素（Whitson, 1981; Gracia, 1982; Abebe, et al., 1989）；还有一些学者采用Probit等模型，从农户角度分析了农场主的农机采纳行为、对农机具的需求量及其影响因素，发现经济、投入要素、环境、农户心理等都是影响农机化发展和农机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Kulshreshtha, 1975; Nikhadeand Bhople, R. S., 1989）。

国外学者关于农机需求的实证研究，对于中国学者深入分析微观层面的农户需求行为，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考虑到中国以小规模、分散化农户为主的农业组织结构特点，将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方法或模型、假设拿到中国应用时，往往需要加以改造或修正。

迄今为止，国内对农机实体及相关服务需求的研究，主要局限于宏观层面，微观层面的研究在总体上仍然较为薄弱。如有些学者采用神经网络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来分析和预测我国对农机化总动力的需求，并探索其影响因素（杨敏丽、白人扑等，2004；杨印生等，2006）。近年来，一些学者逐步把研究视角转向农户层次，相关微观层面的研究才开始呈现不断加强趋势，但就总体而言相关研究成果仍非常有限。如刘玉梅等（2009）

提出了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对农机装备的需求具有决定性影响；纪月清等（2013）认为，农户农机需求的影响因素为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非农就业人数等。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土地加快流转。在此背景下，我国小规模、分散化传统农户向两类兼业农户或种养大户、家庭农场的分化日益加快，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机实体及相关服务的需求或选择行为日益呈现差异化趋势。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围绕农户分化对农机使用和服务需求影响的研究仍然比较少见。因此，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对深化相关理论和政策研究有所启发。

二、农户的农机使用

（一）农户拥有农业机械的情况

据对 1105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农场类户、以农为主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 15.2%、45.2% 和 39.6%，2013 年平均的实际耕种面积分别为 393.87 亩、19.20 亩和 7.43 亩。据对 983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拥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占全部有效问卷的 59.9%。在农场类户和以农为主、以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中，分别有 86.2%、66.0% 和 40.4% 拥有农业机械。^① 与全部农户的平均水平相比，在农场类户和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中，拥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占比分别高出 26.3 个百分点和 6.1 个百分点；而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拥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占比低出 19.5 个百分点。可见，农业土地经营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的农户，拥有农业机械的可能性越大，在农业生产环节越需要通过农机使用替代人工劳动。

（二）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原因

据对 718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分析，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三大主要原因分别是：减轻劳动强度、使用机械作业效率更高和弥补劳动力不足，分别占全部有效问卷的 46.4%、33.0% 和 13.2%。农场类户、以农为主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三大主要原因与整体情况基本相同（见表 1）。

从不同类型农户的比较可见，从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到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再到农场类户，随着农户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户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使用机械作业效率的重视程度也呈提高趋势，对应农户占比分别达到 29.8%、32.9% 和 37.4%。形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户土地经营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面临劳动力不足的

^①本文对农业机械范围的界定比较宽泛，包括农用运输车、农用水泵、小型拖拉机（手扶）、小型拖拉机配套农具、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耕整机、机动播种机、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联合收割机等。

问题往往越突出；当前较高的农业用工成本，也容易趋使其更加重视农业机械对劳动力的替代。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生产的季节性或农业作业的时效性较强，也导致农业土地经营规模较大、专业化程度较高的农户，更加需要重视农业作业效率，以便“不误农时”。

表 1 农户使用农业机械的主要原因 (单位：户、%)

		减轻劳动强度	弥补劳力不足	使用机械作业效率更高	降低农产品损耗	机械作业比雇工更便宜	保障农产品质量	节本增收	其他	合计
农户数量	农场类	60	26	61	0	6	0	10	0	163
	以农为主	169	40	114	3	7	4	10	0	347
	以农为辅	104	29	62	0	8	1	3	1	208
	合计	333	95	237	3	21	5	23	1	718
占同类农户总数的比重	农场类	36.80	16.00	37.40	0.00	3.70	0.00	6.10	0.00	100.00
	以农为主	48.70	11.50	32.90	0.90	2.00	1.20	2.90	0.00	100.00
	以农为辅	50.00	13.90	29.80	0.00	3.80	0.50	1.40	0.50	100.00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46.40	13.20	33.00	0.40	2.90	0.70	3.20	0.10	100.00

(三) 农户接受或使用农机服务的情况

近年来，随着农户分化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成长，随着农机具购置补贴政策的推进，不同类型农户对农机服务需求的差异日趋突出和扩大。据对 1012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接受或使用过机耕、机收机割、机播、机插、机械施肥撒药等服务的农户分别占全部有效问卷的 66.6%、64.0%、35.8%、9.3%和 18.7%。可见，机耕、机收仍是当前农户接受或使用农机服务的重点，机播、机插特别是机械施肥撒药服务是当前我国农机服务的薄弱环节。接受或使用过机播、机插服务的农户占比较低，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我们调查的全部农户中，分别有 38.4%的农户单纯种植水稻，有 29.6%的农户只种植小麦。小麦生产的技术特点导致其没有机插服务需求；部分地区水稻播种机械尚未普及，也影响农户对机播的服务需求。

对不同类型农户的比较，就总体而言，第一，在农场类户，接受或使用过各项农机服务的农户占比都明显高于两类兼业农户。以机收机割为例，在农场类户有 75.0%接受或使用过机收机割服务，比以农为主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分别高出 21.2 个百分点和 3.6 个百分点。可见，农业专业化和规模化的推进，有利于培育农机需求，促进农业机械化

和农机服务业的发展。第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的发展，可以为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新的路径。除农机施肥撒药服务外，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接受或使用过机耕、机收机割、机播服务的农户占比都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详见表 2）。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相对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平均收入水平较高，有利于形成机械服务对人工劳动的替代。相对而言，更多的以农为辅的兼业户将农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定位于“保口粮”“保自给”，农业经营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土地经营规模较小。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从事农业劳动的自有劳动力数量往往较少，甚至还有更为严重的农业劳动力老弱化问题，需要通过农机服务降低成本和农业劳动强度。

表 2 农户接受过农机服务的情况 (单位：户、%)

		机耕	机收机割	机播	机插	机械施肥撒药
农户数量	农场类	124	126	91	30	72
	以农为主	292	247	162	25	71
	以农为辅	258	275	109	39	120
	合计	674	648	362	94	295
附：有效问卷总数		1012	1012	1012	1012	1012
占同类农户总数的比重	农场类	73. 80	75. 00	54. 20	17. 90	42. 90
	以农为主	63. 60	53. 80	35. 30	5. 40	15. 50
	以农为辅	67. 00	71. 40	28. 30	10. 10	11. 90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66. 60	64. 00	35. 80	9. 30	18. 70

（四）农户对当前农机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据对 101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当前就总体而言：第一，仍有不少农户对农机服务不了解或未接触。如在机耕、机收机割、机播、机插、机械排灌、机械施肥撒药服务中，分别有 25.8%、24.3%、47.6%、70.2%、50.4%和 60.7%的农户对当前的服务供给不了解或未接触。第二，农户对当前农机服务供给的满意度总体来说不高。以农机化发展程度较高的机耕服务为例，在全部问卷中，表示很满意和满意的农户占比分别仅为 16.1%和 40.3%，仍有 17.9%的农户表示一般或无所谓、较不满意甚至很不满意。第三，在当前的各种农机服务供给中，以农为主、以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的满意度，在总体上明显低于农场类户。以机耕服务为例，表示满意或很满意的农户占比，农场类户为 62.5%，以农为

主、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分别为 53.4%和 57.3%（见表 3）。这种现象的形成，与农场类户农机服务需求较大有直接关系。

表 3 对当前农机服务供给的满意度 (单位：户、%)

占同类农户总数的比重		不了解或未接触	很满意	满意	一般或无所谓	较不满意	很不满意	附：有效问卷数
机耕		25.80	16.10	40.30	12.90	4.00	1.00	1011
机收机割		24.28	14.77	35.58	15.76	7.83	1.78	1009
机播		47.60	9.70	22.90	16.40	2.70	0.70	1010
机插		70.20	3.20	9.00	15.40	1.90	0.40	1009
机械排灌		50.40	8.40	17.80	14.10	6.60	2.60	1011
机械施肥撒药		60.70	4.40	13.70	15.40	4.50	1.50	1009
例：机耕服务	农场类	21.40	14.30	48.20	11.30	4.20	0.60	168
	以农为主	27.90	16.10	37.30	12.60	4.80	1.30	459
	以农为辅	25.30	16.90	40.40	13.80	2.90	0.80	384

（五）农户购买农机服务时最看重的因素

在本项调查中，为了了解农户对农机服务的购买行为，我们问到当初在购买农机服务时，农户第一看重、第二看重的因素分别是什么？据对 746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影响农户农机服务购买行为的三大因素分别是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服务价格。如在全部有效问卷中，购买农机服务时选择服务质量作为两大看重因素的占累计总频数的 32.1%；选择购买价格和服务效率作为两大看重因素的，分别占累计总频数的 28.3%和 18.9%。

值得注意的是，在购买农机服务时，农场类户对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购买价格和服务效率，但对购买价格和服务效率的重视程度差别不大，对应农户占比分别为 33.8%、22.3%和 21.9%。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对农机服务购买价格和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服务效率，但对购买价格和服务质量的重视程度差别不大，对应农户分别占累计总频次的 31.2%、30.2%和 18.2%。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最重视服务质量，对农机服务的购买价格和服务效率的重视程度依次降低，对应农户分别占累计总频次的 33.2%、28.0%和 18.2%。相对而言，农场类户对服务效率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两类兼业农户，这与其农业经营规模较大有密切关系；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更看重农机服务的购买价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平均收入水平相对较低。

表 4 购买农机服务时看重的因素 (单位: 户、%)

		购买 价格	服务 质量	服务 效率	服务 态度	提供的 配套服务	服务的 及时性	农机 品牌	其他	合计
累计 频次	农场类	62	94	61	3	9	23	20	6	278
	以农为主	194	188	113	13	18	46	26	24	622
	以农为辅	155	184	101	15	23	58	12	6	554
	合计	411	466	275	31	50	127	58	36	1454
占总次的 比重	农场类	22.30	33.81	21.94	1.08	3.24	8.27	7.19	2.16	100.00
	以农为主	31.19	30.23	18.17	2.09	2.89	7.40	4.18	3.86	100.00
	以农为辅	27.98	33.21	18.23	2.71	4.15	10.47	2.17	1.08	100.00
	合计	28.27	32.05	18.91	2.13	3.44	8.73	3.99	2.48	100.00

(六) 对当前农机服务现实问题的评价

在本次调查中，当问到“您家对当前农机服务现实问题的评价”时，要求农户提供最主要和第二主要的评价。据对 144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约占累计总频次 30%的农户认为当前农机服务总体不错、较好或很好，分别约有占累计总频次 24%、16%、14.7%和 13.6%的农户认为“成本高、价格高”、供给缺乏保障、质量太差、全过程配套性差。

就不同类型农户的比较可见，从以农为辅到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再到农场类户，随着农业专业化、规模化水平的提高，认为当前农机作业服务“质量太差”的农户占比呈降低趋势，对应农户依次占比为 17.4%、13.8%和 11.3%；认为当前农机作业服务“全程配套性差”“供给太少或不及时”的农户占比均呈提高趋势（详见表 5）。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第一，随着农户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机服务的专业化、规模化呈增强趋势，这有利于提高农机服务质量；第二，农户的农业经营规模越大，对用机械替代劳动的需求往往越强，越需要增进农机服务的全程配套性和供给及时性，否则就越容易形成对农业效益的负面影响；第三，随着农机服务需求规模的扩大，作为农机需求方的农户相对于农机供给方的谈判地位趋于提高，这有利于促进农机服务质量的提高和价格的降低。

表 5 农户对当前农机服务现实问题的评价 (单位：户、%)

		质量 太差	成本高， 价格高	全过程配 套性差	供给太少 或不及及时	总体 不错	较好或 很好	其他	合计
累计 频次	农场类	31	51	44	54	70	19	5	274
	以农为主	82	152	84	94	122	49	10	593
	以农为辅	93	133	63	76	126	34	10	535
	合计	206	336	191	224	318	102	25	1402
占总频 次比重 (%)	农场类	11. 31	18. 61	16. 06	19. 71	25. 55	6. 93	1. 82	100. 00
	以农为主	13. 83	25. 63	14. 17	15. 85	20. 57	8. 26	1. 69	100. 00
	以农为辅	17. 38	24. 86	11. 78	14. 21	23. 55	6. 36	1. 87	100. 00
	占农户总数的 的比重	14. 69	23. 97	13. 62	15. 98	22. 68	7. 28	1. 78	100. 00

三、农户对农机服务的需求

(一) 对未来各类农机服务的需求强度

从表 6 可见，农户对未来农机服务的需求，从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到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再到农场类户，在总体上呈现依次增强的趋势，无论是机耕、机收机割、机播、机插，还是机械排灌、机械施肥撒药等服务都是如此。如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和农场类户中，对机耕服务需求很强烈和强烈的农户合计占比，分别为 60.8%、62.4%和 67.3%。可见，农户农业专业化、规模化的发展，有利于激发农户的农机服务需求，强化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动力。

表 6 对农机服务需求的强烈程度 (单位：户、%)

占同类农户总数的比重		很强烈	强烈	一般	较不强烈	较弱或无需求	附：有效问卷数
机 耕	农场类	30. 40	36. 90	22. 60	1. 20	8. 90	168
	以农为主	23. 20	39. 20	24. 50	5. 90	7. 20	459
	以农为辅	16. 40	44. 20	23. 60	5. 70	10. 10	385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21. 80	40. 70	23. 90	5. 00	8. 60	1012
机 播	农场类	28. 00	28. 00	26. 80	3. 60	13. 70	168
	以农为主	16. 80	26. 70	32. 80	9. 40	14. 20	457
	以农为辅	10. 90	22. 30	32. 20	11. 20	23. 40	385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16. 40	25. 20	31. 60	9. 10	17. 60	1010

注：为了节约篇幅，仅以农机服务的重点环节机—耕服务和薄弱环节—机播服务为例列表。

(二) 当前最需要哪种组织提供的服务

在本项调查中，当问到“当前您家最需要哪两种组织提供的服务”时，我们提供的选项除了农户家庭自我提供和农户互助外，其他的如农机作业专业户、农机合作社、土地等其他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乡村集体的农机服务队、农机服务公司（或超市）、涉农企业或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均属市场化服务组织。据对 731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当前农户最需要其提供农机服务的组织均属市场化服务组织，在农场类户、以农为主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最需要市场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的农户占比分别为 63.4%、57.1%和 64.3%。农场类户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对市场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的需求，都明显强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形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农场类户农业经营规模明显大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在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中拥有农机户占比高于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

表 7 农户当前最需要哪两种组织提供的服务 (单位：户、%)

		自家提供	农户互助	市场化服务组织	其他服务组织	合计
频 次	农场类	39	49	175	13	276
	以农为主	103	125	336	24	588
	以农为辅	56	90	340	43	529
	合计	198	264	851	80	1393
占 总 频 次 比 重	农场类	14.13	17.75	63.41	4.71	100.00
	以农为主	17.52	21.26	57.14	4.08	100.00
	以农为辅	10.59	17.01	64.27	8.13	100.00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14.21	18.95	61.09	5.74	100.00

(三) 当前最需要哪种动力类型的农业机械提供服务

当问到“您家最需要哪种动力类型的农业机械提供服务”时，我们提供了五项备选项（见表 8 注）。据对 972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当前最需要超大型农机、大型农机、中型农机、小型农机和微型农机的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 4.7%、20.8%、27.6%、32.6%和 14.3%，农户对小型农机和中型农机提供服务的需求分别位居前两强，对大型农机、微型农机和超大型农机提供服务的需求则依次明显减弱。

但在不同类型农户之间，最需要提供服务的农机动力类型差别很大。在农场类户，最需要提供服务的农机动力类型，第一是大型农机，第二是中型农机，分别占同类农户

总数的 39.1%和 31.1%，合计为 70.2%。在以农为主、以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中，最需要提供服务的农机动力类型第一均是小型农机，占比为 68.1%，第二均是中型农机，占比为 57.1%。相对而言，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最需要微型农机提供服务的农户比重明显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二者分别为 23.2%和 11.2%。可见，随着农户农业经营规模的扩大和农户经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农户对提供服务的农机动力类型的需求呈现由小型化向大型化转变的趋势，以使用大型机械为主导的农业机械化与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的推进之间，具有良好的互动关系。

表 8 当前农户最需要哪种动力类型的农业机械提供服务 （单位：户、%）

		超大型农机	大型农机	中型农机	小型农机	微型农机	合计
频次	农场类	21	63	50	23	4	161
	以农为主	20	72	131	172	50	445
	以农为辅	5	67	87	122	85	366
	合计	46	202	268	317	139	972
占总频次的比重	农场类	13.00	39.10	31.10	14.30	2.50	100.00
	以农为主	4.50	16.20	29.40	38.70	11.20	100.00
	以农为辅	1.40	18.30	23.80	33.30	23.20	100.00
	占农户总数的比重	4.70	20.80	27.60	32.60	14.30	100.00

注：①超大型农机（动力达 100 马力以上），②大型农机（动力达 50 马力以上低于 100 马力），③中型农机（动力在 20 马力以上 50 马力以下），④小型农机（动力在 10 马力以上 20 马力以下），⑤微型农机（动力在 10 马力以下）。

当前我国小麦生产基本实现了全程机械化，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 2014 年达到 73%左右^①。根据对水稻种植户 416 份、小麦种植户 319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在本次调查中，水稻种植户对农机动力类型的选择位居前二的分别是小型农机和中型农机，分别占全部有效问卷的 38.7%和 28.9%，小麦种植户对农机动力类型的选择位居前二的分别是大型农机和小型农机，分别占全部有效问卷的 33.9%和 28.5%（见表 9）。这种差异的形成，与更多的小麦种植户位居适宜农机动力较大的平原地区有关。

①王宇：“农业部：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力争五年后达到 78%”，《新华网》2015 年 4 月 16 日。

表 9 不同地貌特征的农户最需要哪种类型的农业机械（单位：户、%）

		水稻种植户					小麦种植户				
		平原区	丘陵区	山区	其他	合计	平原区	丘陵区	山区	其他	合计
频次	超大型农机	5	0	0	0	5	15	0	0	0	15
	大型农机	56	9	0	0	65	92	5	11	0	108
	中型农机	83	18	9	0	110	62	3	14	0	79
	小型农机	111	37	14	1	163	75	3	12	1	91
	微型农机	32	21	20	0	73	18	7	1	0	26
	合计	287	85	43	1	416	262	18	38	1	319
占总频次的比重	超大型农机	1.74	0	0	0	1.20	5.73	0	0	0	4.70
	大型农机	19.51	10.59	0	0	15.63	35.11	27.78	28.95	0	33.86
	中型农机	28.92	21.18	20.93	0	26.44	23.66	16.67	36.84	0	24.76
	小型农机	38.68	43.53	32.56	100.00	39.18	28.63	16.67	31.58	100.00	28.53
	微型农机	11.15	24.71	46.51	0	17.55	6.87	38.89	2.63	0	8.15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注：本表中存在部分农户既是水稻种植户，又是小麦种植户。

四、结论及启示

基于前文分析，在推进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过程中，应把加强对农业机械化和农机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顺应农户分化趋势加强分类指导有机结合起来。为此，我们建议：

（一）加强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支持，健全农户分化的促进机制

从国内外经验看，推进农业机械化，有利于减轻农业劳动强度、提高农业作业效率，并弥补劳动力不足。因此，在当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转移、农业用工成本迅速提高的背景下，农业机械化具有日益广阔的需求空间。从前文分析可见，在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的农场类户中，拥有农机的农户占比、接受或使用过农机服务的农户占比、对农机作业效率和较大型农机的重视程度、对农机服务的需求强度均明显高于两类兼业农户。可见，加强对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引导和政策支持，有利于培育农机服务需求，也有利于促进农机需求由小型化向大型化的转变，提高农机作业效率，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和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式的转变。

在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中，拥有农业机械的农户占比明显低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接受或使用过机耕、机收、机播服务的农户占比以及对各农机服务的需求强度均明显高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农场类户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对市场化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的需求，都明显强于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可见，健全农户分化的积极促进机制，引导农户通过土地流转转化为农场类户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都有利于培育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需求，促进市场化农机服务组织发展。

（二）加强对农业机械化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推进农机服务信息网络建设

当前在机耕、机收机割等重点领域，接受或使用农机服务的农户占比仍不足 70%。这说明推进农业机械化重点领域的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在机播、机插、机械施肥撒药等领域，接受或使用过农机服务的农户占比明显低于机耕、机收机割等重点领域，属于农业机械化的薄弱环节。可见，推进主要农业全程机械化仍然任重道远。在本项调查重点涉及的水稻和小麦两大作物中，小麦覆盖全程的机械化水平较高，推进水稻种植覆盖全程的机械化任务更为艰巨。

根据前文分析，当前对农机服务不了解或未接触的农户占比，在机耕、机收机割等重点领域仍达 1/4 上下，在机播、机插、机械排灌、机械施肥撒药等领域甚至高达 1/2 乃至 2/3 上下。这对于农机服务的推广和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可见，加强农机服务信息网络建设，畅通农机服务供求衔接的渠道，仍是农业机械化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有利于农户方便快捷地获得农机服务，也有利于农机服务组织更好地拓展市场空间。

（三）着力推进农机服务标准化建设，鼓励提高农机服务质量

当前，就总体而言，农户对农机服务的满意度亟待提高。在机播、机插、机械排灌、机械施肥撒药服务等领域，表示满意或很满意的农户占比合计约为 30%，有的甚至不足 20%。这一方面与相当多的农户对农机服务不了解或未接触有关，需要通过加强农机服务信息网络建设和鼓励增加农机服务供给来解决；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提高农机服务质量、增强农机服务供给保障，是当前农机服务业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从前文分析农户购买农机服务时最看重的因素也可以看出这点。可见，要加强农机服务标准化建设，通过健全农机服务质量标准体系、加强农机服务质量检测评估体系建设，引导和督促农机服务企业、农机服务大户等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组织提高农机服务质量。考虑到农场类户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都把服务质量作为购买农机服务时最为看重的因素，今后随着农户分化程度的提高，加强农机服务标准化建设更应引起重视。鉴于以农为主、以

农为辅两类兼业农户对各类农机服务的满意度在总体上明显低于农场类户，而为两类兼业农户提供农机服务的组织往往规模化、组织化程度较低，引导农机专业户等小规模、组织化程度低的农机服务组织提高农机服务的标准化水平更为重要。

（四）实施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引导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业发展

从前文分析可见，无论是以农为主、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还是作为新兴农业经营主体代表的农场类户，都把农机服务的购买价格作为购买农机服务时最为看重的因素之一，尤其是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还将购买价格作为最看重的因素。但在对当前农机服务现实问题的评价中，仍有近 1/4 的农户特别是兼业农户认为农机服务成本或价格太高。因此，为鼓励农户推进农机服务外包、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应实施农机服务补贴政策，鼓励农户购买农机服务，借此引导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需求，促进农机服务产业化；并将农机服务补贴政策主要瞄准两类兼业农户。鉴于当前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对市场化农机服务组织提供服务的需求低于农场类户和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尤应注意通过实施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引导以农为主的兼业农户扩大农机服务外包。

当前仍有占问卷总频次 16.1% 的农场类户，将农机服务全程配套性差列为当前农机服务面临的现实问题，明显高于以农为主特别是以农为辅的兼业农户。通过农机服务补贴政策对农场类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支持，应将重点放在提高农机服务的全程配套性上。

大型农机的有效服务半径大、服务供给能力强，更宜采取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机服务供给模式。应优先支持以大型机械为代表的农业机械化发展，借此促进农业机械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农机作业效率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况且，通过市场化、社会化服务的模式形成农机服务供给，便于推进农业生产的全程机械化，并且能够连贯作业的大型农业机械化技术体系“带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降低农机使用成本，减少农机闲置和使用中的浪费。

参考文献：

1. 纪月清等：《我国农户农机需求及其结构研究——基于省级层面数据的探讨》，《农业技术经济》2013 年第 7 期。
2. 刘玉梅、田志宏：《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机装备需求的影响分析——以河北省和山东省为例》，《中国农村经济》2009 年第 12 期。
3. 杨敏丽、白人朴：《农业机械总动力与影响因素关系分析》，《农机化研究》2004 年第 6 期。
4. 杨印生、刘佩军、李宁：《我国东北地区农业机械化发展的影响因素辨识及系统分析》，《农业技术经济》2006 年第 5 期。

（下转第 124 页）

不断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向前发展

——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综述

任海平

摘要：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于2015年9月在北京举行。双方代表共同建议，争取早日完成BIT谈判，适时启动中美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的合作研究，条件成熟时启动谈判；美国推动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推动美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争取在2030年前后建成全球最大的自贸区，进一步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关键词：中美关系 新型大国 工商领袖对话

作者简介：任海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于2015年9月17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方代表。中美两国工商领袖、政府前高官及知名学者各1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

一、对话基本情况

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和美国全国商会联合举办，旨

在为两国工商界搭建一个公开的思想交流平台。由于其民间而非官方的属性，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被称为中美“二轨对话”。自 2011 年起已在北京和华盛顿轮流举办过六轮。双方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贸易、投资、汇率等经济热点问题，中美商业伙伴关系前景、中美贸易和投资政策、双边基础设施投资和中美自贸区建设，中美双边投资协定，中美经济形势及经贸关系、改革创新与双向投资、中美在实现 APEC（亚太经济合作贸易）内自由贸易和投资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本轮对话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前举行，中美双方代表围绕中美经济形势，中美投资协定前景，营商环境改善，创新及革命性技术，G20（二十国集团）与全球经济治理，国际贸易、金融和能源变革等议题进行了坦诚对话。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美方代表时指出，中美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开展互利合作，不仅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放眼未来，中美双方应该合作和能够合作的领域将更加广阔。中美两国拥有许多重要共同利益，也存在一些分歧。只要双方从大处着眼，尊重和照顾彼此核心利益，避免战略误解误判，坚持以建设性方式妥善处理，分歧就可以得到管控，共同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我们致力于同美方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将是中美两国人民之幸，也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之幸。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美建交 36 年来，双方经贸合作的发展不仅使两国企业收获了丰厚利润和回报，也有力推动了两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了互利共赢。未来中美双方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有责任加强对国际经济合作的引领，维护国际金融稳定，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增强世界经济长期增长潜力。我们要积极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的国策。美国工商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希望你们以更加积极态度支持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在对话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致辞。强调要把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这个平台充分利用起来、发挥作用，通过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加强沟通、达成更多共识、不断取得丰硕成果。美国全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在开幕式致辞中也指出，美中关系是全球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相互依存，双边合作关系到全球经济的强劲与稳定，双方应抓住深化两国经贸关系的机遇，共同致力于解决一些重大挑战，其中包括市场准入政策、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等。

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财政部部长楼继伟等到会演讲，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改革开放进行了全面介绍，阐述了中国潜在

发展动力和未来美好图景，受到代表的极大赞赏和热烈反响。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晓强主持了本届对话的开幕式。对话设立了“中美经济形势、中美经贸关系现状及中美经贸合作对双边关系的重要作用”“中美投资协定前景：机遇与障碍”“创新及及革命性技术：合作新领域及有效监管的作用”“中国G20年及其对中美商业合作的机遇”“国际贸易、金融和能源变革及其对双边关系和商业合作的机遇”等议题。

来自美国史尼泽钢铁公司、高通公司、巴里克黄金公司、纽斯凯尔电力公司、托尼克斯制药公司、约翰迪尔公司、礼来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桥水联合基金、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美国全国商会、布鲁金斯学会、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万事达卡国际组织、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杜比实验室的美方代表，来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鳌亚洲论坛、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宝钢集团、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中粮集团、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航集团、徐州工程机械集团、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的中方代表参加了对话。

会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与美国全国商会发表了《第七轮中美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联合声明》。双方呼吁两国领导人采取切实步骤，进一步改善互惠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推进更加开放包容的区域经济合作，营造激励创新、开放合作的政策环境，促进两国在能源、气候变化、医疗、基础设施及金融服务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双方一致认为，为应对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多重挑战，中美两国应从地区和全球利益出发，共同构建中美新型大国中的经贸关系，努力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带动全球治理改革的双动力。双方共同建议，构建中美新型大国中的经贸关系的重要步骤有：争取今年完成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适时启动中美投资与贸易协定（BITT）的合作研究，条件成熟启动谈判；美国推动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推动美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美共同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并争取在2030年前后建成全球最大的自贸区。具体建议包括达成高水平双边投资协定，促进双向投资；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继续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金融改革；在能源、环境、医疗、高科技、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方面促进创新与合作；加强农业合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取得进展。

二、对话中美方代表关切的主要问题

对话中，美方代表就中美经济合作中的广泛领域发表了看法，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许

多重大问题表示关切，特别是对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谈判、相互推动加入 TPP 和 RCEP、气候与环境、双边投资趋势、G20 中国年以及全球资本市场发展发表了诸多意见。期待中美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更稳定地发展，中美 BIT 谈判有灵活性的选择，早日达成双边协议；并希望双方政府对中美双向投资形势发生的新变化给予更多政策关注，建立资本市场和汇率的新协调机制，彼此推动对方加入 TPP 和 RCEP；建议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等领域进行更有效的合作；希望两国在中国 G20 年共同合作，创造更有价值的议题。

美方代表表示，中美经贸合作有助于驱动创新和新增长点的形成，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农业、能效、环保技术等行业。明年中国作为 G20 主席国为创造新的政策成果提供了机遇，使中美两国企业能够在金融、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受益。美中两国应共同努力，大力推进经贸投资合作，采取具体行动，推动双边关系健康发展。

（一）美国各界热烈期盼习近平主席访美，特别期待与习近平主席的对话活动

美国各界十分关心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的首次正式国事访问，期待通过这次访问进一步推动中美关系深入健康发展。美方代表指出，习近平主席访美首站选在美国大公司总部聚集的西雅图，并将会见美国工商界人士，美国企业家们已做好了准备，非常珍惜这次与习主席进行深度对话的机会。美方代表认为，在目前形势下，中国的资金对于急切想吸引外国投资的美国十分重要。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薄迈伦认为，习主席这次访问恰逢其时，中美关系现在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工商企业界关注的各方面问题，这对于中美双边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

美国全国商会会长多诺霍、史尼泽钢铁公司总裁伦德格伦、前商务部长古铁雷斯、布鲁金斯学会主席桑顿等代表美方先后发言。他们表示，美国各界热烈欢迎并期待着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美中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和有影响的大国，在当前形势下面临许多共同机遇和挑战，更加相互依存。我们需要向世界表明，美中两国可以“和而不同”，正携手建立更强有力的合作关系。美工商界是支持美中关系发展的坚定力量，积极致力于加强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合作，主张早日达成双边投资协定。美工商界支持中方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期待中美关系在新的形势下更好更稳定地发展，并赋予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的内涵

美方代表非常关注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稳定发展，这对于两国工商界的合作，对两国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并表示要努力利用工商界的交流对话推进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

使中美关系比以往更强劲。美国全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指出，中美工商领袖和高官对话这种形式非常重要，特别是这次得到了习近平主席的接见，这对于对话今后的开展与发挥作用至关重要。美国工商界致力于开展好这种对话，并将其视为推动中美两国工商界关系的重要引领平台，因为中美两国共享一个重要和相互依赖的关系。中美两国经济紧密联系，如何合作将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方希望与中方探讨一系列深化商务关系的问题，包括从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中实现互利共赢、双边投资协定问题、市场开放政策问题、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等问题。美国商会要发挥工商界的领导作用，使工商界的关系成为中美关系的推动力而不是挑战。现在中美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不同应得到承认和处理，但这些分歧不应当影响和破坏两国之间巨大的合作潜力。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美国原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中美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和美国都有非常光明的未来，两国应当进一步加强彼此融合，而不是走向反面。

（三）希望中美 BIT 谈判有灵活性的选择，务实推动早日达成双边协议

目前，中美 BIT 谈判已经进行了 21 轮，双方都遇到较大困难，难以达成最终协议。美方对中美 BIT 谈判有往后退的倾向，其关注的问题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国的负面清单。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查琳·巴尔舍夫斯基认为，目前中国提出的负面清单太长，负面清单对美国在华投资限制太多；二是 BIT 时间表和路线图问题。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农业及欧亚非地区总裁马克·冯·潘驰认为，目前中国的 BIT 时间表和路线图还不是很清楚，未来谈判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三是希望尽快达成阶段性协议。美国全国商会副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和凯威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查琳·巴尔舍夫斯基认为，经过 21 轮的谈判，双方要达成最终的协议仍然面临困难，从实际出发，可以把已经确定的、比较容易操作的条款达成一个临时性协议，让中美企业尽早享受到实际的好处。

（四）高度关注 TPP 和 RCEP 的发展，希望彼此推动对方加入 TPP 和 RCEP

美方代表对美国的 TPP 和 TTIP 的战略意图进行了说明。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亚洲有着世界 60% 的人口，且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经济的很大一部分。而在这个地区，美国仅与澳大利亚、新加坡和韩国签有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在亚洲这个地区的代表性还不够，代表性也没有中国那么高，这就是美国在亚洲推动 TPP 的原因，目的是确保美国公司在这个地区不会受到排斥。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美国原商务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TPP 尽管不是一个完美的协议，但也非常接近完美，既然要谈判协议，就

要起草个协议，就要不断地谈判，这是贸易协定必经的一个过程。美国国会虽有一些不同意见，但美国有意愿达成 TPP。美国商会认为，如果能够早日完成 TPP 谈判，美国就可以大大推进和其他国家的合作。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荣大聂指出，美方欢迎中方根据高水平的标准来参与 TPP。如果美国能够和中方缔结类似 TPP 这样的协定，那么与其他的自贸区协定将会进入一个融合的进程。对于 RCEP，美国的关切是自身在亚洲不能受到排挤。总的来看，美方代表认可在贸易投资规则方面进行融合，如 TPP 和 RCEP 之间的融合，并欢迎中方按照高标准的贸易规则参与 TPP。

（五）关注全球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和能源问题，建议在这些领域进行更为有效的合作

美方代表的主要看法如下：一是全球传统能源价格在持续下降。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荣大聂认为，美国页岩气革命加速推进，全球能源需求萎缩，加上美国核能等技术日益成熟，使得现在石油价格降到每桶 40 元，这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二是化石能源是当前大气污染的主要来源。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美国原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研究数据表明今年化石燃料所产生的气体占了 80%，这个数据在 2035 年将会维持在 78%，所以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三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大国。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预测到 2030 年，中国汽车销售量将会达到 4 亿辆，低油价会产生巨大的石油需求，将加剧环境污染压力。四是中美双方应加强石油开采方面的合作。从 2005 年开始，美国开始利用垂直钻井钻探技术开采一些非常规能源，取得了较好成就。中方企业与美国企业开始推动页岩气开采方面的合作，比如中海油和优尼科试图进行并购。但美国出于政治原因，并没有批准该并购。此外，还有新型电池、风能和太阳能等领域，双方合作潜力和空间巨大。美国全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兼国际事务总裁薄迈伦提出，中美应将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领域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尤其是工商界提出的页岩气技术和设备的重点合作。五是开拓应对气候变化新合作领域。薄迈伦提出，基于中美两国在去年就应对气候变化达成广泛的共识，今年年底巴黎气候峰会将要制定一系列的措施，在这种环境下，中美之间应对气候变化应该成为创新合作的非常重要的领域。

（六）中美双向投资形势发生新的变化，需要双方政府给予更多政策关注

2014 年，中国对外投资首次超过境外来华投资，这一趋势在中美双向投资中同样有显著表现，并引起了美方的关注。目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存量达到 700 多亿美元，美国对华投资总量在 620 亿美元左右，数额都非常大。但中国对美投资总量只占全球各国在美

投资总量的 3%，而美国对华投资也仅占有所有国家对华投资总量的 4%。因此，美方代表建议，要在双边投资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渴望来自中国的更多投资。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查琳·巴尔舍夫斯基认为，美方关切的是中美大局朝什么样的方向进行调整，怎么样能够使得双方的投资制度更加相适应，进而不断提高投资水平。一是需要增加双向投资，二是希望 BIT 的谈判能够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推动中国内部各种改革。而目前中国国家安全涵盖太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太多方面，但对实际的公司投资而言，许多根本涉及不到具体的国家安全，因此，这样宽泛的安全审查会影响美国在中国的投资。薄迈伦认为，美方最大的关切是商业利益，就是如何通过谈判，让美国企业更好地在中国开展商业活动。美国约翰迪尔公司农业及欧亚非地区总裁马克·冯·潘驰认为，核心问题就是待遇问题，中国政府不应给国企或者私营企业某种特殊待遇。而一个外国公司如果在中国经营了几十年，在中国建立了研发中心，有了制造基地，做出了贡献，那算是中国公司，还是外国公司？应该是要享受同样待遇。美方代表还表示，美国各种商会组织乐于帮助中国企业解决赴美投资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特别是美国各州关于投资的法律法规不一样，美方会积极协助中国企业解决问题。

（七）高度关注中国 G20 年，希望两国合作创造更有价值的议题

美方代表高度关注中国 G20 年，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意见。桥水联合基金总裁、美国财政部原副部长大卫·麦考密克认为，作为应对危机的机制，G20 目前需转型为协调机制，重点协调全球经济宏观政策。面向未来，中美应在 G20 中发挥重要的领导作用。双方必须要注意其他各方的利益，但是一定要在塑造 G20 方面发挥领导作用，要确保 G20 会议不只是开会，而是要能够有一个议程。确保议程上的议题能够在后续的会议中得到推进；借助 G20 政策合作平台，各国政府以及工商界必须要有能力不断推动改革议程，推动寻求更多机遇；G20 需要有一些长期目标，要能够横跨多届 G20 会议。美国商会会长托马斯·多诺霍认为，G20 并不是一个全球政府，只是一个政府之间相互交流、共同应对经济状况的一个组织和平台。关于 G20 的议题，包括一些共识和一些分歧的领域，应当好好地梳理一下议题，并且应对那些最能够获得接受的议题进行重点探讨。G20 一定要把重点放在经济领域。不仅有一个 G20 集团，也要有一个商业集团，叫做 B20。

（八）高度关注资本市场和汇率，希望建立一种新的协调机制

对于全球资本市场汇率，美方代表表现了自信和关注。美国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董事长、美国原商务部部长卡洛斯·古铁雷斯非常赞同曾培炎理事长提出的关于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和抑制全球大宗商品价格跌宕起伏的看法，并指出近日美联储主席宣布美

联储暂不加息，显示了它在全球的领导作用。做出不加息的决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了解到如果加息，将会在全球造成动荡。但是在未来某个时候，美联储确实是会加息的，可能就在 G20 集团开会的时候。那时候的情况可能会更加动荡、或者更不稳定。所以，卡洛斯·古铁雷斯认为，在 G20 框架下应建立一种协调机制。美国正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欧洲正在启动量化宽松政策，日本正在实施历史上最大的量化宽松政策，但这种行为好像都没有取得成功。世界各国并不是在同一个步调上，在全球宏观经济方面，应该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应该进行一些重大协调。美国史尼泽钢铁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塔玛拉·伦德格伦认为，美方希望中国能够有效地应对产能过剩问题，加强中美双方合作，包括通过亚投行进行相关合作；她也建议加强汇率等方面的合作，认为世界有些地区如拉美，由于汇率动荡，降低了竞争力。

三、对话中中方代表关切的主要问题

对话中，中方代表关注中美关系、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中国 G20 年、中美在自由贸易区建设领域中的博弈折冲、中美 BIT 谈判、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等问题，认为双方合作利益基础深厚，应在 TPP、TTIP 和 RCEP 建设中把对方考虑进去，切实推动 BIT 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加强具体领域合作，联手稳定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加强全球宏观经济协调，谋局全球互利共赢合作，推进两国和全球经济发展，造福各方。

中方代表指出，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十分清晰透明。对内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将贯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过程。对外发挥负责任国家的作用，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实行互利共赢方针，承担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国际义务。双方应加深彼此客观认识，消除猜疑和误解，坚定发展中美友好关系的信心。尤其要有相向而行的意愿，这关乎两国切身利益和世界稳定发展。双方应直面磕碰和分歧，超越“零和博弈”思维，真诚沟通，携手努力，不断释放正能量。中美可在宏观经济政策的沟通协调、尽快达成中美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切实改善双方投资环境、开拓产业合作新亮点、加强全球治理合作等五个方面推进务实合作。希望与会美方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为两国更好管控分歧、消除误解、增进共识做出贡献。

（一）中方代表关注中美关系，指出双方利益基础深厚，发展前景广阔，应立足现实加强合作，造福各方

中美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关键国际关系之一，受到中方与会代表的高度关注。中国

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认为，最近这段时间，中美关系发展有些起伏，双方猜疑和指责有所上升；美国方面有关中美关系的负面声音有放大势头。但是，中美在任何时候都必须相向而行，这关乎到两国切身利益和世界稳定发展。两国缺少合作意愿，必然事倍功半；有了合作意愿，再难办的事也可以做好。当前，中美两国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关系紧密，相处出现些磕磕碰碰，出现些分歧，是很正常的。两国应直面现实，认真管控和解决这些问题，要超越零和博弈思维，遇到问题多朝合作方向努力，就会不断收获成果。中财保集团吴焰董事长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对美国合作意愿不是降低了，而是增强了，期待加强与美国各领域的合作。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魏建国副理事长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忽视了后全球化时代最大的矛盾——贫富差距加大；忽视了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对促进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了减少财政赤字、减少外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发展绿色能源、加大教育投入、改变移民政策和科技出口政策等五大政策对解决自己国内问题的重要性，而把注意力放在了大国争霸上。在以共同维系国际体系稳定为主题的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应立足现实，减少不切实际的干预，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金融领域互利共赢合作，共同拉动全球经济发展。

（二）中方代表高度关注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认为中美双方应合作稳定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维护国际金融市场稳定，并将其纳入明年 G20 议题加以讨论

全球市场环境是各国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与会中方代表高度关注全球大宗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政策协调问题。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曾培炎理事长指出，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既对生产国也对消费国不利，危害了世界所有国家的利益，应平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及维护金融市场稳定，并将这些议题纳入 G20 议程，推动在 G20 框架下研究建立稳定大宗商品市场的机制。曾培炎理事长还指出，过去全球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大约是全球 GDP 增长速度的两倍，而现在全球贸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越来越小。不是全球化倒退了，而是不必要的障碍出现了。G20 应探讨这个问题；发达国家经济已开始复苏，而且明年美国货币政策迟早要加息。一旦加息，大部分资金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恐将面临更大困难。G20 应研讨全球宏观经济发生的新变化，形成基本共识，推进世界经济协调发展。

（三）中方代表关注中国 G20 年，认为中美双方应放眼世界，把脉世界经济发展，顺应全球经济复苏和发展需要，谋局全球互利共赢合作

G20 既是引领全球议题的舞台，也是协调各国经济政策、争取国家战略利益的平台，中方与会代表对明年即将在中国召开的 G20 给予了高度关注。博鳌亚洲论坛周文重秘书

长认为，去年 G20 的主题是“促进私营企业增长，增加全球经济抗冲击性和巩固全球体系”。去年 APEC 会议期间，中方提出建设亚太自贸区的设想。这个设想实际上对所有国家都有好处，但缺少具体实现路径。所以，建议把亚太自贸区建设的路径设定为明年 G20 的主题，共同研讨一下亚太地区建设路径问题。习主席在前年和去年的 G20 会上两次提到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建议把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构建互利共赢的全球价值链，培育全球大市场，作为明年 G20 的一个议题。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张燕生秘书长认为，G20 现已成为讨论全球治理问题的重要平台，面临着从当年的危机应对阶段向战略协调以及提出全球经济指引新阶段转移的局面。当前，中美应加强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为下一步全球经济增长寻求新动力。国家开发银行袁力副行长提出，在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方面，中美应达成一些建设性共识，共同推动建立 G20 框架下的能源多边合作和治理机制。中粮于旭波总裁认为，应建立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稳定机制，并纳入到 G20 的经贸合作机制。与此同时，中国应尽快推出原油期货交易，推进中美期货行业合作。

（四）中方代表高度关注中美在自由贸易区建设领域中的博弈，认为中美应相互在 TPP、TTIP 和 RCEP 建设中把对方考虑进去，推动中美在亚太自由贸易区建设中的良性互动

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中既可以合作，也可以竞争，与会中方代表高度关注中美双方在自由贸易区建设领域中的博弈。博鳌亚洲论坛周文重秘书长认为，美国在 TPP 和 TTIP 建设中都把中国排除在外了。现在，美方 TPP 建设遇到一些困难，与日本的谈判难以推进。在亚洲，中方积极支持 RCEP 建设。TPP 和 RCEP 同是建设中的自由贸易区，中美应通过互动建立彼此协调兼容的机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魏建国副理事长认为，无论是 TPP 还是 TTIP，美方都没有把中国考虑进去。下一步美国应在制定全球游戏规则时，把中国考虑进去。

（五）中方代表高度关注中美 BIT 谈判，认为中美双方要立足现实，切实推动谈判取得实质性进展，为企业界赴美投资创造有利条件，推进两国和全球经济发展

与会中方代表纷纷提出推进 BIT 谈判的建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张晓强常务副理事长认为，中美 BIT 协定对于两国企业和两国经济都非常重要，中方对此有三大关切：国家安全领域的互信；对国企的待遇；美国州际不符措施整体例外。如果美国太多州有过多不符措施，不列清楚，将来执行起来就会遇到很多困难。美方应想办法让中国企业明白投资方向。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马秀红理事长认为，BIT 的最终谈成，对双方的经贸合作、双方的发展甚至世界经济都会发挥重要作用，期待 BIT 谈判有更大进展。海航集

团董事局陈峰主席提出，中美两国都在变，想通过 BIT 把所有事情搞定是不可能的，应根据未来变化趋势，有所选择，推进两国的投资和贸易，夯实两国关系的压舱石。BIT 谈判中遇到的所谓国家安全审查问题可先搁置一下，留待将来再谈，先把现实的东西固定下来。宝钢集团有限公司徐乐江董事长认为，BIT 谈判一定要找准方向，把精力和时间多花在对人类社会和两国未来影响大的问题上。中财保吴焰董事长提出，中美经济合作需要解决企业进入美国市场过程中存在的程序不确定性问题，需要解决双方监管协调一致问题。中投总经理李克平认为，在美国的投资会遇到很多诸如国家安全审查等想不到的障碍，不仅规则不透明，而且审查门槛过高，审查时间过长，歧视中国国有企业，给双方投资合作带来不利影响。美国应修订相关法规政策，给外国投资者更多参与机会。

（六）中方代表高度关注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认为应努力把双方在具体合作领域的可能性变成造福双方的现实性，推动中美双方互利共赢发展

中方代表立足行业发展和中美经济互补性提出许多加强和深化中美经济合作的设想。中财保吴焰董事长提出，中财保愿意在医疗健康、“责任险”、“巨灾”以及投资四个领域深化中美双方经济合作。中财保期待跟美方相应机构合作，不仅在双边基础设施市场投资，也可联手对第三方市场投资。中粮集团于旭波总裁认为，作为 G20 的两个领头国家，中美在农产品贸易方面应加强交流，强化对接。具体政府政策层面的合作有三条：一是中国农业还处在从价格支持政策向农民收入支持政策转变期，中美两国从政策研究部门到政策制定部门都需要密切交流和对接；二是在贸易环节，中美两国应加强进口标准合作，推进政府层面的对接，促进贸易便利化；三是两国政府应在贸易便利化框架下提高通关效率，促进两国品牌食品贸易，在贸易投资框架下，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在美投资透明度。中远马泽华董事长认为，在 G20 全球治理框架下，中美两国应更注重解决好两国间的问题。中美虽有很多差异和分歧，但有更多共同利益和共同点，应把分歧充分管控好。

总之，与会中方代表一方面从战略角度关注中美在 G20 平台和亚太国际合作平台上的合作博弈，另一方面又务实关注中美 BIT 谈判、具体领域中的合作与折冲，利用一切机会促进中美互利双赢合作。

四、对策建议

（一）党中央、国务院对新型智库建设和“二轨对话”高度重视和肯定，国经中心应抓住机遇，加快建设步伐

党中央、国务院近年来十分重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建设，专门下发了《关于加强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在前六轮“二轨对话”中，温家宝、李克强等中央领导都先后接见了与会代表，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对话前，习近平主席亲自接见与会美方代表，对中美“二轨对话”这种民间交流形式给与了充分肯定。国经中心作为我国新型智库的先行者和探索者，应抓住机遇，化压力为动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努力成为中国新型智库的典范。

（二）进一步重视“二轨对话”在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的特殊作用

在加快构建与丰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进程中，中美两国都迫切需要双方工商界和智库的前瞻性研究，需要工商界和智库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这次对话上，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促进中美关系健康发展上，充分发挥工商界的对话交流，发挥智库的独特作用，提供创新思路，促进政策制定，极为重要。美方代表对“二轨对话”促进中美交流表示了高度赞赏，表示期待与中国工商界和智库通力协作。今后，“二轨对话”要在促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要更加注重议题设计，注重与国家战略的配合和协调，不断提出更好的中国方案，发出中国声音。

（三）进一步发挥“二轨对话”在促进我周边外交和全球战略合作中的特殊作用

“二轨对话”作为政府之外的重要对话轨道，可为促进国家间战略与政策沟通，扩大发展共识，发挥独特的影响力。其作为非政府的民间平台，许多问题可以更加敞开、更加活跃、更加超前，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历史上，通过民间对话推动政府合作的例子很多。近年来，中国与各国之间各种形式的民间对话和交流不断增多，对消除认识分歧、探索有效合作途径起到了积极作用，今后应该发挥其更大、更及时的作用。下一步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可继续举办与日本、金砖国家、欧洲等国家和地区的“二轨对话”，在更多渠道发挥这种民间交流的有效作用。

（四）进一步拓展“二轨对话”在提升我国家影响力与话语权中的特殊作用

“二轨对话”旨在打造新型的中美工商界思想交流平台。前六轮对话和本届对话均汇集了中美顶尖企业家和智库参会，逐步发展成为中美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对话创办以来，历届活动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提出了针对性强、富有远见的讨论主题。每次对话，来自中美两国各主要企业和智库的代表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就共同努力促进中美关系发展达成许多共识。历次对话都形成了联合声明，使对话的成

果落地生根。目前，中美工商界和智库界越来越重视这个对话平台，参加对话的工商领袖和前政要及专家学者越来越踊跃，“二轨对话”创造的中美民间交流交往的新平台，在凝聚双方共识、促进中美关系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独特作用。下一步要把对话办得更实、组织得更加周密、成果更加丰富。应邀请更多重量级嘉宾，适当延长时间，给双方代表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有效发挥对话交流平台的特殊作用。要充分掌握共同声明的主导权，争取更多的话语权。近期应开始全面设计和推进对话品牌建设工作，谋划提升“二轨对话”作用的一揽子方案，为今后持续推出“中日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中欧工商领袖和前高官对话”等系列事关中外关系发展的重大交流活动打下良好基础，使“二轨对话”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成为一个高质量的中外顶级对话平台，在促进全球对话、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国家影响力与话语权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责任编辑：艾 冰

· 权威观点 ·

国际权威机构观点综述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2015 年 10 月以来，国际机构对世界经济形势和中国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和判断，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对世界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温和状态且不均衡

2015 年 10 月 9 日—11 日，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与会的多国财经官员和专业人士纷纷表示，受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美联储加息预期等影响，全球经济增长面临的不确定性正在增加，地区间分化可能加剧。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指出，全球经济增长仍处于温和状态且不均衡，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新兴经济体内部增长前景有别。

目前，美英等国经济稳定复苏，但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并不乐观，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大宗商品出口国经济下行是影响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和美联储即将开启的货币政策正常化等，且这些风险看起来比几个月前更加明显。除了宏观经济增长弱于预期，全球金融局势也面临挑战，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仍需防范金融风险。IMF 货币与资本市场部主任何塞·比尼亚尔指出，目前金融风险正在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私营部门过高的杠杆率和对全球金融市场更高的敏感度，使企业更易受经济下行的影响，新兴经济体存在资本外流和资产恶化的风险。同时，发达经济体的风险也并未完全消失。

（二）世界经济仍很脆弱

2015 年 10 月 15 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秘书长何塞·安赫尔·古里亚在 OECD 第五届世界论坛上表示，世界经济表现仍很脆弱，近年来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

机的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扩张明显减速，不少发达国家经济停滞，增长水平低。上述情况发生在失业率尤其是青年人失业率高企的大背景下，给财政救助那些亟需帮助人群留下的操作空间很小。为从 2008 年—2009 年国际金融危机低谷走出来，各国政府已投入大量资源，但仍需做出很多努力来抚平危机造成的社会创伤，仅仅使经济恢复远远不够。

（三）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2015 年 10 月 19 日，IMF 召开 2015 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发布会指出，全球经济走出战后范围最广、程度最深的衰退六年后，回归强劲、同步的全球扩张仍难实现，甚至面临较几个月前更为明显的下行风险。新预测几乎将所有国家短期内的增长率都做了下调。去年全球经济实际增长率为 3.4%，而 IMF 经修正后的今年全球增长率仅有 3.1%，比 7 月预测低 0.2 个百分点，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可望回升到 3.6%。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比之前更为显著。可能导致全球复苏停滞的重要因素包括：过低的原油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意料外的中国经济增长骤降、金融市场动荡加剧、美元持续升值以及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恶化等。

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前景依然不均衡。预计今年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将略有加快，发达经济体面临的中期风险主要是已经很低的增长水平进一步下降到接近停滞。特别是，如果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前景减弱，全球需求进一步下降。在这种情况下，通胀持续低于目标水平的现象可能变得更加根深蒂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将连续第五年放缓，且近期下行风险已经上升。导致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因素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过去信贷快速增长的影响以及政治动荡等。由于 2015 年经济衰退国家衰退程度减轻或部分实现正常化，以及发达经济体经济活动加快回升带来的溢出效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2016 年经济增速将回升。

（四）全球可能迎来新一轮经济衰退

2015 年 10 月 20 日，IMF 发布了《崩溃与复兴：理解全球衰退与复苏》报告，称全球经济还未从上次衰退中彻底恢复，鉴于复苏持续疲软，又一场全球衰退的可能性挥之不去。面对如此严重的衰退，全球决策者未能拿出得力对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缺少协作，央行背负了过多振兴经济的重担，财政紧缩削弱了货币宽松政策的效力。

IMF 此前多次敦促多国维持宽松政策。今年 6 月中国 A 股暴跌以前，IMF 下调了美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并呼吁美联储推迟到明年加息；9 月又呼吁美欧日等发达国家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认为中国经济放缓等全球经济风险增多，国际油价下跌又未能如预期提振经济，发达经济体普遍低通胀；10 月初，再次下调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预

计今年将是 2010 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

（五）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仍然存在

花旗银行 2015 年 10 月 21 日发布报告，维持 2015 年全球经济增长 2.6% 的预期不变，并指出下行风险仍然存在，将 2016 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从 2.9% 下调至 2.8%，这是该行连续第五个月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

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第二季度增长 1.8%，相比之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为 2%。这是自 2001 年以来，不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增速首次落后于发达国家。在过去 15 年内，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平均比发达经济体高出 2.6 个百分点。尽管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花旗仍表示，到目前为止，美国和欧洲投资者担忧的新兴经济体疲软问题更像是中期减速，而非严重的经济下滑。预计欧洲、日本、中国和澳大利亚央行将进一步实施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和英国央行将“非常缓慢且推迟”收紧货币政策。

（六）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面临七大风险

摩根士丹利近日发布报告显示，尽管全球经济将持续复苏、温和增长，但全球经济仍然存在下行风险。近期全球经济增长可能面临七大风险。

一是美元升值。美联储按兵不动，消费者开支下降，美元持续升值。尽管通胀低于目标，但美联储并不放松货币政策，会造成股票等风险资产波动，并导致经济增长乏力，继而影响消费者情绪及消费开支。二是欧洲面临政治不确定性。欧元走高影响投资，持续的经济疲弱会拖累资本开支和生产活动。如果经济不增长，加之欧元强势，欧元区经济可能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出现衰退，会导致欧洲央行将货币宽松政策延展至 2017 年。三是日本遭受全球需求疲软的冲击。消费开支复苏缓慢将影响资本支出，还会导致日本出口下降和金融市场调整。四是中国以宽松货币政策来提振经济的努力被证明效果不佳。中国可能面临资本加速外流的挑战，将迫使中国央行在“潜在的通胀放缓压力持续存在”时仍收紧货币政策。五是印度停止关键的改革。地方选举失利会迫使印度总理莫迪放弃财政整顿计划，引发政府开支增加，将打击投资者对印度的信心，导致该国投资增速放缓和货币贬值。六是巴西重拾旧政策。巴西政府可能采取减税、降息的手段来刺激经济，会导致该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届时，巴西雷亚尔将进一步贬值，导致通胀加剧。七是油价持续下跌、国际影响力下滑可能重创俄罗斯。如果油价进一步下挫，俄罗斯卢布将面临更多贬值压力，会迫使俄罗斯央行加息，还有可能导致该国实施资本管制。如果西方国家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就会触发俄罗斯资本外流。

二、对中国经济形势的主要观点

（一）中国经济正向新模式转变

2015年10月8日，IMF总裁拉加德在秘鲁首都利马出席秋季年会时说，中国经济增速下降在预期之内，将有利于其经济长期增长。中国在转向以消费为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过程中能保持现有增速，其表现已足够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波动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一个经济体能够在经济增长完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完成，因此我们要适应这种波动。

IMF对中国在经济转型中加强市场在汇率决定中的作用表示欢迎，并在近期一份政策建议中指出，中国经济放缓幅度在预期之内，正向更安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进一步推进财政、社保和国有企业改革，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世界将受益于中国的这种转变。

（二）国际组织赞赏中国力推经济结构改革

在IMF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上，中国话题备受关注。IMF在日前发布的公报中指出，中国目前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以实现更可持续的增长，这是可喜的。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IMF整体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但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仍保持在6.8%。其总裁拉加德表示，目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增速放缓是可预期的。中国经济正在从目前的投资和出口主导型转向服务业和内需主导型，这有利于中国经济发展。其亚太部主任李昌镛撰文称，虽然经济下行风险有所增加，但中国有能力实现经济转型。尽管中国制造业和建筑业活动放缓，但基础设施投资和消费尤其是服务业依然保持稳步增长势头，中国有足够的政策空间来应对经济增速放缓。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表示，此次IMF维持对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不变，正是因为看到了中国经济结构稳健调整的过程，中国还有很大的政策空间推动经济增长。其首席经济师兼高级副总裁巴苏指出，尽管目前新兴市场面临一定的危机，但中国正在力推经济结构改革，经济增速暂时放缓是新兴市场的必然调整过程。经过调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将逐渐恢复强劲增长势头。

（三）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仍最大

“2015北京新兴市场论坛”于2015年10月19日—20日在北京举行。世界银行中国蒙古韩国局局长郝福满在会议上表示，中国经济增速虽然在下滑，但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最大。世界经济正在减速，中国现在的增长大概是7%，这虽然和之前的12%、13%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对于世界经济的贡献依然没有减少，因为中国经济总量已

经远远高于十年前或者是七年前，所以中国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依然是最大的。他认为，中国经济总体增长速度虽然有所降低，但经济在正轨上。因为现在世界经济不景气，不仅是中国经济的问题。虽然这几年世界经济表现依然令人失望，但是中国增长还是实际的增长，根源是因为外部的需求没有这么高。

（四）中国 2015 年经济增速或超预估

路透社网站 2015 年 10 月 29 日报道称，IMF 亚太部主任李昌镛日前表示，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其 7 月—9 月的增长率达到 6.9%，预计全年增速可能接近 7%，超过该组织之前预估的 6.8%。IMF 更加关注的是中国增长放缓对亚洲地区其他经济体的潜在影响，因为中国经济放缓会使得这一地区中期增长前景更加不确定。据其测算，中国经济增长率每下滑一个百分点，亚洲经济增长率就会减少超过 0.3%。

责任编辑：李 蕊

(上接第 106 页)

5. Abebe K. , Dahl D.C. , Olson K.D. , The Demand for Farm Machinery. Vniversity of Minnesota, 1989.

6. Gracia C. , Judez L. Y. , Torres D. Unmodelo para el estblecimiento de un Plan de utilizacion y de adquisicion demaquinaria adrfcola (A model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a utilization and acquisition plan of agricultural machinery) . Anales del Institututo Nacional de InvestigacionesAgrarias, 1982, (6): 97~111.

7. Kulshreshtha, N. S. Ownership of Farm Trucks for Hauling Grain: an Application of Multi-variate Logit Analysis [J] .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75, (5): 302~308.

8. Nikhade, D. M. , Bhople, R. S. Constraints in adoption of farm innovations [J] . Rural India. , 1989, 52 (10): 249~252.

9. Whitson R. E. , Kay R. D. , Lepori W. A. , Rister E. M. , Ma - chinery and crop selection in weather risk [J] . Transac - tions of the ASAE, 1981, 24 (2): 288~295.

责任编辑：艾 冰、方 虹

世界经济主要指标

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信息中心

一、世界经济

表 1 世界经济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10 月)				
世 界	3.4	3.4	3.1	3.5
发达国家	1.4	1.8	2.0	2.2
美 国	2.2	2.4	2.6	2.8
欧元区	-0.5	0.9	1.5	1.6
日 本	1.6	-0.1	0.6	1.0
发展中国家	5.0	4.6	4.0	4.5
印 度	6.9	7.3	7.3	7.5
俄罗斯	1.3	0.6	-3.8	-0.6
巴 西	2.7	0.1	-3.0	-1.0

世界银行(2015 年 6 月)

世 界	2.5	2.6	2.8	3.3
发达国家	1.4	1.8	2.0	2.4
发展中国家	5.1	4.6	4.4	5.2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10 月)

世 界	2.4	2.8	2.5	2.9
美 国	2.2	2.4	2.5	2.6
欧元区	-0.5	0.9	1.5	1.7
日 本	1.6	-0.1	0.6	1.3
印 度	6.9	7.3	7.5	7.8

注: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世界及分类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方法进行汇总,世界银行和英国共识公司按汇率法进行汇总。2. 印度数据指财政年度。2013 年、2014 年度数据为印度官方大幅上修后数据,而 2015 年及 2016 年数据系参照官方修订后数据的预测结果。3. 各经济体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2 世界贸易量增长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世 界	3.5	3.3	3.2	4.1
进口				
发达国家	2.1	3.4	4.0	4.2
发展中国家	5.2	3.6	1.3	4.4
出口				
发达国家	3.1	3.4	3.1	3.4
发展中国家	4.6	2.9	3.9	4.8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5 年 10 月预测。

表 3 消费者价格涨跌率(上年=100)

单位:%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预测值	2016 年 预测值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 年 10 月)				
发达国家	1.4	1.4	0.3	1.2
发展中国家	5.9	5.1	5.6	5.1
英国共识公司(2015 年 11 月)				
世 界	2.8	2.6	1.9	3.5
美 国	1.5	1.6	0.1	1.7
欧元区	1.4	0.4	0.1	1.1
日 本	0.4	2.7	0.8	0.8
印 度	9.5	6.0	5.0	5.3

注:1. 印度来源于英国共识公司的数据指财政年度。2. 各经济体 2013 年、2014 年数据已据其官方发布结果作了调整。

表 4 消费者价格同比上涨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世 界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2014 年		3.6	1.7	7.8
	10 月	3.7	3.1	5.0
	11 月	3.5	2.9	4.8
	12 月	3.5	2.8	5.0
2015 年				
	1 月	3.1	2.4	4.7
	2 月	3.3	2.4	5.1
	3 月	3.3	2.4	5.2
	4 月	3.1	2.0	5.4
	5 月	3.1	2.0	5.4
	6 月	3.1	1.9	5.5
	7 月	2.9	1.8	5.2
	8 月	2.8	1.6	5.2
	9 月	2.6	1.3	5.2
	10 月	2.5	1.3	5.2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

表 5 工业生产

年份	月份	工业生产指数 同比增长率(%)			JP 摩根全球制造业 采购经理人指数		
		世界	发达 国家	发展中 国家	全球 PMI	产出 指数	新订单 指数
2014 年		3.2	2.7	5.2			
	10 月	3.2	1.6	5.2	52.2	53.0	52.8
	11 月	3.2	1.4	5.1	51.8	52.3	52.3
	12 月	3.2	1.9	5.4	51.5	52.0	52.0
2015 年							
	1 月	2.5	1.7	4.0	51.7	52.9	52.2
	2 月	2.5	1.4	4.1	51.9	53.2	52.2
	3 月	2.5	1.4	4.1	51.7	53.3	52.1
	4 月	2.5	1.1	3.9	51.0	51.7	51.0
	5 月	2.5	0.8	3.7	51.3	51.9	51.4
	6 月	3.2	1.3	4.5	51.0	51.4	51.3
	7 月	2.5	1.0	3.9	51.1	51.7	51.3
	8 月	2.5	1.2	4.0	50.7	51.0	51.4
	9 月	1.9	0.7	3.2	50.7	51.0	51.4
	10 月				51.4	51.9	52.1

注:1.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率为经季节调整的数据。2. 采购经理人指数超过 50 预示着经济扩张期。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美国供应管理协会。

二、美国经济

表 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1.5	1.7	-2.9
	1 季度	1.9	2.5	-4.5
	2 季度	1.1	1.4	-2.0
	3 季度	3.0	1.7	-2.2
	4 季度	3.8	3.5	-2.7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0.9	1.3	0.0
	2 季度	4.6	3.8	1.2
	3 季度	4.3	3.5	1.8
	4 季度	2.1	4.3	-1.4
2015 年				
	1 季度	0.6	1.8	-0.1
	2 季度	3.9	3.6	2.6
	3 季度	1.5	3.2	1.7

表 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4.2	2.8	1.1
	1 季度	4.9	1.0	0.8
	2 季度	2.6	4.9	5.5
	3 季度	3.8	4.2	2.4
	4 季度	5.1	10.9	1.0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6.0	-6.7	2.8
	2 季度	5.6	9.8	9.6
	3 季度	7.9	1.8	-0.8
	4 季度	2.5	5.4	10.3
2015 年				
	1 季度	3.3	-6.0	7.1
	2 季度	5.2	5.1	3.0
	3 季度	2.9	1.9	1.8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折年率计算(表 6、表 7)。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6、表 7)。

表 8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	政府支出
2013 年		1.5	1.7	-2.9
	1 季度	1.1	1.3	-2.9
	2 季度	0.9	1.5	-2.9
	3 季度	1.5	1.7	-3.2
	4 季度	2.5	2.3	-2.9
2014 年		2.4	2.7	-0.6
	1 季度	1.7	2.0	-1.8
	2 季度	2.6	2.6	-1.0
	3 季度	2.9	3.0	0.0
	4 季度	2.5	3.2	0.4
2015 年				
	1 季度	2.9	3.3	0.4
	2 季度	2.7	3.3	0.7
	3 季度	2.0	3.2	0.7

表 9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私人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4.2	2.8	1.1
	1 季度	4.7	1.8	-0.1
	2 季度	3.6	1.8	0.7
	3 季度	4.5	2.4	1.2
	4 季度	4.1	5.2	2.4
2014 年		5.3	3.4	3.8
	1 季度	4.4	3.1	2.9
	2 季度	5.1	4.3	3.9
	3 季度	6.1	3.7	3.1
	4 季度	5.5	2.4	5.4
2015 年				
	1 季度	4.8	2.6	6.5
	2 季度	4.7	1.5	4.8
	3 季度	3.6	1.2	5.6

注:季度数据按季节因素调整(表 8、表 9)。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表 8、表 9)。

表 11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进口额	环比增长 (%)	同比增长 (%)	出口额减进口额
2014 年	23432.1		2.8	28515.3		3.4	-5083.2
9 月	1950.5	-1.1	2.6	2382.4	-0.1	2.5	-431.9
10 月	1977.6	1.4	2.2	2405.1	1.0	3.0	-427.5
11 月	1962.0	-0.8	0.6	2362.2	-1.8	2.3	-400.2
12 月	1949.8	-0.6	1.0	2405.2	1.8	4.4	-455.5
2015 年							
1 月	1890.3	-3.1	-2.0	2326.1	-3.3	0.1	-435.9
2 月	1858.9	-1.7	-1.9	2244.3	-3.5	-3.4	-385.4
3 月	1867.7	0.5	-4.1	2389.3	6.5	0.4	-521.6
4 月	1891.4	1.3	-3.0	2314.0	-3.2	-3.3	-422.6
5 月	1878.6	-0.7	-4.8	2304.0	-0.4	-3.7	-425.4
6 月	1876.9	-0.1	-4.0	2329.0	1.1	-2.1	-452.1
7 月	1888.1	0.6	-4.1	2306.2	-1.0	-3.2	-418.1
8 月	1849.4	-2.0	-6.3	2329.6	1.0	-2.4	-480.2
9 月	1879.0	1.6	-3.7	2287.1	-1.8	-4.0	-408.1

注:包括货物和服务贸易。因季节调整,各月合计数据不等于全年总计数据。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普查局。

表 10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失业率	非农雇员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环比折年率	同比		
2014 年			0.7	6.2	264.9
	10 月			5.7	22.1
	11 月			5.8	42.3
	12 月	-2.2	0.0	5.6	32.9
2015 年					
	1 月			5.7	20.1
	2 月			5.5	26.6
	3 月	-1.1	0.6	5.5	11.9
	4 月			5.4	18.7
	5 月			5.5	26.0
	6 月	3.5	0.8	5.3	24.5
	7 月			5.3	22.3
	8 月			5.1	15.3
	9 月	1.6	0.4	5.1	13.7
	10 月			5.0	27.1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统计局。

表 12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年份	季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3 年		2115.0	3079.3	-964.3
	2 季度	612.1	1028.7	-416.6
	3 季度	531.4	893.5	-362.1
	4 季度	592.1	355.9	236.2
2014 年		1066.1	3165.5	-2099.4
	1 季度	-1034.7	577.7	-1612.3
	2 季度	653.2	771.3	-118.2
	3 季度	955.9	969.7	-13.7
	4 季度	491.7	846.8	-355.1
2015 年				
	1 季度	1983.2	774.9	1208.3
	2 季度	655.3	893.1	-237.8

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三、欧元区经济

表 1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个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 0. 5	- 0. 7	0. 2
	3 季度	0. 1	0. 2	0. 3
	4 季度	0. 3	0. 1	- 0. 3
		0. 9	1. 0	0. 7
2014 年	1 季度	0. 3	0. 2	0. 2
	2 季度	0. 1	0. 2	0. 2
	3 季度	0. 3	0. 5	0. 2
	4 季度	0. 4	0. 6	0. 2
2015 年	1 季度	0. 5	0. 5	0. 6
	2 季度	0. 4	0. 4	0. 3
	3 季度	0. 3		

表 14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 3. 0	1. 3	0. 1
	3 季度	0. 5	0. 1	1. 1
	4 季度	1. 0	1. 4	0. 7
		0. 9	3. 7	3. 8
2014 年	1 季度	0. 4	0. 4	0. 6
	2 季度	- 0. 5	1. 3	1. 3
	3 季度	0. 3	1. 5	1. 7
	4 季度	0. 6	0. 9	0. 9
2015 年	1 季度	1. 4	1. 0	1. 5
	2 季度	- 0. 5	1. 6	1. 0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3、表 14)。

表 15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份	月份	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就业人数环比增加(万人)	失业率
		环比	同比		
2014 年			0. 02		11. 6
	9 月	0. 03	0. 02	33. 0	11. 5
	10 月				11. 5
	11 月				11. 5
	12 月	0. 3	0. 12	16. 9	11. 4
2015 年	1 月				11. 2
	2 月				11. 3
	3 月	0. 3	0. 53	28. 8	11. 2
	4 月				11. 1
	5 月				11. 1
	6 月	0. 0	0. 72	49. 3	11. 1
	7 月				10. 9
	8 月				10. 9
	9 月				10. 8

注:除年度数据以外,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该月份所在季度增长率;就业人数为该月份所在季度的环比变化。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6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私人消费支出	政府消费支出
2013 年		- 0. 5	- 0. 7	0. 2
	3 季度	- 0. 3	- 0. 4	0. 6
	4 季度	0. 5	0. 2	0. 2
		0. 9	1. 0	0. 7
2014 年	1 季度	1. 1	0. 6	0. 6
	2 季度	0. 8	0. 8	0. 6
	3 季度	0. 8	1. 0	0. 8
	4 季度	0. 9	1. 4	1. 0
2015 年	1 季度	1. 2	1. 7	1. 2
	2 季度	1. 5	1. 9	1. 3
	3 季度	1. 6		

表 17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	出 口	进 口
2013 年		- 3. 0	1. 3	0. 1
	3 季度	- 2. 4	1. 0	0. 9
	4 季度	0. 0	3. 0	2. 6
		0. 9	3. 7	3. 8
2014 年	1 季度	2. 3	3. 6	3. 7
	2 季度	0. 9	3. 1	3. 7
	3 季度	0. 7	4. 3	4. 0
	4 季度	0. 8	4. 3	4. 8
2015 年	1 季度	1. 8	4. 8	5. 5
	2 季度	1. 9	5. 2	5. 2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表 16、表 17)。

表 18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欧元

年份		环比	同比		环比	同比	出口额
	出口额	增长	增长	进口额	增长	增长	减进
月份		(%)	(%)		(%)	(%)	口额
2014 年	19391		2. 3	17415		0. 1	1976
	9 月	1661	4. 7	8. 2	1488	2. 7	4. 5
	10 月	1666	0. 3	3. 9	1468	- 1. 3	0. 5
	11 月	1647	- 1. 2	0. 8	1451	- 1. 2	- 1. 6
	12 月	1679	2. 0	8. 1	1451	0. 0	1. 6
2015 年							
	1 月	1649	- 1. 8	- 0. 2	1441	- 0. 6	- 5. 4
	2 月	1721	4. 3	4. 8	1488	3. 2	1. 3
	3 月	1726	0. 3	11. 6	1546	3. 9	9. 5
	4 月	1713	- 0. 7	9. 1	1512	- 2. 2	5. 1
	5 月	1704	- 0. 5	2. 8	1488	- 1. 6	0. 0
	6 月	1720	0. 9	12. 7	1521	2. 2	6. 5
	7 月	1727	0. 4	7. 0	1501	- 1. 3	0. 7
	8 月	1661	- 3. 9	5. 5	1471	- 2. 0	2. 8
	9 月	1679	1. 1	0. 9	1478	0. 5	- 1. 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贸易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贸易额,为经季节调整后的数据。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数据库。

表 19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欧元				
年度	月度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60	642.7	-581.4
	9 月	111	410.0	-299.0
	10 月	116	107.0	10.0
	11 月	-115	170.0	-285.0
	12 月	-205	-372.0	167.0
2015 年	1 月	77	136.0	-59.0
	2 月	331	348.0	-17.0
	3 月	234	-214.0	448.0
	4 月	287	163.0	124.0
	5 月	132	311.0	-179.0
	6 月	161	172.0	-11.0
	7 月	-72	230.0	-302.0
	8 月	-28	3.0	-32.0
	9 月	563	297.0	266.0
	注:欧元区绝对数指欧元区现有范围,即 19 个成员国。欧元区外国直接投资额不包括欧元区各成员国相互之间的直接投资额。			
资料来源:欧洲央行统计月报。				

四、日本经济

表 20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1.2	2.1	-0.2
	2 季度	-2.0	-5.0	0.0
	3 季度	-0.3	0.2	0.3
	4 季度	0.3	0.4	0.3
2015 年	1 季度	1.1	0.4	0.3
	2 季度	-0.2	-0.6	0.6
	3 季度	-0.2	0.5	0.3

表 21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环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3.2	5.9	6.0
	2 季度	-4.3	0.4	-4.2
	3 季度	-0.4	1.6	1.1
	4 季度	0.0	2.9	0.9
2015 年	1 季度	1.5	1.9	1.9
	2 季度	0.0	-4.3	-2.8
	3 季度	-0.6	2.6	1.7

表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国内生产总值	民间最终消费支出	政府最终消费支出
2014 年		-0.1	-1.3	0.2
	1 季度	2.4	3.4	0.2
	2 季度	-0.4	-2.9	0.0
	3 季度	-1.4	-3.0	0.2
	4 季度	-0.9	-2.4	0.5
2015 年	1 季度	-0.8	-4.0	0.9
	2 季度	1.0	0.4	1.6
	3 季度	1.0	0.7	1.5

表 23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构成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固定资本形成总额	出 口	进 口
2014 年		2.6	8.4	7.4
	1 季度	9.9	9.1	14.8
	2 季度	2.1	5.7	6.0
	3 季度	-0.6	7.7	5.3
	4 季度	-1.6	11.3	3.8
2015 年	1 季度	-3.0	7.2	-0.2
	2 季度	0.7	1.8	0.8
	3 季度	0.7	2.9	1.4

资料来源:日本内阁府(表 20~表 23)。

表 24 劳动力市场				
单位:%				
年度	月份	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率	新增就业与申请就业人数之比	失业率
2014 年		1.8	1.66	3.6
	9 月	1.4	1.68	3.6
	10 月	-1.6	1.69	3.5
	11 月	-1.6	1.69	3.5
	12 月	1.2	1.77	3.4
2015 年	1 月	-2.7	1.77	3.6
	2 月	-2.2	1.63	3.5
	3 月	-3.2	1.72	3.4
	4 月	-2.5	1.77	3.3
	5 月	-2.1	1.78	3.3
	6 月	1.6	1.78	3.4
	7 月	-1.1	1.83	3.3
	8 月	-2.6	1.85	3.4
	9 月		1.86	3.4
	10 月		1.83	3.1

资料来源:日本统计局和日本央行统计月报。

表 2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日元

年份	出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进口额	环比 增长 (%)	同比 增长 (%)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年份	出口额			进口额			出口额 减进 口额
2014 年	731052		4.8	858865		5.7	-127813
10 月	64002	2.1	9.6	72406	-0.7	3.1	-8405
11 月	64548	0.9	4.9	72396	0.0	-1.7	-7848
12 月	65597	1.6	12.9	71678	-1.0	1.9	-6082
2015 年							
1 月	67249	2.5	17.0	70350	-1.9	-9.0	-3101
2 月	62306	-7.4	2.4	68201	-3.1	-3.6	-5896
3 月	64643	3.8	8.5	64924	-4.8	14.5	-281
4 月	63326	-2.0	8.0	65726	1.2	-4.2	-2400
5 月	61368	-3.1	2.4	63438	-3.5	-8.7	-2070
6 月	63833	4.0	9.5	66729	5.2	-2.9	-2896
7 月	63551	-0.4	7.6	67233	0.8	-3.2	-3682
8 月	63160	-0.6	3.1	66730	-0.7	-3.1	-3570
9 月	62076	-1.7	0.6	65173	-2.3	11.1	-3098
10 月	62423	0.6	-2.1	64445	-1.1	13.4	-2023

注:月度贸易额为季节调整后数据。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表 26 外国直接投资

单位:亿日元

年份	月份	流 入	流 出	流入减流出
2014 年		9548	127682	-118134
	9 月	2939	6944	-4005
	10 月	-1351	16368	-17719
	11 月	397	15074	-14677
	12 月	2932	13443	-10511
2015 年				
	1 月	-650	12385	-13035
	2 月	1163	13941	-12778
	3 月	2968	10774	-7806
	4 月	-748	9968	-10716
	5 月	1067	23576	-22509
	6 月	-684	6344	-7028
	7 月	-4291	11399	-15690
	8 月	-883	13457	-14340
	9 月	-2073	12385	-14458

资料来源:日本财务省。

五、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经济

表 27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加拿大	英国	南非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2013 年		2.0	1.7	2.2	2.7	6.9	1.3
	1 季度	3.2	0.8	1.8	2.8	4.6	0.8
	2 季度	2.0	1.7	2.2	3.9	7.0	1.2
	3 季度	2.7	1.6	1.8	2.4	7.5	1.3
	4 季度	2.9	2.4	2.9	2.1	6.4	2.1
2014 年		2.4	3.0	1.5	0.1	7.3	0.6
	1 季度	1.0	2.7	1.9	2.7	6.7	0.6
	2 季度	3.4	3.0	1.3	-1.2	6.7	0.7
	3 季度	3.2	3.0	1.6	-0.6	8.4	0.9
	4 季度	2.2	3.4	1.3	-0.3	6.6	0.4
2015 年							
	1 季度	-0.8	2.9	2.1	-1.6	7.5	-2.2
	2 季度	-0.5	2.6	1.2	-2.6	7.0	-4.6
	3 季度		2.3				

注:印度年度 GDP 增长率为财年增长率。

表 28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比)

单位:%

年度	季度	韩国	墨西哥	中国 香港	中国 台湾	马来 西亚	印度尼 西亚
2013 年		2.9	1.4	3.1	2.2	4.7	5.6
	2 季度	2.7	1.8	3.1	2.6	4.5	5.6
	3 季度	3.2	1.6	3.1	1.5	5.0	5.5
	4 季度	3.4	1.1	2.8	3.4	5.1	5.6
2014 年		3.3	2.1	2.5	3.8	6.0	5.0
	1 季度	3.9	2.0	2.7	3.4	6.2	5.1
	2 季度	3.4	1.7	2.0	3.9	6.5	5.0
	3 季度	3.3	2.2	2.9	4.3	5.6	4.9
	4 季度	2.7	2.6	2.4	3.5	5.7	5.0
2015 年							
	1 季度	2.4	2.6	2.4	3.8	5.6	4.7
	2 季度	2.2	2.2	2.8	0.5	4.9	4.7
	3 季度	2.7	2.6	2.3	-0.6	4.7	4.7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29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加拿大	英国	巴西	俄罗斯	南非
2014 年		6.9	6.2	4.8	5.2	25.1
	9 月	6.9	6.0	4.9	4.9	25.4
	10 月	6.6	6.0	4.7	5.1	
	11 月	6.7	5.8	4.8	5.2	
	12 月	6.7	5.7	4.3	5.3	24.3
2015 年						
	1 月	6.6	5.7	5.3	5.5	
	2 月	6.8	5.6	5.9	5.8	
	3 月	6.8	5.5	6.2	5.9	26.4
	4 月	6.8	5.5	6.4	5.8	
	5 月	6.8	5.6	6.7	5.6	
	6 月	6.8	5.6	6.9	5.3	25.0
	7 月	6.8	5.5	7.5	5.3	
	8 月	7.0	5.4	7.6	5.3	
	9 月	7.1	5.3	7.6	5.2	25.5
	10 月	7.0		7.9	5.5	

表 30 劳动力市场失业率

单位:%

年份	月份	韩国	墨西哥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马来西亚
2014 年		3.5	4.5	3.3	4.0	2.9
	9 月	3.5	5.1	3.3	3.9	2.7
	10 月	3.5	4.8	3.3	3.9	2.7
	11 月	3.4	4.5	3.3	3.9	2.7
	12 月	3.5	3.8	3.3	3.8	3.0
2015 年						
	1 月	3.4	4.5	3.3	3.8	3.0
	2 月	3.9	4.3	3.3	3.7	3.2
	3 月	3.7	3.9	3.3	3.8	3.0
	4 月	3.7	4.3	3.2	3.8	3.0
	5 月	3.9	4.4	3.2	3.8	3.1
	6 月	3.9	4.4	3.2	3.8	3.1
	7 月	3.7	4.7	3.3	3.7	3.2
	8 月	3.6	4.7	3.3	3.7	3.2
	9 月	3.5	4.5	3.3	3.8	3.2
	10 月	3.4	4.6	3.3	3.8	

注:1. 英国和中国香港月度数据为截至当月的 3 个月移动平均失业率。2. 加拿大、英国、韩国和中国香港为经季节因素调整后的失业率。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

表 31 进出口贸易							表 34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加 拿 大			英 国			年份 月份	韩 国			墨西哥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4746.3	4625.4	120.9	5045.6	6903.2	-1857.6	2014 年	5726.6	5255.1	471.5	3971.3	4115.8	-144.5
10 月	417.6	416.1	1.4	436.2	602.2	-166.0	10 月	516.3	441.0	75.3	368.8	379.9	-11.2
11 月	374.1	371.3	2.8	446.8	543.0	-96.3	11 月	466.1	413.4	52.6	323.6	343.5	-19.9
12 月	394.9	365.9	28.9	390.5	546.4	-155.9	12 月	494.6	439.1	55.5	341.4	348.4	-6.9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347.8	332.1	15.7	346.2	509.6	-163.4	1 月	451.1	394.2	56.9	265.5	306.1	-40.5
2 月	318.2	322.9	-4.7	346.1	525.7	-179.6	2 月	414.8	339.3	75.5	297.2	298.7	-1.6
3 月	359.1	377.0	-17.9	418.4	543.8	-125.5	3 月	468.5	384.8	83.7	341.3	336.6	4.7
4 月	339.3	367.5	-28.2	385.6	497.0	-111.4	4 月	462.4	378.1	84.3	329.5	330.4	-0.9
5 月	338.4	366.0	-27.6	397.3	505.4	-108.1	5 月	423.3	361.3	62.0	313.4	323.6	-10.2
6 月	369.8	374.4	-4.6	400.9	545.8	-144.9	6 月	465.7	366.6	99.1	338.4	345.9	-7.5
7 月	339.4	349.8	-10.4	378.8	546.1	-167.3	7 月	457.1	388.2	68.9	328.0	350.7	-22.7
8 月	335.6	349.0	-13.4	362.7	471.8	-109.1	8 月	391.3	349.5	41.8	310.5	338.3	-27.8
9 月	344.9	348.6	-3.7	393.6	534.3	-140.6	9 月	434.8	345.6	89.2	322.4	336.6	-14.2
							10 月	434.7	367.8	66.9			
注:加拿大和英国数据经过季节因素调整。							表 35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南 非			巴 西			年份 月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910.5	998.9	-88.4	2251.0	2391.5	-140.5	2014 年	5241.3	6007.7	-766.3	3138.4	2742.3	396.1
10 月	79.9	99.7	-19.8	183.3	203.5	-20.2	10 月	477.4	534.0	-56.6	269.0	222.8	46.2
11 月	75.7	80.5	-4.8	156.5	188.7	-32.2	11 月	484.8	545.2	-60.3	266.8	224.6	42.2
12 月	76.2	70.3	5.9	174.9	179.3	-4.4	12 月	455.0	537.0	-82.0	256.5	212.0	44.5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57.6	78.9	-21.3	137.0	176.3	-39.2	1 月	438.0	484.2	-46.2	251.2	203.2	48.0
2 月	65.9	73.7	-7.8	120.9	156.1	-35.2	2 月	327.8	380.1	-52.2	198.6	153.0	45.6
3 月	75.6	75.3	0.3	169.8	172.7	-2.9	3 月	416.2	470.8	-54.6	252.7	212.1	40.7
4 月	69.9	71.8	-1.9	151.6	146.7	4.9	4 月	401.4	457.1	-55.8	234.9	187.4	47.5
5 月	74.1	70.1	4.0	167.7	140.1	27.6	5 月	408.5	444.4	-35.9	256.3	202.1	54.2
6 月	73.1	68.7	4.5	196.3	151.0	45.3	6 月	407.4	465.6	-58.2	230.7	208.8	21.9
7 月	74.7	75.6	-0.9	185.3	161.5	23.9	7 月	453.2	475.9	-22.8	235.5	199.1	36.3
8 月	67.7	75.5	-7.9	154.9	128.0	26.9	8 月	426.6	456.0	-29.4	239.3	199.7	39.6
9 月	67.8	68.4	-0.7	161.5	132.0	29.4	9 月	453.5	492.6	-39.1	225.4	173.0	52.5
10 月				160.5	140.5	20.0	10 月				239.4	178.2	61.2
表 33 进出口贸易							表 36 进出口贸易						
单位:亿美元							单位:亿美元						
年份 月份	印 度			俄罗斯			年份 月份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出口 额	进口 额	出口减 进口
2014 年	3216.4	4625.3	-1408.9	4977.6	3080.3	1897.4	2014 年	2341.4	2088.7	252.7	1762.9	1781.8	-18.9
10 月	259.6	394.8	-135.2	415.4	268.3	147.1	10 月	199.0	195.5	3.5	153.5	153.3	0.2
11 月	263.6	427.0	-163.4	367.6	230.9	136.6	11 月	190.6	157.3	33.3	136.2	140.4	-4.3
12 月	261.3	352.6	-91.3	383.8	244.9	139.0	12 月	194.5	168.0	26.5	146.2	144.4	1.9
2015 年							2015 年						
1 月	243.7	321.1	-77.4	278.3	125.0	153.3	1 月	177.5	152.5	25.0	133.6	126.1	7.4
2 月	218.7	282.8	-64.1	293.0	156.3	136.7	2 月	148.0	135.3	12.7	121.7	115.1	6.6
3 月	238.9	357.0	-118.2	326.3	172.6	153.8	3 月	180.6	159.3	21.3	136.3	126.1	10.3
4 月	220.9	329.7	-108.8	305.5	163.4	142.1	4 月	166.1	147.2	18.9	130.8	126.3	4.6
5 月	222.6	326.9	-104.3	305.8	154.5	151.3	5 月	167.8	152.5	15.3	126.9	116.1	10.8
6 月	222.9	331.2	-108.3	300.1	163.7	136.5	6 月	171.9	150.5	21.3	135.1	129.8	5.3
7 月	231.4	359.5	-128.1	276.6	169.8	106.8	7 月	166.3	160.1	6.2	114.7	100.8	13.9
8 月	212.7	337.4	-124.8	253.1	166.0	87.1	8 月	163.8	138.8	25.0	127.3	124.0	3.3
9 月	218.4	323.2	-104.8	263.7	167.6	96.1	9 月	162.7	140.3	22.5	125.9	115.6	10.3
10 月	213.5	311.2	-97.7				10 月				120.9	110.7	10.2
							资料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表 27~表 36)。						

六、三大经济体指标对比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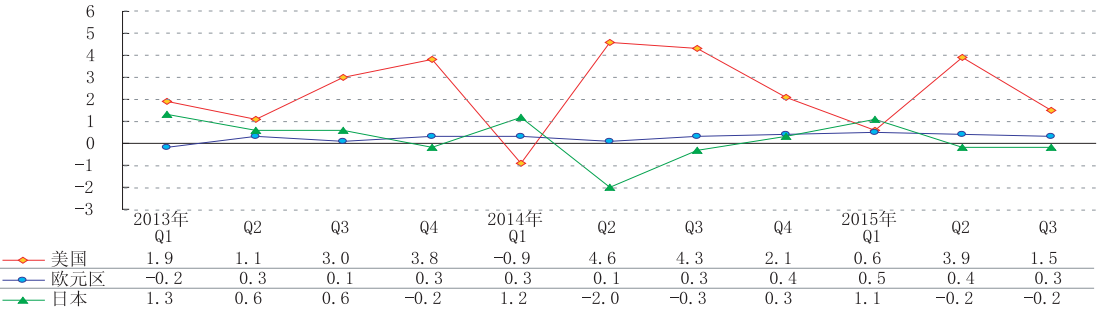


图 1 三大经济体 GDP 环比增长率 (%)

注:美国为环比折年率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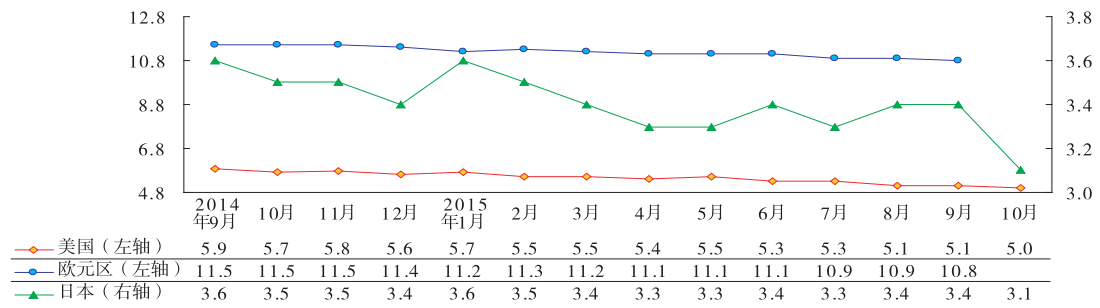


图 2 三大经济体失业率变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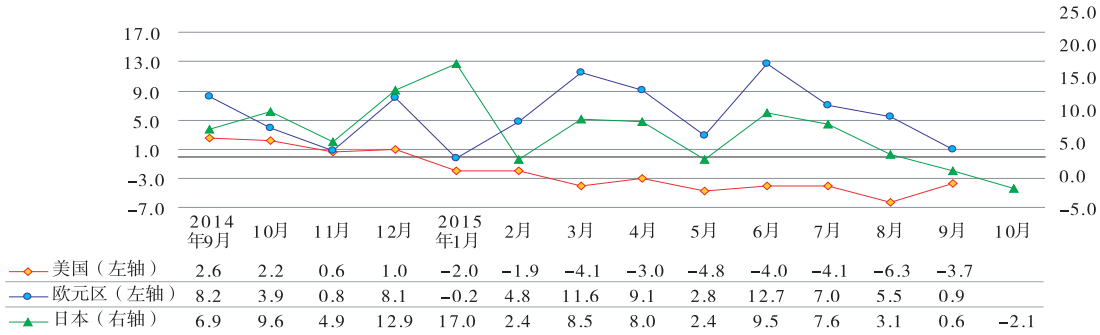


图 3 三大经济体出口额同比增长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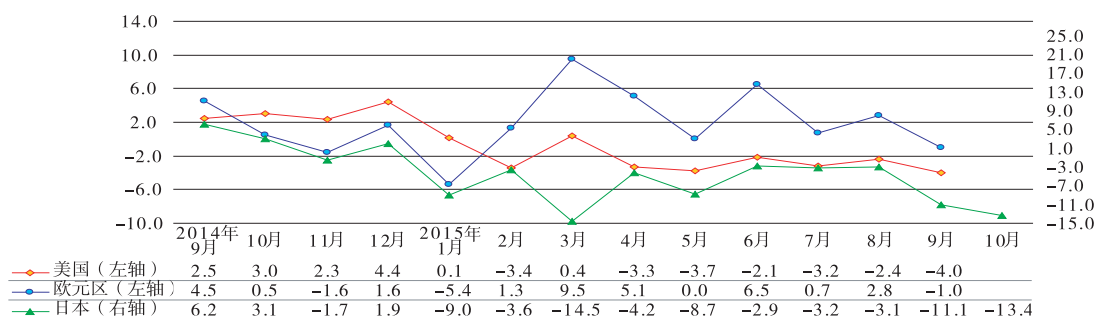


图 4 三大经济体进口额同比增长率 (%)

数据来源:各经济体官方统计网站(图 1~图 4)。

责任编辑:陈璇璇

ABSTRACTS

(1)Great Opportunities to Hong Kong from “One Belt And One Road” and Suggestions

Chen Wenling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strategy, advocated and promoted by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been providing very rare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therefore we should deeply realize and firmly grasp this historical moment. Working together with the motherland and the releva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toward building a community sharing common destiny, common interests, common responsibilities and common emotion, Hongkong would seek more common points and junctions and enlarge its comparative advantages in promoting the free and orderly flow of economic factors, resource efficient configu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market depth. Facingthe tremendous opportunities provided by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strategy, currently Hong Kong’s most urgent task is tocomply with the “ One Belt And One Road ” strategy, and to better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general trend, and deal with the deep – seated contradictions and problems in the good of their own existence.

(2)On the Space Layout Optimization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nd the Acting Points for Hebei

Xiao Jincheng, Ma Yankun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strategy, and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he above three regions is accelerat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a number of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siphon effect between Beijing and Tianjin, the faults in urban system, and the exaggerating economic gap between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This paper argues that spatial layout optimization is the key point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accordingly proposes the space layout plan of “one axis, two belts, three – core leading, four circles interaction, multi – point support”. Fostering economic growth pole is the focal point for speed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Hebei Province, and Caofeidian New Area, Beidaihe New District, Bohai New Area, Zhengding New District, Jinan New District should be cultivated intensively as a new economic growth pole, and making them the Highlights and support points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 Tianjin and Hebei.

(3)Macro—economic Operation in 2015 and Outlook on the Future

Yang Lin

Currently Chinese economy can be characterized into 7 aspects, which are as follows: GDP growth rate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er, the structural reform has made substantial progress, the shrinking of the investment has been decelerating, consumption has kept stable, the reduction of traditional consumption and the increase of newly – developing consumption has been co – existing, foreign trading becomes weak while its structure is optimizing, economy development

differentiates seriously, price of commodities is high in front and low after in a year,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microeconomic policy becomes stronger and stronger; Meanwhile, there will be a series of problems such as GDP growth rate will go down and structure adjusting will be slow and transmission obstructing between financial institution and entity cooperation will continue etc. There should be scientific macroeconomic policy and its good executing to reach the economy goal.

(4) Study on the Negative List Negotiation of the Sino –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and Policy Suggestions

Li Luosa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cept and the essence of the negative list. Comparisons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are also touched upon in the paper. The paper also analyses of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 negotiation of the Sino – US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 s negative list and also updates the progress already made and the significance attached. Chinese negotiators focused on proposed guidelines, and seized the strategic opportunities, “90 percent of domestic negotiation” strategy to avoid deadlock, open negotiation strategy of competitive industries and different levels of preparation service terms. Moreover, to se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on legislating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the legislative work on industrial opening the legislative work of the law, allowing foreign participation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and strengthening of the regulatory of afterwards.

(5)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n

Liu Xiangfeng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frican countries ha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and challenge of Chinese outward FDI to African countries. Chinese FDI was found to be strongly correlated with resource – richness and the existence of trade ti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recipient African country. Chinese investment will eventually become market – seeking, attain industry transfer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rather than resource – seeking in African countries as their markets grow, and engag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ir foreign counterparts in building up production capacity through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6)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Orderly Advancing the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Huang Yong, Zhou Shifeng, Wang Lin, Pan Yigang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is the core task of new – type urbunization. Taking citizenization of Agriculture transfer population as starting point, and based on the wishes of citizenization of farmer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and main contradictions from the dimensions such as present condition, advancing path, policy design and cost sharing, and creatively puts forward the idea arrangements, structural reform prioritie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citizenization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orderly crowd, fields, spaces and time.

(7) Experi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SME Development in Taiwan

Wang Suzhen, Zhao Jinghua

Polici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MEs in Taiwan involves financial policy, fiscal

polic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olicy, social servic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o on. Financial support policies include SMEs financing guarantee, financing counseling and pluralistic financing pipeline subsystems; financial policy primarily concerns that the relevant competent departments counsel and support SMEs development through budget funds, and tax preference mainly relates to land value – added tax preference and earnings – related enterprise income tax exempti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mainly operates in the form of setting up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ark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unding support, personnel training; social service system includes SMEs counseling system,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service system, technical service system and pluralistic service principal. In addition, Taiwan focuses on designing pragmatic policy operation mode. Mainland China should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continuously improve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for SMEs, improve the financial service system for SMEs, continuously broaden the scope to deepen the support for SMEs, and consider undertaking counseling for SMEs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Taiwan related institutions.

(8) Influence of Rural — household Differentiation on Usage and Demand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s and Its Enlightments

Jiang Changyun, Zheng Qiufen

Based on the survey on the farmers around 10 provinces (autonomous regions), we classify the farmers into farm households, and two part time farm households based on agriculture or supplementary agriculture, analyze and compare their behaviors in use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 households and their demands for agricultural services. Based on these analyses, we shall strengthen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services, complying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trend and strengthening individual guidance. Work should be done to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 scale agricultural operations, and to actively cultivate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t the same time, a sound mechanism to promote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shall be perfected; support for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in key areas and weak links,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information network shall be promoted; agricultural quality of service should be actively improved, and the efforts of standardization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shall be pushe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 subsidy policies shall be actively implemente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ized and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service industry should be guided properly.

(9) Continuously Pushing forward the Sino—US New Relations — Summary of the Seventh Round Dialogue between Sino—US Business Leaders and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Ren Haiping

The seventh round dialogue between Sino – US business leaders and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was held in September 2015 in Beijing.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sides together recommended for the early completion of BIT negotiations, a proper start for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the US – China Investment and Trade Agreement (BITT), and the ripe conditions to launch negotiations as well. US pushed China to join the Trans –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 meanwhile China promoted the United States to join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 Sino – US jointly promoted the construction of Asia – Pacific free trade area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world's largest free trade area around 2030, thus further driving the constrection of Sino – US new power relations.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

中国海外政经研究中心是由中国海外控股集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地区安全研究中心共同发起设立的研究机构。中心的主要任务是就与中国海外投资环境有关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安全、政策等相关问题进行调研，分析研究，提供调研和分析报告，开展合作交流，召开成果发布会、举办专题论坛，开办讲座、培训等，面向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心发挥智库功能，就有关中国海外投资和海外资产管理等问题，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供战略性和政策性研究成果和对策性建议，为企业提供投资战略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咨询，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和对海外资产进行有效管理。



联系地址：北京市王府井东街 8 号澳门中心四层（邮编 100006）
合作/咨询电话：010-58138101-302 邮箱：perc@zhwkg.com